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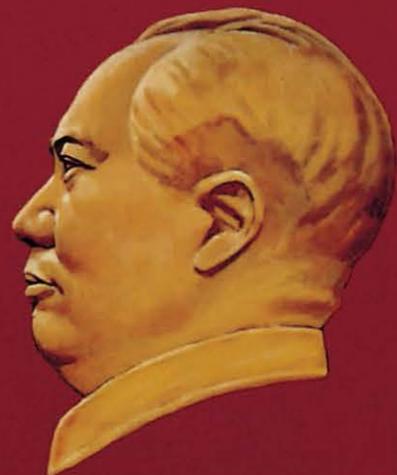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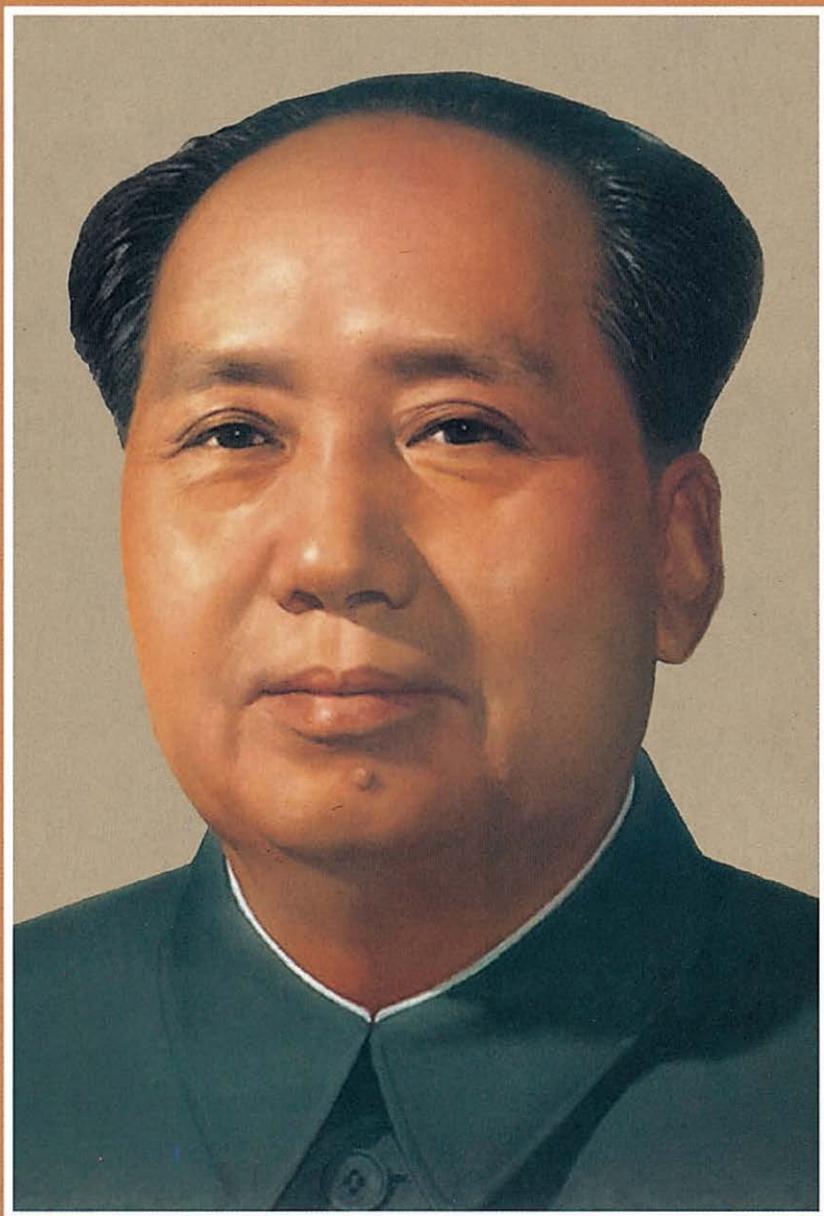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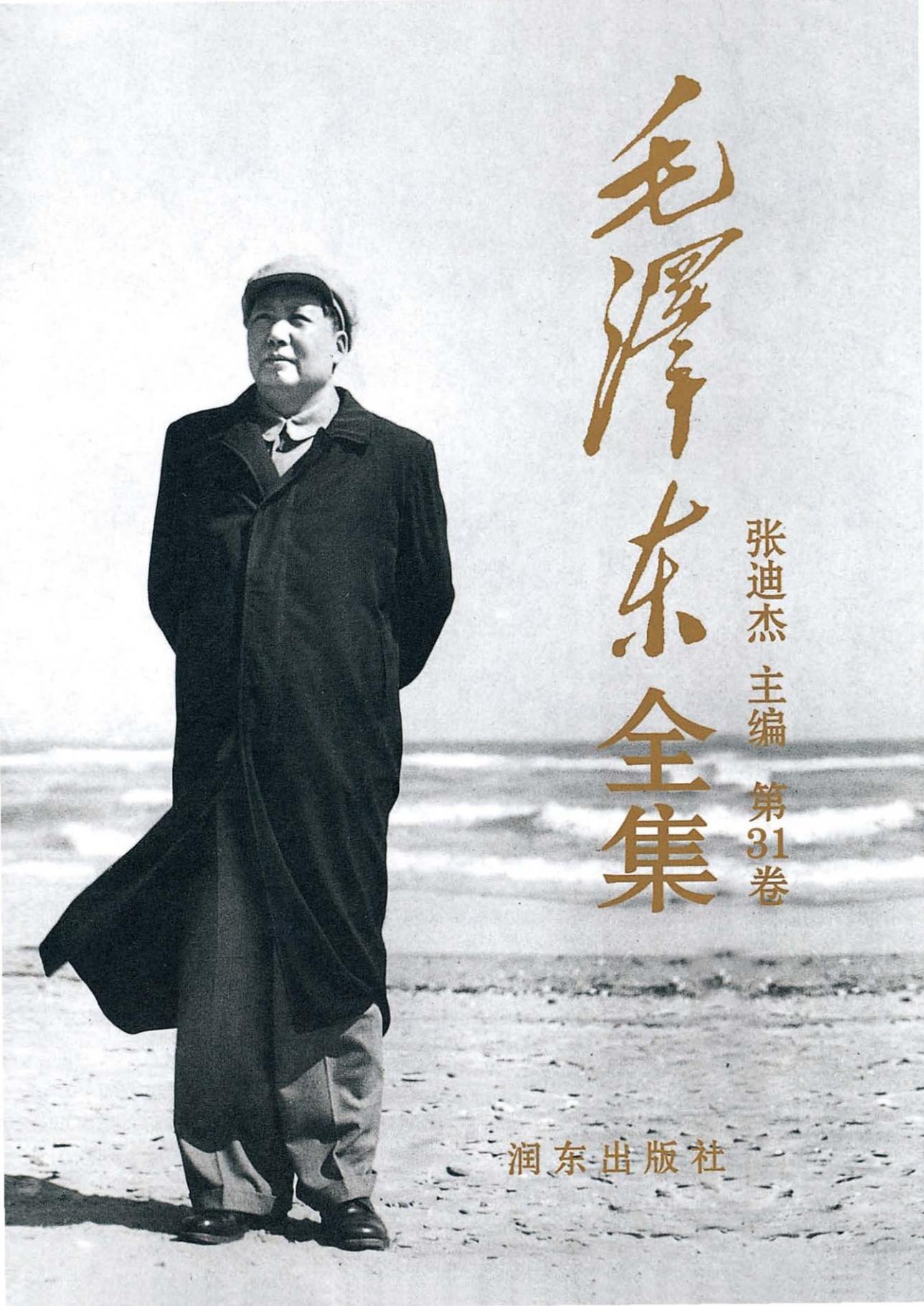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桢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校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傅种孙的信·····	1
(1951年10月23日)	
关于通过和发表抗美援朝决议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4
(1951年10月24日)	
致达赖喇嘛电·····	5
(1951年10月26日)	
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上 加写的两段话·····	8
(1951年10月)	
对朝鲜战场兵力调整和补充报告的批语·····	10
(1951年10月)	
关于徐向前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批语·····	11
(1951年11月1日)	
中央印发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开展民主 改革的指示的通知·····	13
(1951年11月5日)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致斯大林电·····	14
(1951年11月5日)	
致达赖喇嘛电·····	15
(1951年11月10日)	

为张仙朋题词	16
(1951年11月10日)	
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致彭德怀等电	18
(1951年11月11日)	
为审阅中央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21
(1951年11月12日)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2
(1951年11月12日)	
关于为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给周扬的信	23
(1951年11月13日)	
为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	24
(1951年11月13日)	
在中央给张经武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26
(1951年11月14日)	
给马寅初的一封信	27
(1951年11月15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批语	29
(1951年11月16日)	
对中宣部、文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报告的批语	31
(1951年11月16日)	
关于张经武留藏工作的批语	32
(1951年11月16日)	
对胡乔木关于院系调整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李富春、彭真的信的批示	33
(1951年11月17日)	

转发中财委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的通报的批语···34	
(1951年11月17日)	
给李介侯的信 ······36	
(1951年11月18日)	
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37	
(1951年11月18日、12月15日、12月23日)	
中央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40	
(1951年11月20日)	
关于谈判军事分界线问题致李克农电 ······43	
(1951年11月20日)	
空军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 ······45	
(1951年11月20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的批语 ······46	
(1951年11月21日)	
给王首道的信 ······47	
(1951年11月21日)	
给李维汉的信 ······48	
(1951年11月22日)	
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的批语 ······49	
(1951年11月25日)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50	
(1951年11月26日)	
给薄一波的信 ······51	
(1951年11月27日)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52	
(1951年11月30日)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54
(1951年11月30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55
(1951年11月30日)	
为湖南农学院题名	57
(1951年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名	59
(1951年11月)	
中央关于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致薄一波、刘澜涛电	61
(1951年12月1日)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62
(1951年12月1日、2日)	
给郑振铎的信	67
(1951年12月3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把领导重点转到工业生产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决定的批语	69
(1951年12月4日)	
给董必武的信	70
(1951年12月4日)	
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71
(1951年12月4日)	
中央转发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的批语	73
(1951年12月5日)	

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关于精简节约工作报告的批语	74
(1951年12月5日)	
关于交换战俘的批语	75
(1951年12月7日)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76
(1951年12月8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华东工作纲要的批语	78
(1951年12月8日)	
给钟志刚的信	79
(1951年12月8日)	
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80
(1951年12月9日)	
转发总政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82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邮电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4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铁道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5
(1951年12月11日)	
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6
(1951年12月11日)	
给毛泽连、毛远悌的信	88
(1951年12月11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违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89
(1951年12月12日)	
复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电	90
(1951年12月12日)	

-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91
(1951年12月13日)
- 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93
(1951年12月13日)
-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的批语·····95
(1951年12月13日)
- 对外交部转发张闻天关于我驻东欧使馆工作报告的电报的批语···97
(1951年12月13日)
- 致班禅额尔德尼电·····99
(1951年12月13日)
- 中央转发高岗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101
(1951年12月14日)
- 给杨立三的信·····102
(1951年12月14日)
- 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103
(1951年12月15日)
- 中央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105
(1951年12月15日)
- 转发陈毅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的批语···106
(1951年12月15日)
- 中央转发平原省委关于干部中贪污腐化情况通报的批语·····107
(1951年12月15日)
- 在罗荣桓等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
建议信上的批语·····108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10
(1951年12月17日)	
转发肖华关于总政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12
(1951年12月17日)	
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	113
(1951年12月17日)	
审阅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	115
(1951年12月18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批准权的六项规定的批语··	116
(1951年12月18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18
(1951年12月18日)	
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20
(1951年12月18日)	
关于处理志愿军休养员打人事件的批语·····	121
(1951年12月18日)	
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信上的批语·····	124
(1951年12月18日)	
军委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	125
(1951年12月19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的修改·····	126
(1951年12月19日)	
中央转发文委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28
(1951年12月20日)	
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29
(1951年12月21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的电报·····	131
(1951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报告的批语·····	132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34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35
(1951年12月22日)	
给章士钊的信·····	138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局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39
(1951年12月23日)	
关于印发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批语·····	141
(1951年12月23日)	
给陈玉英的信·····	143
(1951年12月23日)	
中央批准西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指示的电报·····	144
(1951年12月24日)	
对中财委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报告的批语·····	145
(1951年12月24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批语·····	146
(1951年12月24日)	
关于部队三反和整编的安排问题致谭政电·····	147
(1951年12月24日)	
转发联运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48
(1951年12月24日)	

- 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149
(1951年12月25日)
- 在中央转发中办秘书室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话·····150
(1951年12月25日)
- 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致各中央局电···151
(1951年12月26日)
-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52
(1951年12月26日)
- 关于同意将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致陈毅电·····154
(1951年12月28日)
- 关于播发饶漱石的演说给新华社的批语·····156
(1951年12月28日)
- 关于同意对付敌人拖延谈判的办法致李克农电·····157
(1951年12月28日)
- 给黄炎培的信·····158
(1951年12月29日)
-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159
(1951年12月30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160
(1951年12月30日)
- 对编余部队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批语·····162
(1951年12月30日)
- 对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163
(1951年12月30日)
- 中央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165
(1951年12月30日)

- 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补充指示的批语·····167
（1951年12月30日）
- 关于回谢生日贺电问题的批语·····168
（1951年12月30日）
- 给易南屏的信·····169
（1951年12月30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
电报的批语·····170
（1951年12月31日）
- 转发志愿军四十二军党委关于节约计划报告的批语·····172
（1951年12月31日）
- 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一书封面题词·····173
（1951年）
- 为复旦大学题名·····175
（1951年）
- 为《新农村》题名·····176
（1951年）
- 元旦祝词·····179
（1952年1月1日）
- 对中南军区三反指示和谭政来电的复电和批语·····180
（1952年1月1日）
- 在川北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183
（1952年1月1日）
- 转发志愿军二十兵团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184
（1952年1月2日）
- 答谢威廉·皮克祝贺生日的电报·····185
（1952年1月2日）

祝贺威廉·皮克寿辰的电报	186
(1952年1月2日)	
对组织空军部队到朝鲜战场作战的报告的批语	187
(1952年1月2日)	
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188
(1952年1月4日)	
转发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0
(1952年1月4日)	
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	191
(1952年1月4日)	
对聂荣臻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2
(1952年1月4日)	
关于大贪污犯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193
(1952年1月4日、6日)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195
(1952年1月4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200
(1952年1月5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的批语	202
(1952年1月5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批语	203
(1952年1月5日)	
关于起草惩治浪费条例和修改惩治贪污条例的批语	204
(1952年1月5日)	
对张劲夫关于浙江省直属机关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205
(1952年1月5日)	

- 对中共济南市委报告的批示·····206
(1952年1月6日)
- 对中南局关于近几个月内少开主要干部出席的业务会议的建设的批语···207
(1952年1月8日、11日)
- 关于军事系统三反报告一般由总政处理的批语·····209
(1952年1月9日)
- 对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10
(1952年1月9日)
- 给罗元贞的信·····211
(1952年1月9日)
- 转发罗瑞卿关于公安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212
(1952年1月10日)
- 转发空军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213
(1952年1月10日)
- 中央关于天津市委对干部超支问题所作分析的批语·····215
(1952年1月10日)
- 对山东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16
(1952年1月10日)
- 转发西康军区关于三反的紧急指示的批语·····217
(1952年1月10日)
- 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218
(1952年1月13日)
- 在中南局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220
(1952年1月13日)
- 在薄一波转报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报告的信上的批语···221
(1952年1月13日)

- 在习仲勋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电报上的批语·····223
(1952年1月13日)
- 转发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224
(1952年1月14日)
- 关于美机犯境我方应不示弱致李克农电·····225
(1952年1月14日)
- 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26
(1952年1月14日)
- 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227
(1952年1月14日)
- 关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应主动反击敌人的电报·····228
(1952年1月15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通报的批语·····229
(1952年1月15日)
-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230
(1952年1月15日)
-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的批语·····232
(1952年1月15日)
- 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的批语·····233
(1952年1月15日)
- 对总政关于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三周简报的批示的批语·····235
(1952年1月15日)
- 对聂荣臻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建议的批语·····236
(1952年1月15日)
- 转发华北军区十军党委关于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237
(1952年1月16日)

- 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的批语·····239
(1952年1月17日)
- 关于同意华东部队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建议的批语···240
(1952年1月18日)
- 在中央关于省以上部门驻外地机构的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242
(1952年1月20日)
- 中央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43
(1952年1月21日)
- 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245
(1952年1月21日、2月3日)
- 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电报·····247
(1952年1月22日)
- 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248
(1952年1月22日)
-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报告的批语·····249
(1952年1月22日)
- 关于军委民航局三反斗争的批语·····250
(1952年1月22日)
- 对纺织部关于经纬纺织机器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的检讨的批语···251
(1952年1月23日)
- 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252
(1952年1月23日)
- 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五周简报的批语·····254
(1952年1月24日)

对山西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的批语·····	255
(1952年1月24日)	
在第一航校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256
(1952年1月25日)	
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	257
(1952年1月25日)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259
(1952年1月26日)	
对华东一级机关三反运动简况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262
(1952年1月26日)	
对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捉虎情况报告的批语·····	264
(1952年1月26日)	
对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 批准的紧急指示的批语·····	265
(1952年1月26日)	
转发中南军区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的批语·····	266
(1952年1月27日)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268
(1952年1月27日)	
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69
(1952年1月27日)	
吊唁乔巴山逝世致布曼增迪电·····	271
(1952年1月27日)	
转发北京市打虎经验的批语·····	272
(1952年1月28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预算报告的批语……………273
(1952年1月30日)
- 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274
(1952年1月30日)
- 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275
(1952年1月31日)
- 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高岗电 ……276
(1952年1月31日)
- 在中财委机关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报告上的批注……………279
(1952年1月)
-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处理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问题的意见的批语…280
(1952年1月)
-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命令……………281
(1952年2月1日)
- 关于西北军区二月份应深入三反着重打虎的电报……………283
(1952年2月1日)
- 对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284
(1952年2月1日)
- 对空军第三师战况报告的批语……………286
(1952年2月1日)
- 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287
(1952年2月2日)
- 转发十军打虎经验的批语……………288
(1952年2月2日、6日)
- 转发李富春在中财委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的批语……………290
(1952年2月2日)

转发安子文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292
(1952年2月4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和河北打虎任务的批语·····	293
(1952年2月4日)	
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294
(1952年2月4日)	
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致谭政电·····	297
(1952年2月4日)	
对华北区二月底以前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299
(1952年2月4日)	
关于转发三个打虎文件的批语·····	301
(1952年2月4日)	
关于注意领导生产问题·····	303
(1952年2月4日)	
答谢胡志明祝贺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电报·····	304
(1952年2月4日)	
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	305
(1952年2月5日)	
中央关于派彭真、罗瑞卿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	306
(1952年2月5日)	
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307
(1952年2月5日)	
对六十六军打虎报告的批语·····	308
(1952年2月5日)	
在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309
(1952年2月5日)	

- 对劳动部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报告的批语……310
(1952年2月6日)
- 转发中财委关于财经工作几点意见的批语……312
(1952年2月6日)
- 对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13
(1952年2月7日)
- 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314
(1952年2月7日)
- 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315
(1952年2月7日)
- 关于推迟公审违法资本家的批语……317
(1952年2月7日、8日)
- 对刘澜涛关于六十六军捉虎经验报告的批语 ……318
(1952年2月8日)
- 转发天津十一区打大虎的经验的批语……319
(1952年2月8日)
- 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320
(1952年2月8日)
- 关于纠正连队干部军阀主义作风问题……321
(1952年2月8日)
- 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322
(1952年2月9日)
- 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稿和毛泽东对此稿的说明……326
(1952年2月9日)

- 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328
(1952年2月9日)
- 对华北军区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30
(1952年2月9日)
- 转发华东军区捉虎报告的批语·····331
(1952年2月10日)
- 对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332
(1952年2月10日)
- 对张宗逊等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指示的批语·····333
(1952年2月10日)
- 转发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335
(1952年2月10日)
- 对王鹤寿等关于东北工业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338
(1952年2月10日)
-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的批语·····339
(1952年2月11日)
- 祝贺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致斯大林电·····341
(1952年2月11日)
- 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342
(1952年2月11日)
- 关于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的电报·····343
(1952年2月11日)
- 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的批语·····344
(1952年2月11日、12日)

-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的批语……………347
（1952年2月12日）
- 对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几项决议的报告的批语…………349
（1952年2月12日）
- 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章给邓拓的信……………351
（1952年2月12日）
- 中央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352
（1952年2月13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增加打虎预算的报告的批语……………353
（1952年2月13日）
- 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354
（1952年2月13日）
- 关于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全力对敌的电报……………355
（1952年2月13日）
- 朝鲜停战谈判能否成功系于美国政府有无诚意……………356
（1952年2月14日）
- 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358
（1952年2月15日）
- 关于中央一级不准备审判中小贪污犯复习仲勋电……………361
（1952年2月15日）
- 给毛岳乔的信……………362
（1952年2月15日）
- 对周恩来关于解决三反中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的批语……………363
（1952年2月16日）

- 转发中南军区后勤部打虎经验的批语·····364
(1952年2月16日)
- 对一九二师炮兵团部分同志关于三反斗争的建议信的批语·····365
(1952年2月16日)
- 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366
(1952年2月17日)
- 军委同意志愿军三十九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的电报·····367
(1952年2月17日)
- 关于同意西南区打虎新计划的复电·····368
(1952年2月17日)
-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369
(1952年2月17日)
- 关于派陈伯达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给高岗的信·····371
(1952年2月17日)
- 关于中南军区应增加打虎预算致谭政等电·····372
(1952年2月18日)
- 对罗瑞卿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73
(1952年2月18日)
- 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宣教系统打虎情况报告的批语·····375
(1952年2月18日)
- 对劳动部关于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中应注意的几点意见的批语···376
(1952年2月18日)
- 关于转发贸易部打虎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378
(1952年2月18日)
- 中央转发南汉宸等关于三反以来金融情况报告的批语·····379
(1952年2月19日)

- 对聂荣臻关于朝鲜前线敌大面积空投带菌昆虫等的报告的批语···381
(1952年2月19日)
-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两个报告的批语·····382
(1952年2月20日)
- 转发华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384
(1952年2月20日)
-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捉人封店问题致华东局电·····385
(1952年2月20日)
- 关于华南分局打虎部署复叶剑英电·····386
(1952年2月21日)
-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387
(1952年2月22日)
- 转发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批语·····389
(1952年2月22日)
- 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390
(1952年2月22日)
-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91
(1952年2月22日)
-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93
(1952年2月23日)
- 关于上海市应抓紧完成三反打虎任务开展五反斗争的电报·····395
(1952年2月23日)
- 关于同意罗瑞卿对三反中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意见的电报···396
(1952年2月23日)
- 中央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397
(1952年2月24日)

- 关于检查和报告西安市五反斗争实际情况致习仲勋电……………398
(1952年2月24日)
- 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奸商借公私合营损公肥私的报告的批语……………400
(1952年2月25日)
- 对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的批示……………402
(1952年2月25日)
- 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403
(1952年2月26日)
- 关于加强对陈嘉庚保卫工作的批语……………404
(1952年2月26日)
- 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405
(1952年2月27日)
- 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复高岗电……………407
(1952年2月27日)
- 对宣传第一批女飞行员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08
(1952年2月27日)
- 对新乡地委打虎经验的批语……………411
(1952年2月27日)
- 中央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批语……………412
(1952年2月28日)
-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五反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413
(1952年2月29日)
- 对陈毅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414
(1952年2月29日)
- 对李富春关于起草追赃问题文件的来信的批语……………416
(1952年2月29日)

- 对东北贸易部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的经验的批语……………417
(1952年2月29日)
- 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418
(1952年3月1日)
- 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中发生错误的检讨上的批语……………419
(1952年3月1日)
- 对李富春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的批语…421
(1952年3月1日)
-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22
(1952年3月1日)
-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23
(1952年3月2日)
- 中央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425
(1952年3月2日)
- 转发刘澜涛关于华北破获两起大案的报告的批语……………426
(1952年3月2日)
- 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报告的批语……427
(1952年3月3日)
- 中央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428
(1952年3月4日)
- 关于中央各部在三反中应指导下级的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批语…430
(1952年3月4日)
- 关于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复高岗电……………431
(1952年3月4日)

- 对新疆党政军机关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432
(1952年3月4日)
- 关于谭震林、陈丕显任职问题的批语和电报·····433
(1952年3月4日、9日)
- 对林业部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报告的批语·····435
(1952年3月4日)
- 在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436
(1952年3月4日)
- 转发华东军区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指示的批语·····437
(1952年3月4日)
- 关于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等的批语·····438
(1952年3月4日)
- 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439
(1952年3月5日)
- 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442
(1952年3月5日)
- 对二十二兵团清算贪污的时间界限的批语·····446
(1952年3月5日)
- 转发新华社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批语·····447
(1952年3月5日)
- 转发中央政法干校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448
(1952年3月5日)
- 对聂荣臻、粟裕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的批语··449
(1952年3月5日)

-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450
（1952年3月5日）
-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所写的
批语和通知·····451
（1952年3月6日）
-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纪凯夫案件精神的两个文件的批语··453
（1952年3月6日）
- 对华东局第八号打虎战报的批语·····455
（1952年3月6日）
- 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456
（1952年3月7日）
- 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致叶剑英电·····457
（1952年3月7日）
- 在中央关于三反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458
（1952年3月7日）
- 对武陟等县关于追赃的几项政策规定的批语·····459
（1952年3月9日）
- 在聂荣臻关于国内防疫工作报告上的批语·····460
（1952年3月9日）
- 对钟赤兵关于民航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的建议的批语·····461
（1952年3月11日）
- 中央对西北局关于开展五反的步骤和策略报告的复电·····462
（1952年3月11日）
- 给程潜的信·····464
（1952年3月11日）

- 给周世钊的信·····467
(1952年3月11日)
- 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68
(1952年3月11日)
-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和五反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69
(1952年3月13日)
- 转发五台县委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报告的批语·····471
(1952年3月13日)
- 中央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472
(1952年3月16日)
- 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上报的防疫工作资料的批语·····473
(1952年3月16日)
- 关于要新华社向各地通报五反的好经验给杨尚昆的信·····474
(1952年3月16日)
- 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475
(1952年3月17日)
- 军委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指示的批语··476
(1952年3月17日)
- 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7
(1952年3月18日)
-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权五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8
(1952年3月18日)
-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报告的批语··479
(1952年3月20日)
- 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81
(1952年3月22日)

-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五反的报告批语的批语……………482
(1952年3月22日)
- 彭德怀回国治病陈赓去朝代理指挥……………484
(1952年3月22日)
-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485
(1952年3月23日)
- 中央转发徐子荣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的批语……………488
(1952年3月24日)
- 在中央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489
(1952年3月)
- 同意建立军事工程学院……………490
(1952年3月26日)
-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批语和意见……………491
(1952年3月27日)
- 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493
(1952年3月27日)
- 给李达的信……………494
(1952年3月27日)
- 中央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495
(1952年3月28日)
- 对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两文件的批示……………496
(1952年3月29日)
- 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97
(1952年3月29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批语……	498
(1952年3月29日)	
关于要新华社选送五反材料的批语……	500
(1952年3月30日)	
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修改……	501
(1952年3月)	
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	502
(1952年4月1日)	
在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503
(1952年4月1日)	
为转发一封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来信的批语……	504
(1952年4月3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的批语……	505
(1952年4月4日)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 检讨的修改……	506
(1952年4月4日)	
中央关于广州市五反工作的指示……	508
(1952年4月5日)	

给傅种孙^[1]的信

(1951年10月23日)

傅先生：

汤先生^[2]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3]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三日

[1] 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2] 指汤孟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逝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

[3] 《数学杂志》，1936年8月1日在上海正式出版，是我国第一份全国性的数学普及刊物。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9年至1950年被迫停刊。1951年11月复刊，改名为《中国数学杂志》，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刊名，1953年更名为《数学通报》，请郭沫若题写了刊名。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9年7月复刊至今。

傅种孙 冯先生追悼会者表示悼唁 匡信如数
北京师范大学学样法字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毛主席：

弟因冯先生逝世甚感哀悼，因弟同冯先生交往甚
主席悼念之意，仰见故墓树成，马胜敬佩！除按拟
办法（需有殓葬之费，待村间支，薪水待至今年终了，子女
介绍到免费学校，给人介绍工作，）已不却候此外，又由
我校共九三学社及中国数学会共同追悼会，并附上追悼
启事一纸，筹备会同人意欲请主席赐一挽联或学校
悼词等。此意弟已函托田同志转陈，想蒙 俞允也。

又

中国数学杂志

创刊号出版在即，中国数学会同人欲请主席
笔题此六字，以光篇幅。事关人民学术，想亦
人民领袖所乐为也。敢以为请。

谨致 敬礼！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五日

傅种孙 1951.10.21

毛泽东致傅种孙信的手稿。

中國數學雜誌

中國數學雜誌

中國數學雜誌

毛泽东为《中国数学杂志》题写的刊名。

关于通过和发表抗美援朝决议问题 给周恩来的信

(1951年10月24日)

周：

既然有各民主党派作了演说，抗美援朝决议^[1]似乎还是今日通过明天发表为好。

毛泽东
即

[1] 指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于1951年10月24日通过，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致达赖喇嘛^[1]电

(1951年10月26日)

达赖喇嘛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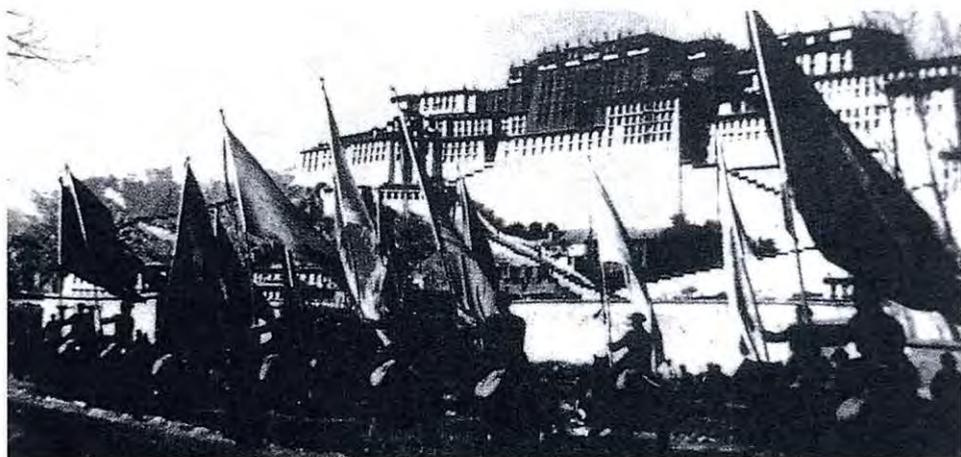
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2]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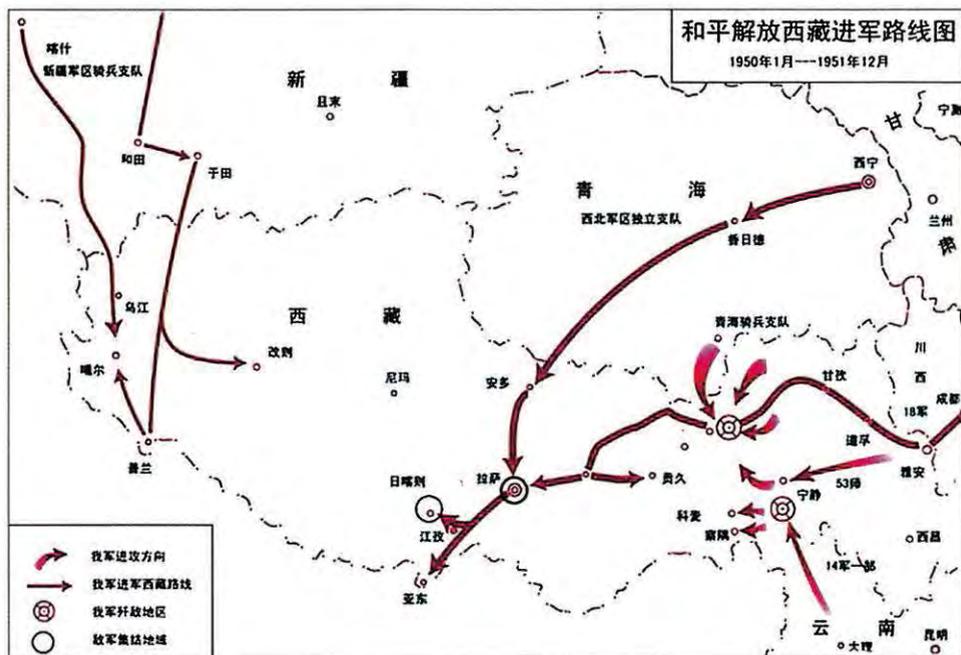
十月二十六日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愿意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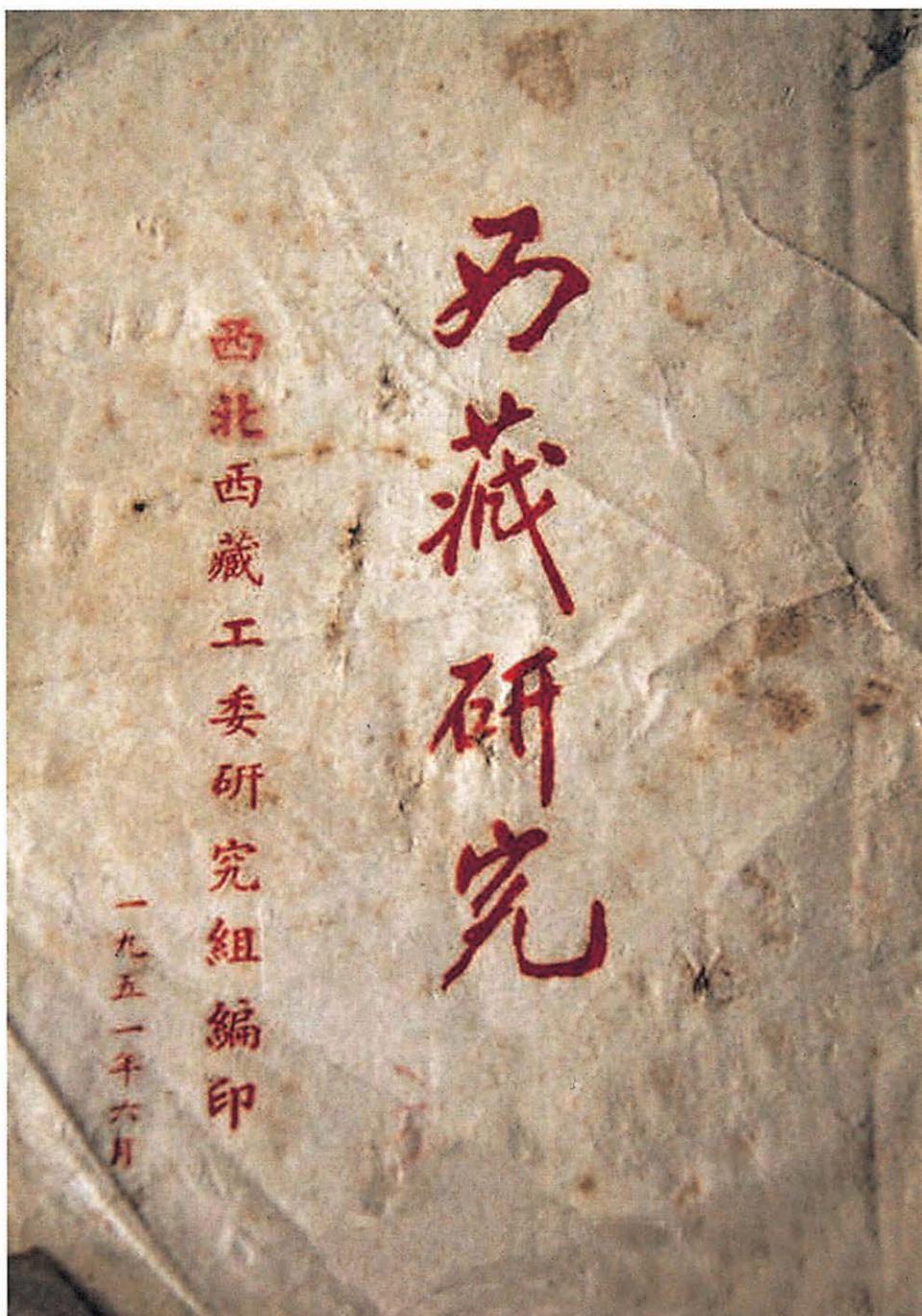
[2]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即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实现了除台湾省和沿海一些岛屿外，全国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图。



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发放的学习材料——《西藏研究》。

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 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1]上 加写的两段话

(1951年10月)

一

委员们和诸位同志，我认为有使同志们明了目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种反革命活动提高警惕的必要，否则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当。

二

当然，我举出这些材料，不是说反革命活动比较一年前还更严重了，当然不是这样，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准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作报告的草稿。

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上加写的两段话

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对朝鲜战场兵力调整 和补充报告的批语^[1]

(1951年10月)

同意^[2]，请周^[3]、聂办。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10月17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最近志愿军在阻击作战中是极为英勇顽强的，一个阵地虽遭敌发炮二三万发，工事被摧毁，但在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作战下，均反复争夺10余次（多达15次），致给敌打击极重，战果辉煌。鉴于第二十兵团的伤亡情况及正面较宽（含第二十六军正面70余公里）及第二十六军长时间未得休整等情况，为防万一，建议第二十兵团方面再增调一个军作为机动部队。另为适当地补充第二十兵团及第十九兵团（含第四十七军），拟将中南已训练了4个多月的新兵，调3万人于本月底以前集中到东北，准备敌攻势一被粉碎，即行补充。周恩来10月17日批示：“与节约兵力无碍，妥否，请主席批示。”

[3] 周，指周恩来。

关于徐向前^[1]免兼华北军区 副司令员的批语^[2]

(1951年11月1日)

—

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二

向前同志：

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

[1] 徐向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因病休养。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11月1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请示信上写的两条批语。聂荣臻在信中说：“为加强华北军区工作，提议以杨成武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同志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中央印发关于清理 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 和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11月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及工会党组：

兹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并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十一月五日

[1] 中共中央1951年11月5日发出的这一指示，分析了全国解放以后厂矿交通等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状况，指出了对这些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对国营企业内部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指示对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政策界限问题，防止反革命破坏问题，保持生产正常秩序问题，以及后期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1年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个人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致衷心的祝贺。

请让我祝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正在开始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种成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获得了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无限勇气。

请让我祝贺苏联的和平政策的伟大胜利，这种胜利挫败了战争挑拨者的可耻阴谋，团结了全世界的和平人类，使他们相信和平可以战胜战争。

请让我祝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亲密的不可动摇的伟大友谊，这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友谊，是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必然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 北京

致达赖喇嘛电

(1951年11月10日)

达赖喇嘛先生：

十一月四日来电悉，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入藏^[1]事宜，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十世班禅，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西藏上层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避居内地，因西藏地方当局阻挠，一直未能返回西藏，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去世。1949年6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继位后，仍留居青海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鉴于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意愿，和为了促进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支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的准备工作和护送工作。1951年12月2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从青海西宁起程，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6月8日回到后藏日喀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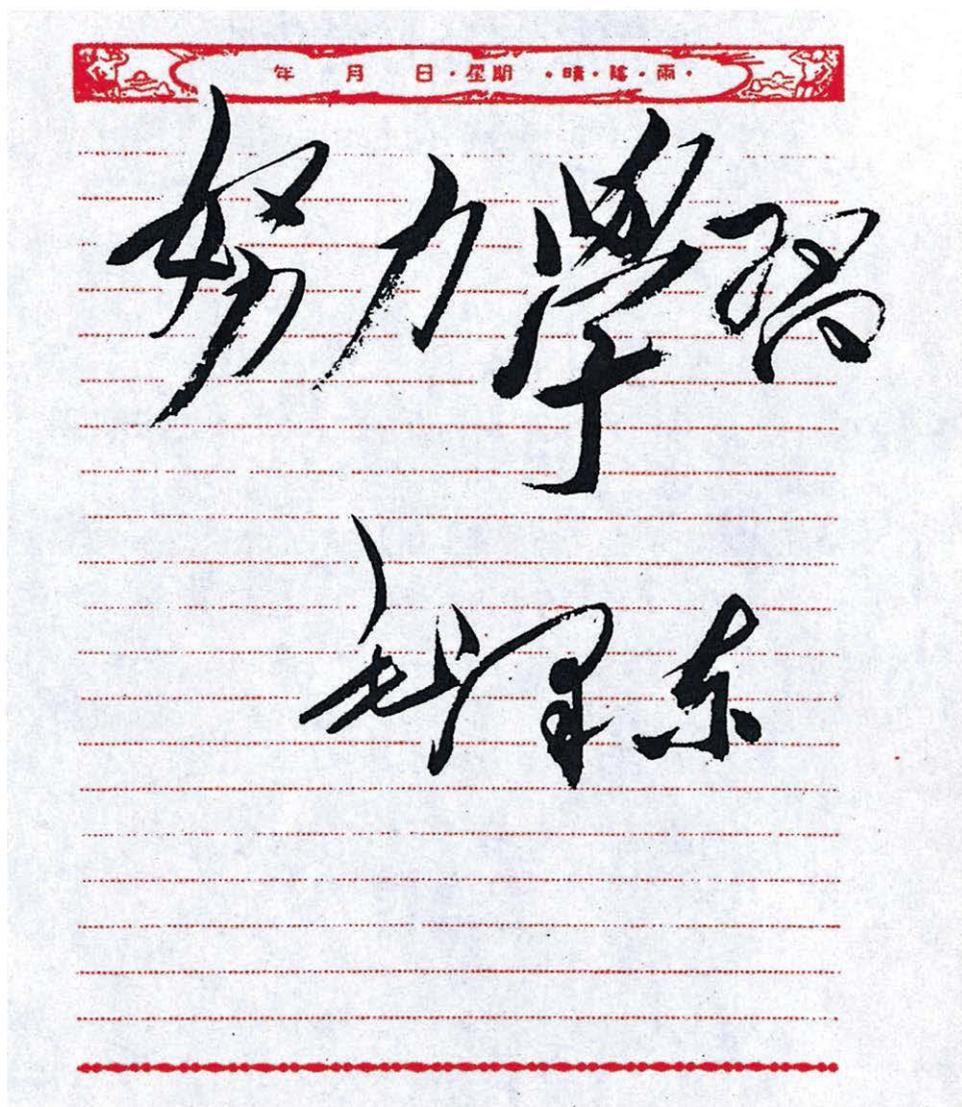
为张仙朋^[1]题词

(1951年11月10日)

努力学习。

毛泽东

[1] 张仙朋，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



毛泽东为张仙朋的题词。

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 布置致彭德怀等电

(1951年11月11日)

彭、邓、陈^[1]，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

十一月八日来电^[2]收到。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

[1] 彭、邓、陈，指彭德怀、邓华、陈赓，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指1951年11月8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关于精简节约的布置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电报。电报说：听了邓华传达中央关于紧缩军队，节约增产，来克服财经困难，以利继续支援朝鲜作战与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军事工业的决议之后，一致认为中央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就编制的整理问题、节约问题作了布置：裁并兵团、军、师直属机关；减少机关人员和勤杂人员；严格车、马配备；减少在朝人员，多余民工、徒手炮兵、老弱残疾人员精简回国；严格注意防空，不断改善运输、装卸、保管及分配方法，以减少途中与终点损失；号召全体指战员十分注意爱护物资，节约使用，并尽可能利用缴获物资武器；提高射击技术，精确瞄准，严格纠正浪费弹药的现象。

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收到
 十一月八日來電
 諸同志 1951.11.11.
 彭鄧陳並志願軍黨委十一月八日來電
 我們認為志願軍黨委決定各項是正確的
 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們在朝鮮我
 們在國內一致配合進行大規模的精
 簡節約，加^{上國內的}增產運動，（切实可行的）
 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確有把握
 完成任務了。我們和敵人進行的談判能成功固好
 （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成功也確有把
 握。我們

握使戰爭繼續打下去直到爭取勝利為止，同
 時毫不妨礙國內^的國防建設和其他建設，
 各項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發展下去
 了。毛澤東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致彭德怀等电》
 的手稿。

为审阅中央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稿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11月12日)

刘、周、朱、彭真、胡乔木、杨尚昆^[1]同志：

此件^[2]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3]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用。

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稿。这个指示于1951年11月30日印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青年团团委。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罗查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1年11月12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大不列颠爱尔兰暨英国海外诸自治领国王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巴两国人民间存在着长期的友谊。在促进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及争取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上，贵我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中巴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增进与巩固，而且必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关于为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 给周扬^[1]的信

(1951年11月13日)

周扬同志：

(一) 题字^[2]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 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毛泽东为皖北区滁县专区文工团的题词“面向农村”。

为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

(1951年11月13日)

面向农村。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面向農村

毛泽东为滁县专区文工团的题词。

在中央给张经武^[1]的电报稿上 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11月14日)

因达赖送礼事^[2]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3]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 指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送礼物一事。中央在给张经武的电报中，指示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只要送毛主席一份礼物即够，且礼物不要多。锦旗外，送什么东西，由他们决定。但除供陈列的文物外，土产和用品都不要送（都是取之于民的东西），或尽量少送。此外，向朱总司令、周总理送一面锦旗，对其他负责人均不要送。”

[3] 国华，即张国华，当时任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

给马寅初的一封信

(1951年11月15日)

寅初：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认为（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谈此问题）是正确的，请马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节录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向中央报告
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电文

“……（三）转入正常学习，又须防止过去加多课程硬赶功课的偏向。从此次参加军校学生之体格检查中，即可看出，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学生体质虚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来，

各地也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之原则，因此造成公立学校之体格最差，大学较中学又差的现象还严重存在，这点应引起十分警惕。应按华东局高教会议的规定，适当减少正课时间，照顾学生健康需要。……”

毛主席批语：这是正确的。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 工作计划的批语

(1951年11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华北局十一月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1]一份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订定工作计划的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1951年11月13日关于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1952年工作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谈到，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了1952年工作纲要、把领导重点放在工业上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和精简节约反对浪费四个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文件。会议确定：（一）结合今冬明春的整风运动，进行一次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资产阶级影响的思想教育。（二）华北局、省委和省属市委，从现在起，把自己的领导重心进一步明确地转入工业生产。（三）华北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工业上来，但决不能放松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省委仍需重视领导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地委和县委除了以一定力量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外，必须以极大的力量领导农业生产。（四）关于整党和整风，拟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五）华北各省和内蒙都有部分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长时期注意救灾工作，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关于1952年的工作大纲，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继续取缔帝国主义操纵的“圣母教”，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10项工作。

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大纲，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对中宣部、文委的机构设置 和人员配备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16日)

乔木^[1]同志：

此件^[2]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3]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4]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3] 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4] 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关于张经武^[1]留藏工作的批语^[2]

(1951年11月16日)

张经武数日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3]电知。

毛泽东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1951年11月15日建议组织中央西藏分局，并以张经武为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上。毛泽东除写了上述批语外，还将这个报告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李维汉阅看。

[3]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对胡乔木关于院系调整问题给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 彭真的信的批示^[1]

(1951年11月17日)

我认为可行，请周酌定，并通知各大区照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1] 1951年11月7日，胡乔木就院系调整问题给毛泽东等写信。信中说：“兹送上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发展方案和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调整方案的两个报告，请审核指示。北京三校调整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组一调整委员会详商，其原则望中央早日核准以便进行具体商讨。”

转发中财委关于交通部党组对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11月17日)

周^[1]：

此件^[2]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财委分党组1951年11月13日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通报附有交通部党组11月6日给陈云并转周恩来的检讨报告。中财委在通报中指出：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的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责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而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决定，除检讨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帮助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加决定。这决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须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酌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可以不事先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一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只要领导上掌握得好，这并不坏事，反而更活泼些。（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每天在做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以上4点，是年来我们与党外人士合作得来的初步经验。

转发中财委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的通报的批语

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请书。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11月18日)

介侯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璪真^[1]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1] 汤璪真（1898—1951），湖南省韶山市杨林乡云源村人，数学家。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广州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理事兼北京市分社理事等职。1951年10月9日病故。丧葬期间，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悼念。

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1]

(1951年11月18日、12月15日、12月23日)

—

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2]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1] 毛泽东1951年11月18日的批语，写在河北省委党校干部阴一刚、罗云路10月27日给毛泽东来信的提要上。来信对《华北建设》第一一八期上刊载的《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提出意见，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12月23日的批语，写在刘少奇12月19日对毛泽东12月15日来信的复信上。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二

少奇同志：

游览情形好否？谅已到达杭州。

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1]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一件，安子文报告^[2]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

[1] 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后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等来信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把信批给安子文，要他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毛泽东同意改正这一提法，并写此信征求刘少奇意见。刘少奇很快复信同意。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 指安子文1951年11月关于修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一提法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

此间各事均好，勿念。

祝你们安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三

周、朱、陈、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1]同志：

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2]，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三日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后面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最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转发高岗^[1]关于 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2]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高岗在这个报告中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斗争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以解释。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但东北局只去电。
 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門首长，中央政府
 各局。

附註：No. 400
 內容：尚混办。1951.11.20
 各同級政府交各同級政府

各中央局，^{清卷 Q若}並轉令各省市區党委，^告告中央和軍
 委各部門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門党组：
 茲將高崗同志於十一月一日所作關於開展
 增產節約運動，^{此項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的報告一件及給你們
 請你們重視這個^{鬥爭}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
 在此次全國^{範圍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
 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
 鬥爭。~~此項運動~~在展開
 鬥爭之後，每一部門都要派出^{總括經驗}檢查組檢
 查所屬的情況，向上級和^{必要的}中央
 作報告。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东北局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关于谈判军事分界线问题致李克农^[1]电

(1951年11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2]：

望即根据你们十一月十九日廿四时来电所提三条^[3]在二十一日小组会上提出。惟二十天仍改回为三十天，即同意敌人所提的时间，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李克农1951年11月19日24时电向毛泽东报送的协议修正案中提出的3条。修正案说：“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兹达成以下协议：（一）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双方各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为原则。（二）双方小组委员会应立即根据前条原则，校正现有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而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二公里之线，即成为非军事地区的南北缘。（三）鉴于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至停战协议签字为止，如果代表团大会批准本协议及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的具体位置后的二十日内，全部议程已经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已经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地区应不再变更。如超过二十天，而全部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则应按照停战协议及签字前的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加以修正。”

在三十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十八时

空军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1]

(1951年11月20日)

亚楼同志：

意见^[2]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圣诞节以前，有停战的极大可能。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1年11月19日17时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等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根据昨天《人民日报》的消息看来，停战谈判最近可能会有头绪。我们正在设法，更加抓紧时机，尽量求得能使更多的空军部队得到实战锻炼机会，即使稍微冒一点险，也是值得的。具体的方法，就是完成了起码的作战准备工作以后，迅速投入战斗。每个部队不必打得太久，以便让出位置给别的部队去打。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21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

河北省委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1年11月13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给华北局的综合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并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组织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作为推动生产的主要动力。（二）战胜自然灾害，是实现农业增产的关键性的问题。（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加强技术指导。

给王首道^[1]的信

(1951年11月21日)

首道同志：

请酌予此人^[2]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3]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一日

[1] 王首道，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2] 指李醒安，原名李廉翹，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员。

[3]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李维汉^[1]的信

(1951年11月22日)

李维汉同志：

周世钊^[2]兄等数人（又陈奎生^[3]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周世钊，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3] 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楚怡、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 全国农业生产计划的批语

(1951年11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财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所作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发给你们阅看。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1951年11月2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 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二) 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三) 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给薄一波^[1]的信

(1951年11月27日)

一波同志：

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廿八日开会^[2]前印好（印十余份），廿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四时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中央转发邓小平^[1]关于西南区党政军 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一) 你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

(二) 除早已将西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转发你们参考外，现又将小平此电转发你们参考。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 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11月3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青年团团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1] 中共中央1951年11月30日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 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1月3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1951年11月29日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投入地委机关生产，做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其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0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两千万之巨）达1.3亿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1.5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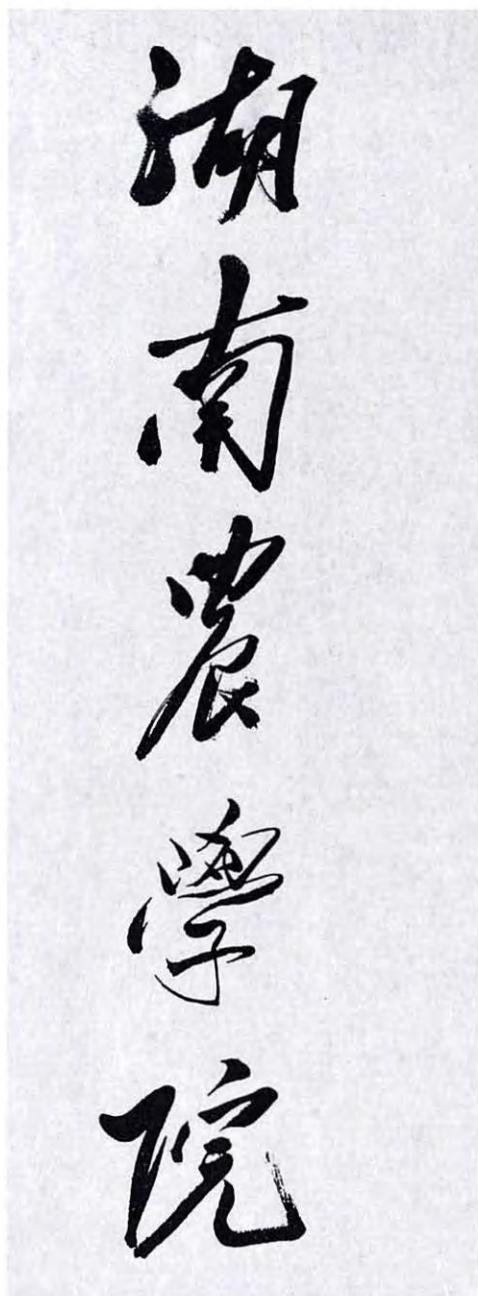
十一月三十日

为湖南农学院题名^[1]

(1951年11月)

湖南农学院

[1] 1951年3月9日，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与湖南大学农业学院合并组建“湖南农学院”，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199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湖南农业大学”。



毛泽东为湖南农学院题写的校名。

为贵州大学题名^[1]

(1951年11月)

贵州大学

[1] 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10月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11月，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



毛泽东为贵州大学题写的
校名。

中央关于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 致薄一波、刘澜涛^[1]电

(1951年12月1日)

薄一波、刘澜涛同志：

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即对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唐山市粮食公司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非，山西交城县县长张进才，辽东工业厅驻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1年12月1日、2日)

—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件发给你们，望你们遵照执行。关于阅读本决定的干部的范围，依照本决定第五项的规定^[2]，请注意组织阅读和传达。志愿军方面应在适当时机由志司组织集体阅读，而不要将文件下达。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1] 本文第四、第五、第六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即本文第六部分。

二

周^[1]：

此件请你重打清样两份，一份存你处，一份连原稿交我再看一次。打清样时请校对勿错。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三

周：

此件已作第二次修改，有些是我修改的，有些是采纳各同志的意见，请你加以斟酌。再打清样两份（校正勿讹），一份用电报发各地，一份印发中央一级各处及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交尚昆办。

我第一次修正原稿一份，各同志修正稿六份，均还你（只有林彪^[2]的未见交来），均请销毁。第一次发给各同志的原稿，亦请收回销毁。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1] 周，指周恩来。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四

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而为实现上述计划而斗争。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五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

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六

本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地委和军队的军党委。在省委或地委召集县委人员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人员开会、在省军区或军党委召集军分区和团级以上人员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其他干部相当于县委团党委和大城市区委一级者均应使其有阅读的机会（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但不得让不可靠的分子阅读，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并不得遗失。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给郑振铎^[1]的信

(1951年12月3日)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2]先生经陈叔通^[3]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4]，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顺祝
健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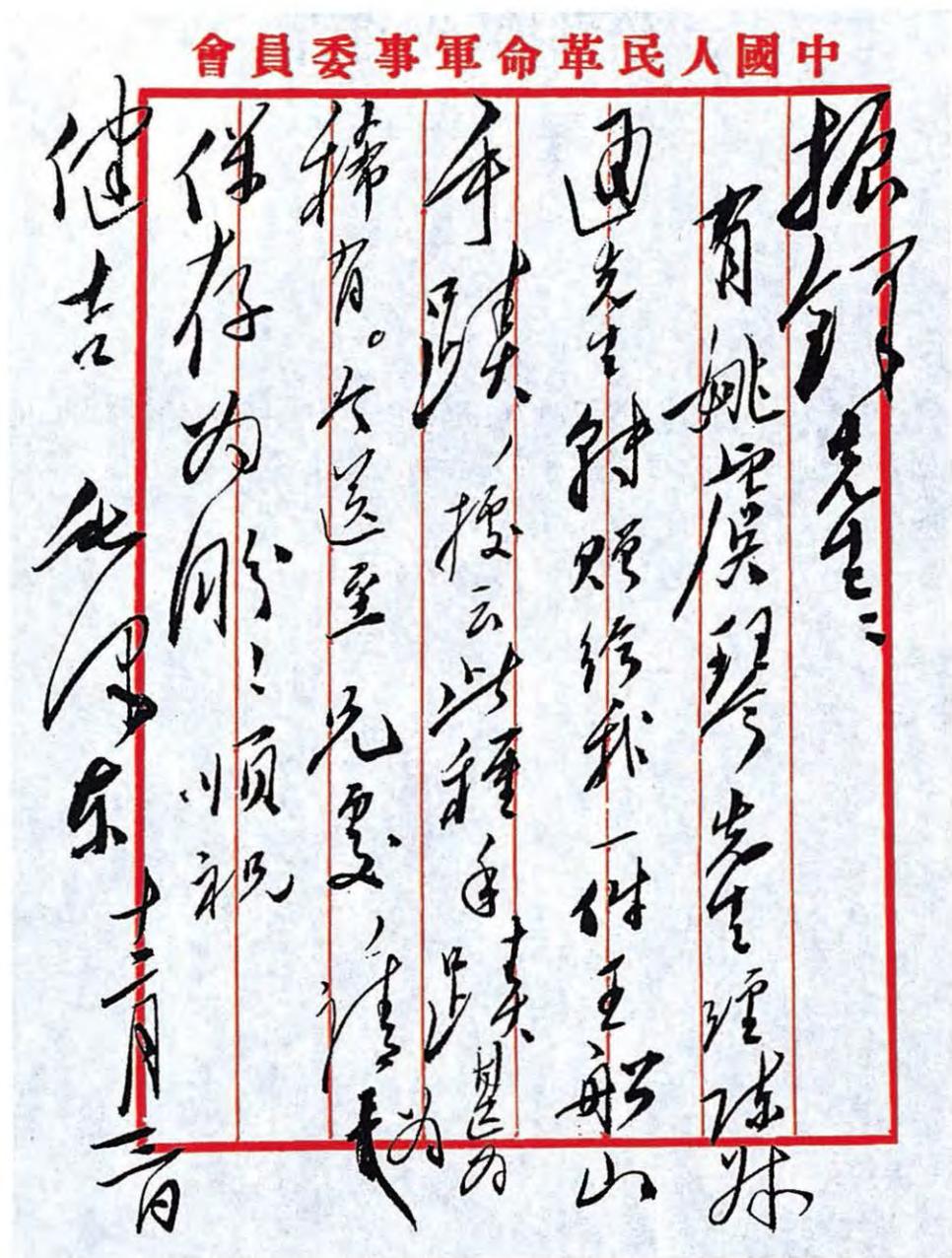
十二月三日

[1]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2] 姚虞琴，画家。

[3] 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 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



毛泽东致郑振铎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把领导重点转到 工业生产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 两个决定的批语

(1951年12月4日)

华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并请各中央局转发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 华北局送来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均收到了，中央批准这两个文件，认为是正确的(只作少数文句的增加和修改)；(二) 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区委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

给董必武^[1]的信

(1951年12月4日)

必武同志：

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2]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可以连同你此信^[3]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又及

[1] 董必武，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2] 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信。董必武在信中指出，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经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3] 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他在1951年10月18日关于同一问题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 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指示

(1951年12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 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二) 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內，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三) 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

[1] 中共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市委决定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的检举，来配合领导上的检查，开展全市反贪污运动。具体办法是：第一，由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地自上而下进行检查，揭露贪污分子；第二，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第三，号召与发动全市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及其他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第四，抽调可靠干部，组织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

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告』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二十时

中央转发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 反贪污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各大军区并请即转军事系统直到团级为止；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二）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1]，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三）本指示及中央贸易部党组的报告应给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

[1] 即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转发装甲兵司令部 关于精简节约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军事学院，志愿军党委：

(一) 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 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 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 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交换战俘的批语^[1]

(1951年12月7日)

周^[2]阅。

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情报司编的一份临时通报上，其中摘报了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的3条新闻。11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说，“上星期列为美国死伤人数的九九，二二六名中，目前失踪的人数为一〇，八三六名，另确知被俘的仅一七四人”。12月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有“这一点亦可注意”。

[2] 周，指周恩来。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 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

(1951年12月8日)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十二月七日十五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十二月四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一）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二）中央于十二月四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十二月五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十二月七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十二月四日指示中说清楚了。（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福建省委等的电报。

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一九五二年 华东工作纲要的批语

(1951年12月8日)

华东局，告各中央局，并请转所属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一) 华东局十二月六日来电及一九五二年华东工作纲要^[1]均收到，中央批准这个工作纲要；(二) 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

中央

十二月八日

[1]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1952年的工作纲要包括10个部分，即：(一) 抗美援朝。(二) 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三) 城市工作。(四) 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五) 建政工作。(六) 整党建党工作。(七) 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八) 镇压反革命工作。(九) 统战工作。(十) 青年妇女工作。

给钟志刚^[1]的信

(1951年12月8日)

志刚先生：

来信收到，谨致谢意。此复，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1] 钟志刚（1890—1956），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人，农民。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中央批转罗瑞卿^[1]关于公安系统 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의批语

(1951年12月9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分局、省市區党委；各大军区，转各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一) 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关于在中央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 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三) 将这个报告一直印发到县级和团级，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四) 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已于今年五月开过), 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 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 亦应照此办理, 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转发总政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一) 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发展文艺工作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并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遵照执行。

[1] 军委总政治部这个报告的要点是：(一) 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方针是：要求全军普遍消除现有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将其提高到初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初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提高到相当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二) 全军人员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三) 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的执行，应由党委领导，首长负责。并在团以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加强指导。文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领导进行。(四) 在全军推行由西南军区十六军文化干事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五) 为达到文化教育的效果与目的，在节约原则下，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质保证。(六) 1952年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于进一步提高部队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树立对美帝国主义长期斗争的思想，增强高度的战争意识，防止产生新的松气麻痹思想。(七) 大量裁减那些不十分必要的报刊，集中力量办好必须要办的报刊。(八) 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全军开展一次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的学习，以保证部队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二）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转发邮电部党组 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

兹将中央邮电部党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中央
十二月十一日

[1] 邮电部党组1951年12月7日的三反报告指出，邮电系统的贪污案件，除一般旧社会常有的类型外，尚有与专门业务相结合的专业贪污案，且极为普遍。贪污腐化现象滋长的原因，一是全国解放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尚未形成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加之党内生活、政治教育不健全，资本主义反过来引诱与腐蚀我们；二是县邮电局多原封未动，领导方面忽视了县局的改造与加强；三是对惩治贪污犯采取了姑息态度，片面地理解“不能轻易开除人”与“不能造成工人的失业”，客观上助长了贪污腐化的风气。

中央转发铁道部党组 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无铁道的地方不必转）：

（一）兹将中央铁道部党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一份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二）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中央

十二月十一日

[1] 铁道部党组1951年12月7日关于三反的报告，具体分析了铁路系统贪污浪费的情况，作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先发动反贪污斗争的决定。报告指出，要通过这一斗争对贪污现象和大贪污犯以严重的打击，给浪费现象以大量的揭发，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育，教育群众保护国家财产，严格划分公私界限，造成鄙视贪污浪费的新道德观念，对铁路队伍再一次从思想上进行整顿，为增产节约运动打下巩固的基础。具体办法是：1. 成立各级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反贪污斗争；2. 突破一点，抓住典型进行宣传教育；3. 深入动员，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自己坦白与别人揭发相结合；4. 搭配骨干组织检查组。

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 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一) 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后勤部委员会1951年12月8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并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后勤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曾于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底，进行了一次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揭发了一批贪污分子，并分别给予军法、行政、党纪的制裁。但因为没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在领导思想上也仅仅是从爱护祖国财产出发，还没有特别强调通过这次运动来加强全体干部的阶级观点，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因此，某些单位执行极不深入，个别部门甚至不认识，致使运动过后又松懈下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联系到官僚主义作风，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化堕落分子，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处理。因而运动之后，贪污、浪费、拐款潜逃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根据上述情况和中央指示，我们决定在后勤部门开展一个普遍深入的长期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首先以两个月时间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大张旗鼓地广泛教育发动群众，从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展开反浪费入手，继而启发坦白，号召揭发，进入反贪污斗争，然后进入各级领导对于官僚主义的检查。

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二件。第一件是装甲司令部许光达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

（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给毛泽连、毛远悌^[1]的信

(1951年12月11日)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2]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1]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毛远悌，毛泽东的远房侄子。

[2] 慰生六婶，毛泽连的母亲。

对湖北省委关于违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2日)

周、陈、薄、乔木、林彪阅。

(一) 此报^[1]是给中南局并告中央，是否即由中央予以答复^[2]，或待中南局有所表示后中央再予答复，请陈薄酌定；(二) 关涉人民日报之处^[3]，请乔木查明，并确定办法，告我。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1年11月30日关于违背中央人民政府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给中南局并报中央转毛泽东的检讨报告。

[2]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中央就湖北省委检讨报告所拟的复电稿而言的。毛泽东在审阅这份复电稿时，还在最后加上“请你们令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予以转载，此项争论即告结束”一句。

[3] 中共湖北省委在检讨报告中说：“11月6日，人民日报经济栏提出对省委的批评，词严义正，我们非常感激，并已送去书面自我批评，公开自我检讨。但迄今已半月，并未刊出，不知是否该批评书有不当之处，望予指出。”在报告中“提出对省委的批评”一句旁，胡乔木注有：“此批评系一波同志在与子恢同志把意见谈一致以后告人民日报发表者。”在“并已送去书面自我批评”一句旁，胡乔木还注有：“此自我批评在11月25日才收到，27日由一波同志看过后退回，29日已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栏，按原稿全文登出。”

复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电

(1951年12月12日)

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同志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 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1]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报告中对华北地区党政军系统及厂矿企业中的贪污和浪费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贪污浪费之所以严重，一是我们的国家和经济机关中有大量的从国民党官僚机关中接收来的旧人员，二是不少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侵袭，滋长了享乐思想，发生严重贪污浪费行为，张子善、刘青山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更坏的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抱着一种庸俗的迁就宽容态度，某些单位和部门甚至邪气压倒了正气。报告说，为了彻底肃清严重贪污浪费现象，必须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包括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为此决定：一、首先通过各级党代表会议及各种干部会议，在党内，在一切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军事机关中进行传达动员，说明方针，交代政策。然后在协商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提出报告，进行动员，作出决定，以便有力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帮助党和政府开展这个斗争，揭发和检举贪污罪犯。二、为领导好这个规模广大的群众运动，各级均须建立包括党内外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精简节约检查委员会，党委的负责同志必须参加进去，直接领导，首长负责，亲自领导。三、对妨碍反贪污运动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都应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予以批评、纠正和驳斥。四、必须普遍开展这个运动，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例外，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重点，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雷厉风行，又要慎重分析。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华北局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华北党政军各部门内统一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望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这个斗争。（三）应将华北局这个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一）中央批准华北局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华北党政军各部门内统一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望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这个斗争。（三）应将华北局这个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 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

(1951年12月13日)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
区党委：

(一) 中央批准中南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
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方针的报告^[1]，认为
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
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
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
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
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报告反映，目前土改工作中急躁情绪、松懈空气
和精力分散现象弥漫各方。一是领导机关急于完成土地改革，赶建设；二
是老干部急于离开农村，赶城市；三是新干部急于过关毕业，到机关当领导
干部；四是政府各部门和人民团体迫不及待地要利用土地改革基础，实施一
大堆计划；五是去年工作有点成绩、经验，成了不少同志的包袱，而真有经
验的干部实际并不多；六是国内无战争，又有大批武装镇守四方，工作弱
点一时不易暴露，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清醒；七是农民干部想早退坡，农
民想早分田，地主也想早混关。这样，就形成不顾成效、不惜偷工减料以
急赶任务的情形，从而形成今年工作中的最大危险。

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南局，呈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
请转告各省市党委。（一）中央批准中南局十月
十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
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
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
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半，但尚有半
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给各
省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冒进
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

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
时的和完全必要的。①请各省市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
适当和转移不适时。②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
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的手稿。

转发习仲勋^[1]关于西北地区 反贪污斗争报告^[2]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仲勋同志，并告漱石、陈毅、子恢、谭政、剑英、小平、贺龙、一波、澜涛、高岗、德怀诸同志：

仲勋同志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一个彻底的反贪污斗争的电报，已收到了。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习仲勋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西北局扩大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报告说，接到中央12月4日指示后，特于8日召集纪委、检察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的负责干部座谈了一次。初步了解，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察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旧币）。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京、津、沪等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一批干部，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这些事实，说明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我们计划于12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2月中旬结束，准备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系具体实例，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1]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仲勋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对外交部转发张闻天^[1]关于 我驻东欧使馆工作报告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外交部：

这个文件^[2]看过，很好，照发。

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3]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指外交部分党委1951年12月13日为转发张闻天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给苏联及东欧各使馆并各支部的电报。电报指出：（一）目前各使馆的工作中心，是逐渐转向研究与报道驻在国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研究驻在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种建设的经验和外交工作的经验。（二）为了加强研究驻在国的情况，首先必须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尊重与热爱驻在国的政府和人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三）各使馆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党支部要教育党员努力达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外交工作干部的4条标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四）关于使馆编制及内部组织，外交部正在研究，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凡使馆干部及公务人员均有首先学好驻在国语文的义务。

[3] 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

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1年12月13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转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2]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3]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毛泽东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一起。

中央转发高岗^[1]关于工矿企业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4日)

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

高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在工矿企业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2]，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十四日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高岗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个报告中说：（一）自毛主席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作为今天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后，东北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更加提高，增产节约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截至10月底，各工业生产部门，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外，已为国家创造了价值1000多万吨粮食的财富。（二）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深入车间，面向车间，加强车间工作，是目前工业部门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三）为了搞好车间工作，应着重做好3件事：（1）做好车间的政治教育工作。（2）做好车间的技术管理工作。（3）做好工资与福利工作。

给杨立三的信

(1951年12月14日)

杨立三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致共产主义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 决议草案的通知^[1]

(1951年12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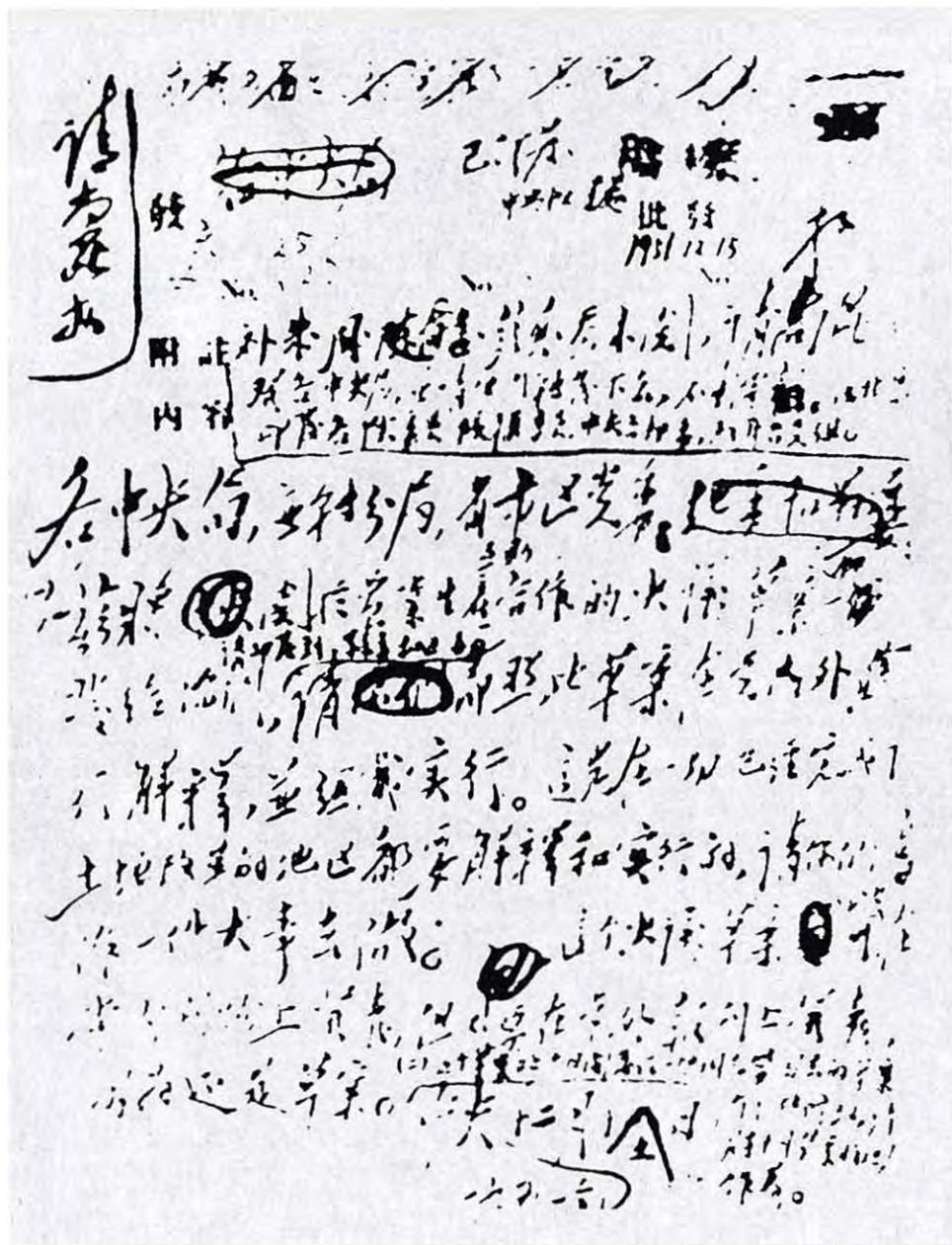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51年9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在农村实行互助合作的集体道路。图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的手稿。

中央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 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1]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告志愿军党委：

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中央
十二月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12月15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

转发陈毅^[1]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 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5日)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中央局，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2]收到。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1年12月12日关于华东部队精简节约、反对浪费给毛泽东并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1952年3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在3月之前，节约方面主要是严格执行供给标准和财经制度，停止一切不必要的修建计划，并严禁一切请客、送礼；对已发现的贪污浪费事件予以严肃处理，并在全军中结合整编动员进行初步的节约教育。至于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3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中央转发平原省委关于干部中 贪污腐化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平原省委这一文件^[1]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贪污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中央
十二月十五日

[1] 指中共平原省委1951年12月10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给各地市委并报华北局的通报。通报指出，据省纪委上半年统计，违法违纪受处分的区以上干部中，因贪污、受贿、蜕化等而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工作等各种党纪处分的占65%。据检察署对14个县的统计，1至8月的违法案件中，贪污渎职的占47%。贪污问题绝不是个别的人或个别部门的问题，已是较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罗荣桓^[1]等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 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 建议信上的批语^[2]

(1951年12月15日)

这样规定是适当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周、朱、林、聂^[3]阅，退荣桓办。

[1]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

[2] 这是毛泽东在罗荣桓、赖传珠（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军委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1951年12月14日关于军队干部任免、处分及以军委名义下发的文件审批办法的建议信上的批语。罗荣桓等在信中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

[3]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在罗荣桓等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建议信上的批语

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 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7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

[1] 中共中央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分析了西南地区贪污浪费严重的原因，指出，虽然各级领导引起了若干警惕，并曾进行过一些反贪污斗争，也曾处分过一些人，但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因此效果并不大，贪污之风并没有停止，而且继续在发展，特别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差。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决定：（一）依照中央指示，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并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和检查小组。（二）各级负责同志，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并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此项运动。（三）认真地组织文件的阅读，充分地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和当前各项主要工作结合起来，并通过此项运动推动各项工作。（四）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把本单位自行检查、专门小组的重点检查、各单位的相互检查结合起来，把号召贪污分子本人坦白和号召群众检举、揭发结合起来，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的对于贪污浪费的大检查运动。（五）对于案犯，必须要根据大、中、小加以严肃处理。（六）各地立即按照北京经验及西南一级机关计划，具体布置工作，并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按级报告制度。

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六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十二月十七日

转发肖华^[1]关于总政实行精简节约 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7日)

军委总参谋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各特种兵司令部，并告总政治部，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肖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2]，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肖华关于总政治部开展精简节约和三反斗争的报告，分析了总政机关在人员编制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缩减机关编制人员的方案和实行节约的初步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合并住房、办公室、伙食单位、用车，严格事业费的开支手续，爱护国家财产，节约办公用品等。报告提出，这一运动拟与目前机关整党学习结合进行，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由领导干部带头，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民主，进行检查，然后订出由个人到部门的节约计划。

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

(1951年12月17日)

王震^[1]同志，并告仲勋、宗逊^[2]同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

(一) 王震十二月十四日的报告^[3]收到，我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除最后一条外，可以向分局扩大会和军区生产代表会议提出。

(二)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宗逊，即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 指王震1951年12月14日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的报告。报告中说，军区准备在1952年冬实行土地改革中，将过去两年分散的生产部队修建的小型水渠和所耕种的上万亩土地及建筑的房屋让出，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集体农庄10个（每处1万至1.5万亩土地），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认真试办农民的集体农庄。军队除担负警备任务外，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

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三)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四)将王震的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各中央局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审阅中央关于海外侨民 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稼祥^[1]同志：

此件^[2]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3]已看过，请胡乔木^[4]同志看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

[3] 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
部长。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
秘书。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批准权的六项规定^[1]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1]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的六项规定是：(一) 八方面是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5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文教工作者，包括小学教职员以上，文艺、曲艺工作者中有影响的人士在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工矿交通企业，是指厂矿交通企业中的职员、干部。(二) 凡逮捕上述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内区委书记以上，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内相当于县长和省专处、局长以上干部，民主党派、文教界、宗教界、工商界中县以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及500人以上的厂矿中所长、科长以上职员干部等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重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5地归大行政区批准，云南、贵州、西康3省，委托各该省区党委代大行政区审批。除以上所列人员外的反革命分子，全区均委托各省区（市）党委代大行政区审批。(三) 工矿交通企业部门一般工人中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由相当于地委级以上的市委批准。其中，专案和牵连人数众多的大案件，应由省区（市）党委亲自掌握逮捕权。(四) 凡判处八方面和工矿交通企业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死刑缓期执行，一律报经大行政区审批。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一律由省区（市）党委批准。(五) 工矿交通企业中控诉对象，斗争对象，事先亦应一律经过当地市委或人民政府相当党委批准。(六) 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

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 三反运动的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14日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基本状况，指出：工作浪费，以财贸、企业、机关等单位最为严重，城市又大于乡村；个人生活浪费，以负责一方、一个独立单位之大小首长最为严重，且多为老干部。贪污者以财贸、企业、公安、各单位事务部门，有关生产的部门中干部居多，其中又以旧人员为多。报告认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审干、整党运动的开始和过去清理“中层”的继续深入。一方面，运动会遇到来自党内的某种抵抗力量，需要用最大决心和坚持性去推动；一方面运动自身会引来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冷静、慎重、严肃地加以指导。运动大体按3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以求密切有力地相互配合。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坚决开展运动，而又防止盲目性。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报告还指出，除必须核订精简节约计划，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执行外，清理小公家财产一事极为重要。处理的原则是：1. 老实逐级上报财产状况；2. 有报告者不没收，不报告者认为非法；3. 其资本属于挪用事业费，转移解放时接收的资产者，上报后经批准作为国家投资，用节约方法积蓄者，仍算各单位投资；4. 实行分级统一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经营下的投资分红制。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请即转发所属各重要单位；并告志愿军党委：

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

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

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彭真^[1]同志：

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2]，应给予解决。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2] 北京被服厂工人在来信中反映，这次调整工资时，调整的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

关于处理志愿军休养员 打人事件的批语^[1]

(1951年12月18日)

—

罗荣桓、肖华^[2]同志：

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语，其一批在苏南区无锡市皇后戏院鞠惠黎的来信上，信中反映苏南康复医院的志愿军休养员到该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的情况；其二批在江西省南昌市第五预备医院王心的来信上，信中反映该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

[2]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二

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95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北京。

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 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 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尚昆^[1]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2]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二三轮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军委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关于精简节约 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19日)

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及军委各部门：

兹将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向所属发出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军委

十二月十九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贷款 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的修改^[1]

(1951年12月19日)

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2]，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

[1] 本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的。以上3种私商联营形式，共同特点是在国营贸易机构领导下，可以比较有计划地实现国营贸易的销售价格、市场分配、物资调拨和对外斗争的各项政策。1951年三四月以后又发现两种私商联营，一种是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不利，并且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和国营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这是一种自发趋势，而且发展得相当广泛。其组织应认为是合法的，但其本质则是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的。

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中央转发文委党组 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中央

十二月二十日

[1]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对已检查出的28起贪污案件分析，贪污案件主要发生在文教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贪污的方式主要是勾结奸商，营私舞弊，盗卖公物，侵吞公款，假造单据，擅改账目等。文教系统，因人员工作条件不同，其贪污总数和贪污人员的百分比，虽不如财经系统严重，但是由于在文教系统中，也有许多企业单位，而这些企业单位大多还没有实行企业化管理，许多接收的旧企业机关也没有经过民主改革，领导方面对这些企业单位，还没有加以认真的检查和管理，因此这方面的漏洞很大。我们准备以4个月时间进行三反工作。在此项工作中，根据首长领导，亲自动手，发扬民主，上下结合的原则，普遍地发动群众，采取教育、坦白、检查、检举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在展开此项运动的同时，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军区高干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1日)

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

兹将华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十五日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请各大军区和志愿军转发给较多的同志阅看。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华北军区部队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后指出，为了在军内党内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整顿，并杜绝对国家资财的各种各样的盗窃行为，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公开动员，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斗争，并为了防止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应先于整编工作进行。在三反运动的步骤上，先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动员群众，发扬民主，上上下下，互相检查，开展反浪费斗争。然后进入号召坦白、群众检举的反贪污斗争。最后在反浪费反贪污的基础上，检查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掌握上，重点抓紧对后勤部门、特种兵部队和机关总务部门生产单位，但亦不放松全体部队爱护武器、爱护国家资财、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和检查，从运动中取得经验，订立制度和群众公约，以巩固成绩，使厉行节约成为群众性的经常任务。会议要求，除军区各部门及特种兵按照华北局规定在12月21日以后作初步检查报告外，廿三兵团及各军、各军区应于12月底，师和团于1月15日以前交初步检查报告。

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他们规定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应于十二月底交出一个初步的检查报告。师和团应于一月十五日前交出一个同样的报告。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应斟酌自己的情况，规定一个适当的部署。这种部署在西北军区和广西省军区是已经明白规定的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 三反斗争的电报

(1951年12月21日)

中南军区党委会，并告华东、西南两军区：

十二月十九日十二时四十五分电收到。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许多单位已从十二月十日左右开始，到一月十日左右就进行了一个整月，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广西军区那样做是很好的。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编整”，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编整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特别是浪费现象，每一单位只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发动检查和制止，即可以停止。这一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比较有一点不同，即不致发生乱打乱杀现象，故不要怕发动起来不能控制。当然，要使这一斗争进行到彻底，领导上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央关于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 总党委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1]，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 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

[1] 指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1951年12月20日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的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 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各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每个大小单位去，并获得应有的成绩。(二) 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普遍要求各单位在短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是有困难的。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须放在1952年3月以后去开。(三) 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作必要的调整。(四) 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肖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以肖华为总党委的第四书记。

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 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1]

(1951年12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甘肃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央局的电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 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

[1] 指中共武汉市委1951年12月19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给中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掩护物。它最突出的表现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以封建秩序和恶霸作风来对待群众。这是武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三反斗争中，为了发动群众，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批判和处罚那些胆敢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违反纪律的分子。并且必须从市委和市府做起，自上而下，进行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打破一切不必要的顾虑，放下装腔作势的架子，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关于运动开展的步骤，报告说，在12月内，作重新酝酿，学习文件，作动员报告，处理若干突出事件，组织一次大的公审会，1952年1月初开始发动广泛的检举和坦白运动，为第一步。然后，着重分析处理，为第二步。最后着重总结工作、健全制度，精简机构与调整干部，为第三步。预计1952年3月底可完成。报告还提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拟组织三种检查组。一是由各级首长负责，吸收若干人员参加的普遍检查。二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检察署与法院的重点检查。三是下级对上级的检查。第三种检查人员拟由机关的工作人员或代表会议推选。

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並轉告各省市黨委：繼北京^聲之後，在大
城市中，武漢市委已經發動了一個大造謠言^聲的雷厲
風行的吸引廣大羣衆參加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
義的偉大鬥爭。他們做得很勇敢，^剝剝削揭露
和懲罰了一批敢於壓制羣衆批評的担負重要職
位的幹部。他們所定的方針、步驟和辦法都很
適當。中央希望天津、濟南、青島、上海、南京、杭州、
廣州、南昌、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西安、太原。
19...

及其他大城市，一律發動這^樣個鬥爭，希望這些大城市
的市委都有武漢市委這樣^樣勇敢和有步驟有辦法，
都向中央寫一個有分析有內容的報告。請將武
漢市委的報告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中央 十月二十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武汉市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51年12月22日)

行严先生：

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

有江子愚^[2]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1] 章士钊，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江子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局 三反报告^[1]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12月23日)

[1]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报告中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毛主席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坚决号召全党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为此，华东局特作如下决定：（一）普遍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务使全体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贪污、腐化是最可耻的行为。这一时期各地党内的整风，均应着重以检查贪污、浪费，克服资本主义影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二）在不妨碍生产及不影响税收的原则下，应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采取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发动群众检举控告，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发一切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并介绍表扬奖励那些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使反对贪污浪费与表扬劳动模范成为长期性的群众运动。（四）为了保证运动顺利进行，必须采取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及全党动员、支部保证的办法，并须注意发扬民主，扶助正气，打击邪气，给干部群众撑腰，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配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应从检查贪污浪费、检查官僚主义作风过程中，切实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如定期召开各机关、各部门党的代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经常检查制度等。

—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兹将华东局十二月二十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华东局：

十二月二十日报告收到，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已将你们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印发华南军区政治部 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23日)

罗荣桓^[1]同志：

此件^[2]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

[1]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部1951年12月13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给所属的指示。指示对两年来部队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为着进一步加强部队中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团结，加强我军现代化这一组织基础，并动员全军知识分子为实现部队文化教育任务而奋斗，要求在全党全军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教育大家认识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从我军建设的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的发展上看，知识分子更有其重大作用。因此，团结争取改造知识分子，是党的一贯政策。一切对知识分子采取消极冷淡态度的，就违反了党的政策。（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从小资产阶级感情出发的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对已经分配到一定岗位的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比较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加以培养，大胆地加以提拔使用，评级中正确地定级。

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给陈玉英^[1]的信

(1951年12月23日)

陈玉英同志：

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 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中央批准西北局关于 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指示的电报

(1951年12月24日)

西北局：

十二月十八日的整风指示稿^[1]，已收到，看过，认为是正确的，可即照此施行。

中央

十二月二十四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1年12月18日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西北局决定从现在起，有系统地普遍地发动全党和所有工作人员，向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严肃的斗争。大行政区机关和省、市级机关，现在就应立即动手，集中力量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这个运动。各专区和县也要在本月或明年1月开始。各机关、企业、团体，一般地都要先从开展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斗争入手，由此联系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从而讨论堵塞漏洞，提高工作效率的各项必要办法和制度，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引导群众转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正在进行整党工作的机关，应把这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和整党结合起来，首先解决那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突出问题，然后进一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至登记处理等。

对中财委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 收购棉花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中财委：

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1]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1] 指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1951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 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各中央局：

西南局这个报告^[1]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12月19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给中央并各省市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是使学校代表比较深刻地体会了教师思想改造乃是改革旧有学校教育的关键，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三点：（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并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特别要以身作则，进行有教育意义的自我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这样易于暴露各种思想观点，便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作骨干。这样就能够掌握情况与方针，引导会议正确地向前发展。

关于部队三反和整编的安排问题 致谭政^[1]电

(1951年12月24日)

谭政同志，并告陈毅、贺龙^[2]二同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3]，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编整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省军区，应赶在一月十日以前，用极短的时间，例如一星期至两星期，初步地检查贪污浪费的情况和开展初步的斗争，并向军委作一个初步报告。军分区则可赶在一月底以前展开一次初步斗争。一切受编整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编整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多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3] 指毛泽东1951年12月21日关于部队在整编前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给中南军区党委会的电报。

转发联运党委关于开展 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单位；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联运党委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1] 联合运输司令部党委1951年12月19日在给军委总政的电报中说，铁道兵团领导机关自朝鲜返沈阳后，与东北铁道运输司令部合并，组成联合运输司令部。在东北局及东北军区的领导下，于11月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开始发现了一些严重的贪污浪费情形。现正进一步深入动员与检查，于明年1月10日前作出初步总结报军委总政。团及分局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1月15日以前，将检查结果用书面或电报报告联运党委和军委总政。

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 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

(1951年12月25日)

中南局、武汉市委：

十二月二十四日电^[1]悉。(一) 罢免易吉光^[2]，并由张平化^[3]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是完全必要的；(二) 市长吴德峰同志既然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五日廿三时半

[1] 指中共武汉市委1951年12月24日关于拟在武汉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处理市政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问题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

[2] 易吉光，当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秘书长。

[3]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在中央转发中办秘书室 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话

(1951年12月25日)

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 全力转入三反致各中央局电

(1951年12月26日)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八百亿元，其中肖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二百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三百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十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五百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十二月二十六日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 初步情况的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26日)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1年12月24日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目前运动已开始发展起来，若干机关已出现热烈的批评揭发斗争热潮。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开始时，虽然经过党内外干部与群众的动员，并学习一段文件，但运动仍然发动不起来。其原因是许多老干部有点“满不在乎”，没有认真领导。其中部分同志是对三反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但多数干部是自己有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运动一开始将首当其冲，因此采取观望态度。有鉴于此，又重新动员，在干部中强调发扬民主，不要害怕批评，强调干部要带头，以自我批评精神来启发广大群众的热情。经过老干部一带头，运动迅速展开，形成热烈的批评运动。（二）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负责干部深刻作自我批评的，领导与群众间的矛盾迅速消失了，进而共同深入地检查一切铺张浪费及贪污现象；另一种是领导同志没有深刻自我批评精神，口头提倡民主，而实际又害怕民主的，群众一经起来，声势很大，压也压不住，相反斗争的火焰愈益集中到这些同志。（三）目前运动还大都集中在反浪费，发展较快的单位，领导与群众矛盾统一了，斗争火焰已开始转向揭发贪污。有贪污嫌疑的分子恐慌起来，大部分心里怕赔偿、怕处分、怕杀头。我们拟再发展几天，即公开宣布政策，号召坦白。（四）还有个别单位，由于领导人不正派，各拉拢一批小集团互相攻击，因而运动不能开展，形成混乱。这样的单位，我们拟暂时停止，准备其他单位告一段落，腾出手来派专人去，重新发动，彻底整顿这个机关。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1]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24日在向所属转发湖北省委报告时加的批语。中南局的批语说：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初步情况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关于同意将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 结合进行致陈毅^[1]电

(1951年12月28日)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2]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3]，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1年12月25日关于华东军区高干会对整编、转业工作及1952年部队工作实施步骤的决定给毛泽东并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东局的报告。

[3] 指陈毅1951年12月26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在整编之前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并指出近日已发现某些部队不先反贪污即进行整编，他们胆敢违法违纪瓜分财产，这样的人，带着浪费和官僚主义，甚至带着贪污去转业，在政治上必然造成极大损失与被动。华东部队预定1月份以反贪污浪费为主，结合整编，2、3月以整编为主结合反贪污浪费，3月后将反贪污浪费深入到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诸方面去，并力求3月底整编40万至45万人的工作不受影响。

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1]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1] 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关于播发饶漱石^[1]的演说 给新华社的批语

(1951年12月28日)

新华社：

饶漱石同志的演说^[2]，我已看过，很好。只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即日拍还给饶漱石同志，于明廿九日或卅日在上海报上登载。新华社则于卅日以“上海电”发广播，在全国报纸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2] 指饶漱石1951年12月17日在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后发表于195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题为《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

关于同意对付敌人拖延谈判的办法 致李克农电

(1951年12月28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十二月廿八日一时来电^[1]、两组简报^[2]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时半

[1]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4.4万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5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2]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7日发来的第三项议程小组会简报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简报。当时，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已历时30天，第四项议程的讨论也已进行半月余，由于美方采取拖延政策未能达成协议。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12月29日)

黄先生：

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2]敬悉。

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3]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1]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轻工业部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说在向商店查诘中，发现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民建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展开工商界思想改造运动，预备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回扣实是贪污，在北京社会根深蒂固，不扑灭，无以整饬各机关风纪。

[3]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在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 一周通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1]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一月份应发四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时

[1] 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说，贺龙等主要负责干部亲自“上前线”，掌握运动，宣传政策，给群众撑腰，鼓励群众的斗争勇气，对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决定作用。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 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一) 批准华东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认为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的这个指示，分析了华东军区所属部队中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指出华东部队贪污浪费的严重现象，多发生在南京上海的机关部队中，尤其在铺张浪费方面，华东军区机关实际上起了带头作用。军区党委过去对这些严重倾向，虽然一般地提出要反对和克服，也批办了大批贪污腐化案件，处罚了許多人，但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有系统地开展斗争，未能集中火力惩办大贪污、大浪费的事件，因此便不能制止贪污浪费的狂潮。前一段着重整编而忽视了在整编前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的必要性，而使12月初的高干会议没有充分讨论反贪污浪费问题。直到毛主席再次批电指示，才帮助我们将整编与三反结合起来。指示号召华东军区的全体同志认识华东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城市，乃是全国资产阶级势力和影响最集中的地方，三年来对部队所起的腐蚀作用是极为惊人的。从华东部队的处境上，更应该首先发动一场激烈而严肃的反贪污浪费、反腐化堕落的思想斗争，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影响包围，才能保持我军的纯洁，巩固部队，加强国防建设。而能否提高认识并首先反对官僚主义，是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影响，肃清贪污浪费，做好整编工作的主要关键。据此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对1952年1、2、3月的工作步骤加以改变。1月份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为中心，结合进行整编，2、3月份以整编和转业建设工作为主，结合继续深入三反斗争。

(二) 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三) 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四) 将华东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指示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都能阅读。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对编余部队调拨为工程部队 和屯垦部队的批语^[1]

(1951年12月30日)

朱、林、聂^[2]：

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3]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12月29日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

[3] 周，指周恩来。

对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 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

(1951年12月30日)

董必武、罗瑞卿^[1]同志阅后，交彭真^[2]同志阅办：

(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以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3]已收到，阅悉。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3] 指董必武、彭真、罗瑞卿1951年12月29日关于中央政法部门5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三反的初步情况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内容有4条，其中第一、二、三条讲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五机关合署办公的情况、好处和困难。第四条讲这次实行五机关合署办公和初步发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我们党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 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二) 自由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对三反运动有袖手旁观的，也有强调自己业务与此中心运动对立的，对党组、党委决定，不合自己意见的不宣不传，各顾各的，不看整体，原则同意的事，办不办都不一定。(三) 有些部门的民主人士负责人，对三反只要反贪污一反，他们对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两反很不积极。

(二) 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民〈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

(三) 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

(四) 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五) 报告的其他部分，均同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 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作三反报告的指示

(1951年12月3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 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二）其余照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电^[1]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12月4日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执行不变。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 三反运动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各中央局：

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廿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关于回谢生日贺电问题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外交部王炳南^[1]同志：

请查斯大林生日我致贺电后，是否有回谢电，如有则此电^[2]可发；如无，则不要发。对罗马尼亚亦然。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1] 王炳南，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2] 指外交部为毛泽东起草的对斯大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来电祝贺生日的答谢电。

给易南屏^[1]的信

(1951年12月30日)

南屏师兄：

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1] 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 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 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31日)

谭政同志，各大军区：

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1]，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在给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中，批评他们为抓住整编将三反运动在战士与团以上机关分期分别进行的部署不妥，指出应以1月份1个月的时间，在装甲部队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三反运动。领导机关要亲自分析本单位的贪污、浪费情况，进行具体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并不妨碍派人做整编工作，更不妨碍在3月底完成整编任务。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

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时



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养菊专家刘契的花园中赏菊。

转发志愿军四十二军党委 关于节约计划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31日)

各大军区，并告中央局：

四十二军的节约计划很好，请转发所属各军师参考。各军区和各军均应于短时间内定出节约计划报告军委。志愿军已走在前面，各军区和各军不要太落后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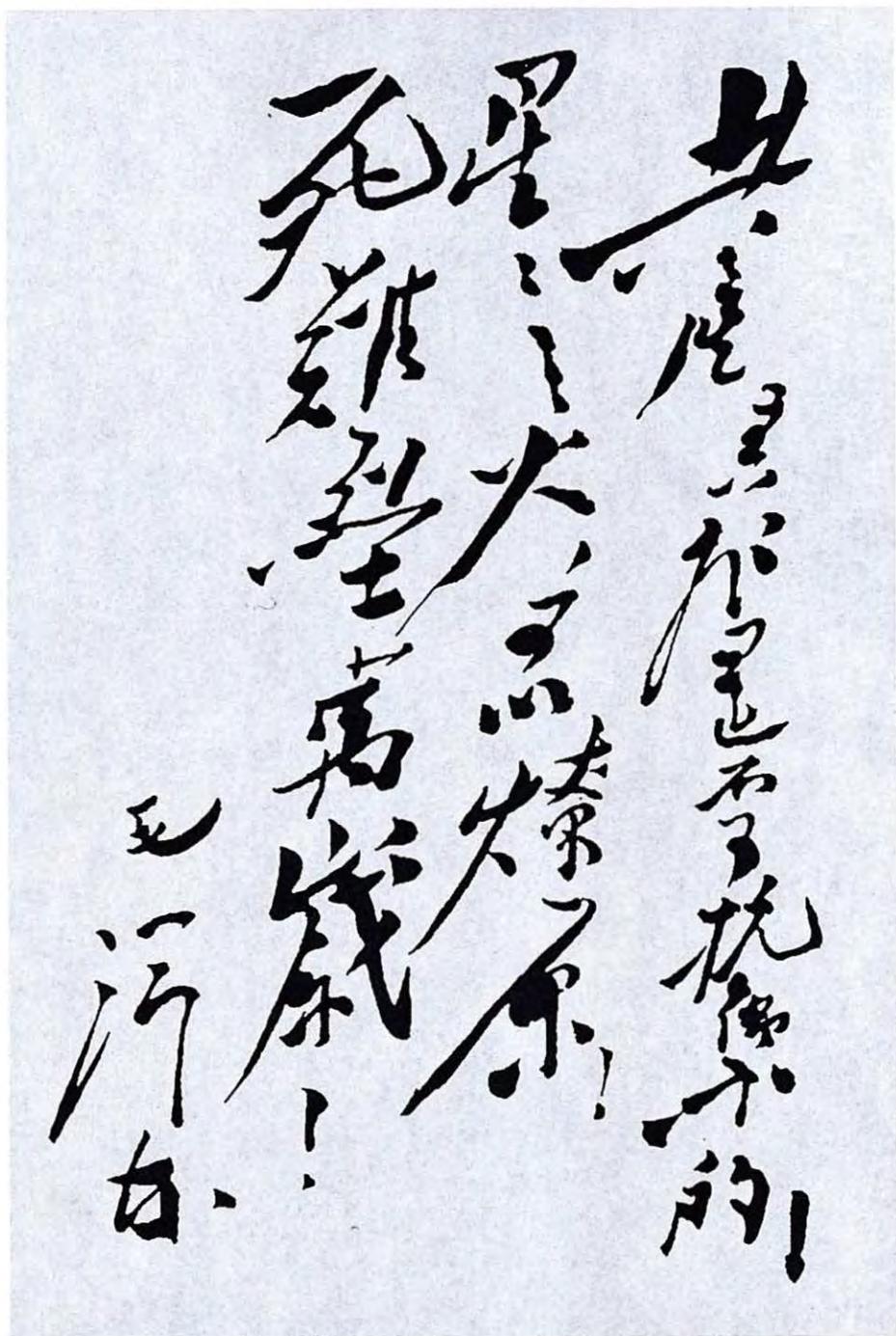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 一书封面题词

(1951年)

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
万岁！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一书的题词。

为复旦大学题名^[1]

(1951年)

复旦大学



毛泽东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

[1] 1951年应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之请，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

为《新农村》题名^[1]

(1951年)

新农村



毛泽东为《新农村》题写的刊名。

[1] 《新农村》的前身为东北书店出版的《翻身乐》，1947年创刊，为月刊，1949年6月改名为《新农村》，为半月刊。由东北局宣传部的孟奚同志到北京找到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请毛泽东题写刊名。1958年9月9日，《新农村》更名为《好党员》。

1952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视察黄河。

元旦祝词

(1952年1月1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对中南军区三反指示 和谭政^[1]来电的复电和批语^[2]

(1952年1月1日)

—

谭政同志：

此件^[3]及十二日三十日十五时电^[4]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这组电报和批语中，其一是毛泽东给谭政的复电，其二、其三、其四是毛泽东在中南军区三反指示上的批注，其五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批语。

[3]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给华南军区、各省军区、各军、海司、空司、高级步校、直属属各大单位党委的指示。指示作出了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等10项规定。

[4] 指谭政1951年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与三反斗争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

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一月一日二时

二

这是很对的。——毛注^[1]

三

这一条^[2]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毛注

[1] 这个批注写在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五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凡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或其可能性较大的部门，应着重在贪污浪费方面作检查，并据此进行教育。例如对后勤各部门、各机关之总务部门，及其他负有采购、包工、订货、保管、分配的部门，与掌握了各种业务费的部门等。”

[2] 指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五项中以下一段话：“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例如，对一般机关行政部门，在一般机关人员及连队人员中，主要是进行节约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普遍发动节约，造成群众性的节约运动。”

四

这样规定^[1]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应照华东规定：（一）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结合三反。（二）领导干部分工，以一人专管三反，他人助之；以一人专管整编；以一人照顾其他工作；而在三反高潮时应集中大力完成三反。——毛注

五

林彪^[2]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养护。

毛泽东

一月一日上午三时

[1] 指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九项中以下一段话：“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

在川北区党委关于 三反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日)

川北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1]简明有力，说得中肯，发给各地参考，并在党刊发表。

毛泽东

一月一日

[1] 指中共川北区委员会1951年12月21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西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解放后不久即已开始的反贪污斗争的情况，总结了过去没有把这场斗争作为严重的任务大张旗鼓地展开的几条教训：（一）没有统一布置和在一切机关干部乃至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动员，造成人们对贪污分子深恶痛绝的政治气氛。（二）没有与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三）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革命品质与作风提倡不够，对忠心耿耿的干部表扬太少。（四）没有把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署和法庭健全起来，这些部门也没有把反贪污、反浪费与反官僚主义当作中心工作去做。

转发志愿军二十兵团关于 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日)

各大军区，并告各中央局：

志愿军二十兵团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报告^[1]很好，望即转发各军师，并在党刊上发表。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毛泽东

一月二日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1951年12月27日关于三反运动给志愿军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并华北局、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因处在战争环境，领发、采购物资较多，管理不严，致使贪污分子趁机混水摸鱼，但是浪费和物资的损失远较贪污为甚和更普遍。为此决定全兵团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进行普遍的无例外的大检查，并根据机关和部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然后，根据检查结果订出三反的具体计划和节约公约，健全制度，并反复深入地进行教育，求得切实贯彻执行。

答谢威廉·皮克祝贺生日的电报

(1952年1月2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敬爱的威廉·皮克同志：

衷心地感谢您，我所敬爱的皮克同志，在我生辰之际所表示的十分亲切的祝贺。皮克同志，我和您的意见一样，只要苏联、德国、中国和各人民国家团结一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可以制止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向您致同志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祝贺威廉·皮克寿辰的电报

(1952年1月2日)

敬爱的威廉·皮克总统同志：

当您七十六寿辰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个人向您致衷心的祝贺。祝您在争取德国的统一、民主、和平与独立的事业中获得伟大的成功。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心情愉快，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对组织空军部队到朝鲜战场作战的 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月2日)

刘亚楼同志：

(一) 同意你们的计划^[2]；(二) 应当在最近几天内精密地组织一次远程夜航轰炸，但不要经过板门店地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二十三时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2年1月2日13时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等报告提出的意见。报告说：为了争取时机，尽量使更多的新组成的空军部队能得到战斗锻炼的机会，每个师或团在与自己数目相等的敌机群进行过5次或7次战斗后，就应调回后方，以便让出位置给其他新的部队作战。如果朝鲜战争长期继续下去，则这些参加锻炼但锻炼得不够成熟的空军部队，可以再调去安东。根据上述原则安排空军部队调防，并继续组织军事、政治、机械、后勤、训练等各种干部到安东进行战地实习，以便继续取得组织和指挥空军部队作战的见识和经验。根据空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去年夜晚出动袭击大和岛附近敌人之经验，现在停战谈判期限既过去，应该考虑是否需要用夜航轰炸机去轰炸金浦、水原之敌人机场以及仁川港口之问题。

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2]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财政部机关1951年12月5日以来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发动群众的3条经验：思想教育、党员带头和首长作自我检查。财政部党组全体同志首先在党组内作了较深刻的检查，一部分同志且在党员干部中作了检查，随即由各司、局、处长在本单位当众作自我检查和启发报告，除少数单位因首长检查不深刻未收到应有效果外，绝大多数反映都很好。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

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同时宣布军委技术部长□□□，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重工业部局长□□撤职查办。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动』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1]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2]，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1] 指薄一波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2] 即本篇所说的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

转发江西省委关于 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江西省委这个报告^[1]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

毛泽东

一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31日转发的江西省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全省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和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措施。这些措施是：(1) 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开展群众性大检查运动，在此基础上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全省确定省、地级和6个重点市首先开展三反斗争，并把它作为年终整风鉴定的主要内容，作为整党的重要步骤。县级机关则先在财经企业部门开始三反斗争。(2) 抓住开展运动的决定关键，打通主要干部的思想，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紧密依靠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 监委、纪委、检察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办事机构，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4) 各地小家务要坚决进行清理上报。(5)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定期向上级报告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

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 是完全可能的^[1]

(1952年1月4日)

这个计划^[2]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

毛泽东
一月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2] 指1952年1月2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和林彪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的计划。该计划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21个师，计21万人，另以19个师，计19万人，组成屯垦部队。

对聂荣臻^[1]关于山东回民支队 整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4日)

刘格平^[2]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

(一) 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 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 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毛泽东
一月四日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大贪污犯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的 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2年1月4日、6日)

—

请薄一波^[1]同志拟复^[2]，同时告知各区。

毛泽东
一月四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指草拟中共中央对华东局1952年1月2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给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的复电。华东局的电报说：同意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速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请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之判处徒刑和死刑的，应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二

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1]

[1] 根据毛泽东1952年1月4日的批语，薄一波起草了中央的复电，经毛泽东审改后于1月6日发出。毛泽东的这句话，加写在复电中“但在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之后。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1]

(1952年1月4日)

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先后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机关中，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凡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运动就开展得好；初步发动了群众但发动得不充分的，运动的开展就还不够好；群众基本上没有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就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单位、不少的部门、不少的地区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

[1]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领导起来。目前有的地方，运动开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为那里的负责首长，把这个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的姿态，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的模样。反之，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缺乏战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动，甚至于消极怠工的原故。

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哪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他们不了解这些，却把这个运动视同等闲，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导责任，委托在助手或秘书等人身上。群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也就彷徨观望起来。这种人是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他们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

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

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借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事实上，他们在运动中已经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经强调地指示我们：“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

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人，也不外这两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不称职的人；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难道还有丝毫理由不应该严申纪律吗？

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减轻处分或免于处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毛泽东修改的手稿，日期为1952年10月15日。手稿内容围绕“发动群众”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如何有效发动群众的关键。手稿中多次提到“群众”、“运动”、“斗争”等关键词，并详细阐述了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手稿的右侧部分有“毛泽东”、“1952年10月15日”等字样，表明了手稿的作者和日期。手稿的左侧部分有“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一标题，与上方印刷的标题一致。手稿的中间部分有“运动”、“斗争”、“群众”等关键词，并有“运动”、“斗争”、“群众”等关键词的重复出现。手稿的右侧部分有“毛泽东”、“1952年10月15日”等字样，表明了手稿的作者和日期。手稿的左侧部分有“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一标题，与上方印刷的标题一致。手稿的中间部分有“运动”、“斗争”、“群众”等关键词，并有“运动”、“斗争”、“群众”等关键词的重复出现。

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的手稿。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 三反斗争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
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一) 批准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

[1] 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赂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鉴于以上情况，报告提出今后的计划是：第一，继续号召坦白和检举，最近几天主要是号召坦白。针对工商界最怕坦白后无限制地追缴漏税和罚款，宣布凡坦白者，除补缴1951年漏税外，不再罚款；否则，查出后将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并照章罚款。第二，号召全体市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大胆检举。为便于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第三，从严法办一批贪污行贿分子，并公布一批各种类型的贪污案件，以推动坦白运动的开展。第四，继续逮捕抗拒、破坏三反运动的贪污、行贿分子。第五，各区召开代表会议，并召集街道和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宣传，使三反斗争家喻户晓，群起而检举。

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组织检查团 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直属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1]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毛泽东
一月五日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日的指示中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办法是：各大单位均需迅速组成检查团，按规定的分工在1月份互相检查，并以驻南京、上海的机关、部队为重点。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各单位对三反斗争重视的程度，对中央和军区党委指示执行的情况。检查的方法，主要是听取被检查单位领导人的汇报，查阅讨论布置三反工作的会议记录与文件，访问所属的下级单位负责人、一般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等，了解反应，征集意见。每个检查团都要选择两三件重大的突出的贪污浪费案件进行彻底检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 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给所属的指示^[1]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

毛泽东

一月五日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日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规定要求团以上党委1月份作简报两次，月终作一次总结性的报告；2、3、4月月终各作一次关于继续贯彻厉行节约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

关于起草惩治浪费条例 和修改惩治贪污条例的批语^[1]

(1952年1月5日)

薄一波、彭真^[2]同志阅。

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五日

[1] 这一批语写在中共浙江省委1952年1月1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意见给华东局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对张劲夫^[1]关于浙江省直属机关 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
省市区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此件^[2]很好，请在党刊上发表，使很多同志都能看到。

毛泽东

一月五日

[1] 张劲夫，当时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转报的张劲夫1951年12月26日向省委所作的关于省直机关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运动初期主要以反浪费为主，多数单位首长以身作则，各级骨干层层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感动了许多人，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领导上也取得了主动，为进一步开展反贪污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报告还对今后进一步大力开展反贪污斗争和分别不同情况处理贪污浪费问题提出了意见。

对中共济南市委报告的批示^[1]

(1952年1月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

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发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部署的报告的批语。该报告的主要特点，一是内容全面充实，既扼要列举了各行各业暴露出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说明开展“三反”运动之有的放矢，又明确提出了从机关到企业到警备部队方方面面开展运动的部署要求；二是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清剿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抓住了运动的要害；三是开展运动的决心大，方法对，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务求达到目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中南局关于近几个月内少开 主要干部出席的业务会议的批语^[1]

(1952年1月8日、11日)

—

薄一波^[2]同志：

(一) 请指示所属各部注意少开中南局来电中所说的那些会议；

[1] 毛泽东的第一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6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中南局的报告说，现在三反及土改、民主改革三大运动同时进行，工作非常紧张。这三大运动都须各级各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而中央各部会议甚多，又要主要干部参加，致使三反运动大受影响。为此建议中央通知各部，在今后两个月至三四个月内尽可能少开或不开须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第二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10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的电报上。电报说，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朱毅最近接到赴京开会的通知，因三反运动紧张，请求准其请假。电报再次提出请中央考虑1月6日电中所述意见，建议通知中央各部门将原定1月和2月半期间召开的业务会议不开或推迟。根据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的精神，中央于同年1月14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通知，同意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尽可能不开或少开须主要干部出席的各种业务会议。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二) 前几天所谈月底召集各大区干部会〈汇〉报三反，请暂不发通知。

毛泽东
一月八日

二

请周^[1]拟复，似应同意。并通知各部。
建议以后政府各部召开全国会议均应经过总理批准。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1] 周，指周恩来。

关于军事系统三反报告 一般由总政处理的批语

(1952年1月9日)

肖华^[1]同志：

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毛泽东

一月九日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这个报告^[1]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九日

[1]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2年1月3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第二个报告。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各类人员贪污的方式极多，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但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警惕不够，对三反采取冷淡态度；在中下层干部中则有很多顾虑，怕这怕那。为此，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三反领导问题。会上批评了把贪污浪费看作“生活小节”“不是原则问题”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三反斗争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给罗元贞的信^[1]

(1952年1月9日)

元贞先生：

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1] 罗元贞（1906—1993），广东兴宁人。早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毕业。精诗词，擅联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他决定到山西大学任教。可是直到1952年元旦仍未启程。那时他读了流传的毛泽东《七律·长征》诗后，在这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将该诗“金沙浪拍悬崖暖”中的“浪拍”改为“水拍”。这是毛泽东1月9日的复信。

转发罗瑞卿关于公安部 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公安部门；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罗瑞卿同志这个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做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此件应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十日

[1] 指罗瑞卿1952年1月8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给总党委、总检查委员会并报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三反斗争队伍。运动发展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脱裤子”，洗干净，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这样做的单位，沉重地打击了贪污分子，揭发了他们的罪行，发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领导。

转发空军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兹将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共五天的三反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

[1] 指空军党委1952年1月4日至8日每天向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所作的三反情况报告。这些报告谈到，空军党委从党委常委至各部部长、处长，层层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带头检讨的做法，从而发动了群众，使他们打破顾虑，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在运动已由首长带头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材料，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各支部均召开坦白大会，对已经坦白的，组织专门小组继续清查和收集材料；对尚未坦白的，继续作思想动员，进行个别谈话，打破顾虑。同时号召已经坦白者进行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进一步采取大会与小会相结合，有意识地由普遍检举转入重点坦白与揭发，并且明确划分自己主动坦白和群众检举揭发的界线。为了将三反运动深入一步，又根据加强领导和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需要，调整了三反领导机关的成分，撤换了一些阻碍运动发展的干部，配备了得力干部，并且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领导；对运动开展较差的单位，党委派负责同志深入单位进行帮助。

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一月十日

中央关于天津市委对干部超支问题所作分析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1]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此件应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月十日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彭真1952年1月9日关于天津市三反斗争给毛泽东并报中央、华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同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通电话后写的。报告中谈到，天津市对干部超支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可避免的超支，如煤火费、亲属多住几天的伙食费等。这种超支，既非贪污，也非浪费，而是由于制度有若干不合理。第二类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如小灶标准过高等。它的性质是浪费，应当节约，但尚非腐化。第三类是腐化性的挥霍，即迹近贪污的浪费。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第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对山东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薄一波^[1]同志阅后送粟裕^[2]同志：

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

毛泽东

一月十日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转发西康军区关于三反的 紧急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此件^[1]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日

[1] 指中共西康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6日关于开展三反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团以上机关必须在5天内发动起群众，用7天时间进行民主检查(即个人坦白，群众检举和组织检查)，5天做好结束工作；连队则3天发动起群众，5天进行民主检查，3天做好结束工作。(二)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三)各军、分区、军直、教导团等3天一次向军区作报告。(四)三反运动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组织务必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绝不允许拖泥带水，敷衍了事，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转发饶漱石^[1]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一) 饶漱石同志一月十日的报告^[2]很好，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可采用。(二) 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三) 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2年1月10日关于三反斗争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提出华东各机关三反运动的主要经验和方法是：(一) 各部负责同志首先进行彻底自我检讨。(二) 放手发扬民主，大胆启发群众展开批评。(三) 领导要有坚定的决心，及时宣布限期展开斗争。(四) 全面展开和重点审查相结合。对贪污分子要以财经机关，总务、采购、机关生产等部门为重点，切实进行审查。(五) 大会坦白示范与小会深入检讨相结合。(六) 党政机关内部的坦白、揭发与外部有关商人的坦白、检举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在中南局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 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请陈、薄、李^[2]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

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3]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4日的请示报告提出，目前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中南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部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县、区、厅、处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二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2]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3]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在薄一波转报李富春关于 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报告的 信^[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一波、富春同志：

这两信及富春一月十三日的信，均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1] 指李富春1952年1月11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给薄一波并转毛泽东的报告和薄一波1月12日为转送李富春的这一报告给毛泽东的信。李富春的报告说：科学院三反情况不坏，对科学人才有教育意义。关于下一步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关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

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运动的继续开展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思想反省与重点检查。思想反省，应组织党团员带头，揭露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启发大家，不要勉强非党人士进行反省。重点检查，主要是检查仪器的购买及科学事业费是否用得恰当，弄清事实，而不追究个人责任，不检讨个人生活。第二步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讨论今后工作如何改进，订出今年院及各所工作计划，结束三反运动。薄一波的信中谈了三反运动发展的两个问题：（一）在各工业、交通及财经部门中，三反运动已发展到检查科学家和旧专门家的资产阶级观点，我们认为很好，拟予推广。（二）多数机关在三反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反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进攻，自然而然地检讨到自己的思想，即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仍让大家继续深入三反，但如果三反已彻底，而又自然而然地转到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应很好地加以领导。

在习仲勋^[1]关于入藏干部 应做好民族工作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请李维汉、刘格平^[2]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3]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3] 习仲勋1952年1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

转发三反运动以来 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
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1]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李，指李富春，当时均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们1952年1月11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金融、物价、市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谈到，1951年12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1%，较9月底的指数下落2.3%，一反过去每月上涨1%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报告认为，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关于美机犯境我方应不示弱致李克农电

(1952年1月14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一) 一月十三日廿三时来电^[1]及两组简报^[2]均悉。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二) 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廿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四时半

[1]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3日23时关于1月13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小组、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情况和14日我方拟取态度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14日，对于三、四两小组，拟根据既定方针，继续与之周旋。

[2]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3日报送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小组会议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简报。

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1]，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集宁军分区1952年1月9日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谈到，军分区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司令员代表分区及个人作检讨和启发报告，发动大家进行揭发批评。会上着重揭露和批评了分区领导利用职权，擅自开支，造成铺张浪费，以及存在严重官僚主义的问题。

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 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遵义分区这个报告^[1]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2]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在一个分区或一个军的范围内完成三反任务，至少须一个月，不能让其草草结束，请你们严格注意。在一个县，或一个小市，则时间还要长一点。就一个机关而论，则有半个多月的猛烈斗争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分区领导抓紧布置反贪污斗争的情况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2] 指毛泽东1952年1月14日转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集宁军分区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 应主动反击敌人的电报

(1952年1月15日)

李克农^[1]同志，并告金、彭^[2]：

一月十四日廿三时来电^[3]及两组简报^[4]均悉。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二时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李克农关于1952年1月15日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第四项议程小组会上表态问题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在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也不避免谈及修建机场问题。在第四小组会上，我方拟再次历数对方提案各项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撒赖的借口。

[4]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4日17时和18时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送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两份简报。简报分别汇报了当天举行的第三项议程小组会议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情况。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 三反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央局：

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1]，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华东军区的三反快报很好，我已看了四期，望寄些给中南华北供其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3日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和经验给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并报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通报。通报介绍了南京部队学习中央转发的北京三反经验，采用限期发动坦白检举、点名批评以至停职审查某些领导干部等办法，推进三反运动的情况和具体经验。这些经验是：第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者自我检讨，并亲自到群众中宣传鼓动，组织积极分子发言。第二，警惕和纠正官僚主义者用会场纪律、发言秩序以及尊重领导等为由压制民主，防止贪污、浪费分子趁机漏网。第三，对积极发言的人，不问动机如何，要让其发言。第四，对贪污、浪费不要忙于去区别。第五，运动初期重点使用几次撤职查办、停职审查以至逮捕等办法是必要的。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 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1]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2]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三周情况简报。简报谈到，在西南局传达中央关于抓紧三反的指示后，军区党委随即电告各部队，并发出书面指示，军区首长还分赴各地督促和指导。各省军区大都作了紧急布置，由首长亲自上“前线”，以自我检讨结合动员报告，层层带头，普遍展开坦白检举，运动进展一般较快。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于年初已全面转入重点反贪污的斗争。运动发展的规律，一般是先从揭发铺张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由搞一般的中小贪污而进到搞大贪污；从内部再发展到外部，即从反贪污发展到整治奸商。简报还指出各单位各部门普遍都有“小公”，即机关生产，这些“小公”绝大部分来路不正，对干部腐蚀极大，有立即取缔或收归公有之必要。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3日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和经验给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并报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通报。

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1]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

中央

一月十五日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1月13日给山东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浪费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由于经验不够或全无经验而造成的浪费。如无经验的施工设计造成的损失（中央转发此电时，毛泽东将原电中以下文字“一二次一般为不可避免，重犯则为官僚主义”改写为“应严加检讨，不许重犯。第一次犯错误，可不予深责”）。第二，由于制度未建立或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而造成的浪费。过去的可不追究，但应进行检查，建立制度，以便今后贯彻执行。第三，经过组织批准或决定的个人超支，以及机关生产在补助和提高集体生活方面造成的浪费。今后应加注意和改正，但对过去不必追究。第四，个人享受腐化、生活特殊及腐化性的挥霍。这是迹近贪污的浪费或由贪污而来的浪费，应特别加以审查和揭发。

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三日简报 第一号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看了贵州军区一月十『一』日的报告^[1]，又看了其他地方的一些报告，使人感觉许多地方（包括许多军事单位）的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在这些报告中看不见贪污分子的大批暴露和群众斗争的猛烈爆发。贵州军区则大不相同，真正发动了群众斗争，暴露了大批的贪污分子。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

[1] 指中共贵州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0日关于6日至9日三反运动情况给西南军区党委并报中央和军委的三日简报（第一号）。简报说，军区党委在接到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后，即采取紧急措施限期发动群众，截至9日晚，由各级首长带头，已初步把群众发动起来。一般做法是，直接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领导干部作启发报告，自我反省，然后以伙食单位召开三反民主大会，把群众中的民主情绪调动起来，群众发言非常踊跃，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简报还说，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关键在党委重视，方针明确，首长带头进行反省坦白，并反复说明政策，消除顾虑。这样，局面就易于打开。

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对总政关于西南军区三反运动 第三周简报的批示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肖华^[1]同志：

这个指示^[2]不妥，不要发出。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我对西南一月十二日的报告已另有批示^[3]。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军委总政治部1952年1月14日对西南军区三反第三周简报的批示。批示指出：对于贪污行为和一般公私不分的错误行为，必须加以区分，并分别对待，不能把占公家的小便宜统统叫作贪污；简报说不少单位是百分之百的人员有大小不同的贪污行为，这样把贪污面扩大到所有人员身上，会减低反贪污斗争的严重意义，转移对真正大贪污犯的斗争火力，领导上将陷于被动，对群众也没有教育意义。

[3] 指毛泽东1952年1月15日对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对聂荣臻^[1]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 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同意所拟办法^[2]。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送刘格平、李维汉^[3]同志阅，退聂办。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指聂荣臻1952年1月15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改编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在全军进行第二步整编时，将1950年8月调补六十八军开赴朝鲜作战的原冀中回民支队，从六十八军调出来，按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

[3] 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转发华北军区十军党委关于 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6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北军区第十军党委会一月十一日的报告^[1]，是我们所收各军报告中最好的一个，特发给全军参考。各军师团一律要照十军这样做，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级军区检查各军三反情况时，即以十军这个报告为标准，凡照这样做的，就是好的；凡不照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1月11日关于三反情况给华北军区党委并告各师、团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军直各部坦白检举已由高潮走向深入，群众坦白检举有增无减，重点仍是军首长、部长、处长、科长及这些人的妻子和显著的贪污浪费分子。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许多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被赤裸裸地揭发出来。对严重的贪污浪费分子，已坦白者，继续收集材料，弄清是非；对不坦白或不彻底坦白者，令其离职撤职反省，同时找线索，派人外出调查。对于某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生活过分特殊，不深入下层，严重脱离群众等不良思想作风，下层干部战士非常不满，意见很多，准备让大家继续讲下去，把话说完。各师、团干部要到本单位去，发动群众对自己批评揭发。对主要干部及部门的检查，必须多打几个回合，才能彻底，严防一晃而过。军领导除在军党代表会议上检讨反省外，现又在司、政、后各部门军人大会上当面作反省，听取群众意见，效果良好。

这样做的，就是坏的。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的批语^[1]

(1952年1月17日)

聂^[2]：

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952年1月16日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给聂荣臻的请示报告上。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关于同意华东部队把士兵代表会议 定为经常制度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1月18日)

陈毅^[1]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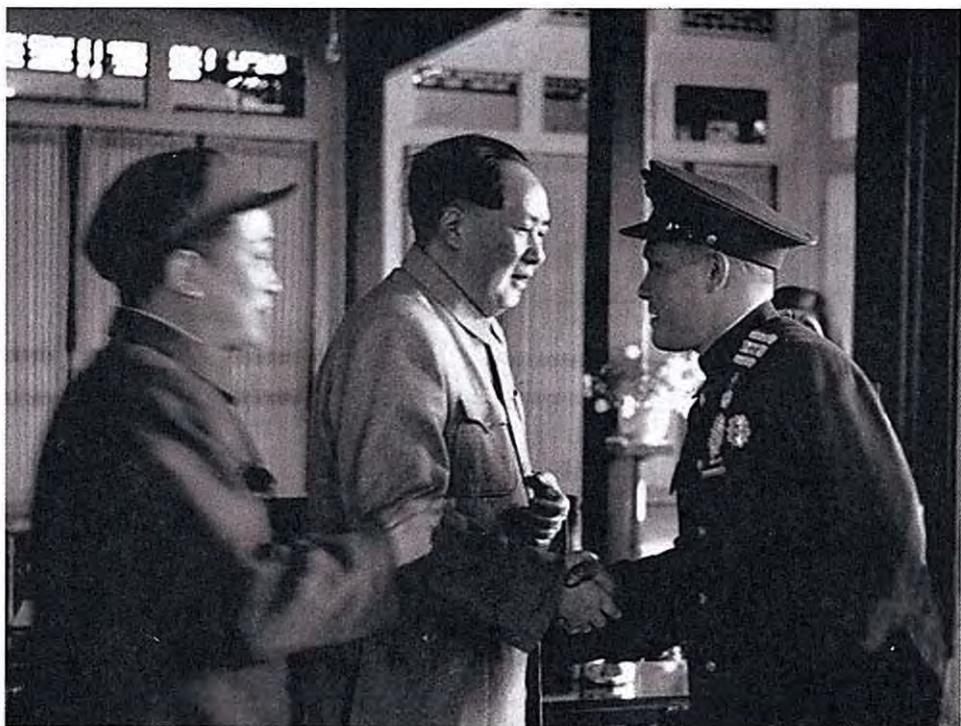
一月十六日^[2]报告收到。(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三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二月十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齐注意。(二)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2年1月16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华东部队的三反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动群众检查领导，造成领导与群众的密切结合。如不先检查领导，必不能发动指战员来进行三反。第二阶段是全面检查和坦白贪污。第三阶段是精简节约，衔接整编。为了保持群众的民主锐气，防止部队腐化，报告还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的制度，每月开会一至两天，通过领导者的检查报告和财经报告等。

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1]同志起草几条简单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施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1952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

[1] 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央关于省以上部门驻外地机构的 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 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1月20日)

(二) 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1]办理。

[1] 指中共中央1952年1月20日关于中央各部门在各地的所属单位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的第一条。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条规定：“凡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及中央军委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公司、学校、办事处、采买处和研究所等，必须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并由所在地的党委领导。凡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有阻碍三反运动或不服从当地党委领导者，由当地党委负责处理，并向中央作报告。”

中央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 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 批语和修改^[1]

(1952年1月21日)

—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师党委：

(一) 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2]（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1] 本篇第二、第三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薄一波1952年1月19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行政处分或免于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报告还提出，在反大贪污犯的斗争高潮过去之后，拟转入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算的阶段。

(二) 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月二十一日

二

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

三

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于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于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于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于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

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 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1]

(1952年1月21日、2月3日)

安子文^[2]同志：

请考虑将此件^[3]加以按语转发全国。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1] 本篇第二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3]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1952年1月16日关于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给分局、各省市、铁委、直属党委组织部并报中央组织部的通知。通知说，自三反运动在全区开展以来，地专以上机关的整党学习已难按原计划进行。农村和工矿因土改、民主改革工作繁忙，党员训练工作也不可能大量进行。因此决定将每月25日前的整党工作报告，在三反运动中改为三反报告。通知还要求各级组织部门在三反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搜集每个党员和干部表现的具体材料，并注意发现觉悟较高、历史较清白、思想意识较正确的非党积极分子，为整党建党作准备。

二

(三) 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 然后整编的电报

(1952年1月22日)

谭政、陈毅^[1]二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

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 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一) 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1]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二) 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凡于二月十日认真做好了三反并经各大军区批准，可以于二月十一日进入整编，否则一律不许整编。(三) 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0日关于三反运动给毛泽东并报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前一段三反运动的情况，提出了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一) 从政策上解脱一部分人。区分贪污、浪费界限，使有些领导干部下台，以便指挥作战；摘除一些小的公私不分、占小便宜的人的贪污帽子；对自动坦白，决心悔过，酌情退赃，贪污款在1000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的贪污犯，减轻或免于刑事处分。(二) 分配任务。由各单位自报公议，于一周内提出拿下贪污1000万元的人数的任务，并力求超过。(三) 规定战术。领导上研究重点人重点事，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通过群众运动，查账目、查单据、查商号、查关系，跟踪追击，内外夹攻，以求全歼。(四) 严明纪律，不全胜不收兵。省军区结束运动，须经省委同意，华北军区批准；军分区结束运动，须经地委同意，省军区批准。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机关三反运动 补课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省军区：

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1]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中央

一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19日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补反官僚主义的课的问题。报告说，华北局机关的三反运动，原拟于本月15日大体结束，但经过征求各支部意见，发觉虽然大多数工作人员在三反运动中较深入、较彻底地检查了自己，获得很大成绩，但对领导上有意见，不满意。他们说，“我们这里只有两反”（指没有反官僚主义），“领导上层层带头检查不够”。对机关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未作检查，尤为不满。我们研究后，认为上述批评是正确的，为了使三反运动由上到下做得更彻底、更深入，决定补上反官僚主义这一课。从常委、正副部长到处长、科长，分别在不同范围进行检查。然后由秘书长作检查及改进机关工作的报告，开展讨论，反掉一切应反的东西，建立起应该建立的新制度。最后召开党代表大会，完满地结束三反。

关于军委民航局三反斗争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检讨^[1]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此件抄送周、朱、陈、薄、李、安子文、刘景范、杨尚昆、肖华、钟赤兵、唐凯^[2]诸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局长钟赤兵1952年1月21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报告主要检查了他在处理民航局前财务处长严重贪污案件上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以及他自己生活上的铺张浪费和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三书记。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四书记。唐凯，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兼财委主任。

对纺织部关于经纬纺织机器厂 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的检讨的批语

(1952年1月23日)

周、朱、陈、富春^[1]阅。此事^[2]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纺织工业部1952年1月2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所讲的部属新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因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一事。报告说，该厂自1951年5月施工，现已完成建筑工作总量的43%，经检查，主要的机工厂房，由于勘察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工程落成时，大梁出现裂缝，280根柱子发生不平衡下沉6分至5寸的严重现象。

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 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

(1952年1月23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污〕犯。至一月十八日，认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

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下面是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报告^[1],可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1952年1月22日报告中布置的搜寻大贪污犯的办法是: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然后跟踪深入。在普查中,后勤部着重注意以下4个方面:1.查加工订货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2.查订单与货物的规格数目是否相符。3.查银行存账。4.与商人对账,从外面寻找线索,以便内外夹攻找老虎。已经逮捕的大贪污分子也要组织力量审讯,从中发现线索。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 第五周简报的批语

(1952年1月24日)

各大军区和中央局，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西南军区这个报告^[1]很好，我们要求各地都这样做。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2日关于军区直属机关1月19日干部三反大会的情况给中央、毛泽东、军委的报告（即三反第五周简报）。报告说，会前，检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分头到各部门具体情况，商定准备当场宣布的未彻底坦白的大贪污犯名单及其犯罪事实，组织人员在大会上揭发检举。在1月19日召开的有2200余人参加的干部三反大会上，共检举了尚未彻底交代、态度不老实或反省不彻底的20多人。检查委员会主任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当场宣布了处理意见。问题严重而又拒不坦白的，有的逮捕，有的撤职反省，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并检举别人的，将功折罪，免于处分。

对山西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 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

山西省委这个报告^[1]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的山西省委1952年1月20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一）全省三反运动已普遍展开，其次序是首先整顿各级非财经部门的机关和单位，然后从这些机关和单位抽出大批领导骨干投入到财经部门和工商界，并组织大批的检查组，上下互相检查。（二）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在三反开始前后都订有攻守同盟。因此，在运动发展中，要有意识地冲破贪污分子各条防线。（三）全省三反运动发展很不平衡，不少机关或多或少走了一些弯路。解决的办法是：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作自我检讨；厅、局级党员干部在向机关干部检讨前后，要到省委作一次自我检讨；省委派出得力干部，监督与帮助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委以一定权力，必要时可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派检查组流动检查，推动各专区运动的发展，等等。（四）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在第一航校党委关于三反运动 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25日)

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2]同志：

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党委1952年1月22日关于三反运动一周情况给空军党委转报总政治部、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他们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由校首长带头作反省报告，并欢迎大家揭发批评错误，从而推动了全校三反斗争的迅速展开。

[2]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 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5日)

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

今天看了十九兵团党委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三反的报告，很高兴。该兵团所属各军师的三反斗争虽然尚有许多单位做得不好，或者很不好，但有些单位做得好，少数做得很好。这种经验已使该兵团领导同志认识到不但浪费现象而且贪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报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有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这种认识是合于事实的。从我手头已收到的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师有关三反的报告看来，有这种认识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以便从各级机关和一切部门中（不仅财经部门有贪污，司令部政治部等部门也有贪污）坦白检举和检查出惊人的成百成千的中小贪污分子。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

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在未清出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清出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成了暗藏的敌人。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既已在第二阶段中清出了大批的中小贪污分子（这些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要采用教育改造方法从宽处理的），就有可能清出大小老虎，领导者必须指导群众不要松劲，不要住手，而要继续攻击，穷追务获，否则就是打败仗。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大约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除某些复杂案件外，可以在全军彻底解决问题了。运动的第四阶段是在干部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你们的三反进到捉老虎的阶段，必须与东北局的三反斗争配合起来，有些案件还要与关内各大军区配合起来，才能彻底弄清楚。在运动中，兵团、军、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人人向群众作反省检讨，即所谓人人下水洗澡，以及限期展开、指名坦白等项方法，你们已经懂得，这里就不多说了。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 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2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

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1]，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一月二十六日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1月23日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等斗争中争取多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和反盗骗国家资财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经过艰苦和复杂的工作，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中间状态的是次多数，对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是少数，约占工商户总数的6%。在违法工商户中，约有占工商户总数1%至2%的须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分。报告说，经验证明，在工商界反行贿等斗争中，必须注意采用分别对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政策。

对华东一级机关三反运动 简况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1952年1月26日)

—

饶漱石同志：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个报告^[1]收到，方针正确，成绩甚大，极为高兴。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华东一级机关和大部分事业、企业单位的三反运动，均已进入坦白检举和召开商人会议内外夹击的阶段。三反开展较好的单位，由于领导干部思想一致，在群众面前作了较深刻的检讨，并广泛发扬民主，彻底发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因而领导上取得了主动，斗争的锋芒迅即转向反贪污方面。各单位多采取大会和小会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坦白和检举。一方面对于消极怠工、拒不坦白或和商人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的分子，坚决予以撤职、停职和逮捕；另一方面对于彻底坦白自己又检举别人的贪污分子和自动坦白的小贪污分子公开宣布免罪，这样使运动迅速深入和发展。华东局1952年1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主要是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到1月23日为止已经坦白有贪污行为的人数，其中贪污一千万以上者共113人。

二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报告所述三反经验很完整，发给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三

各同志：

华东局直属机关成绩甚大，已捉大小老虎一百十三只。^[1]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华东局1952年1月24日关于华东一级机关贪污人数给中央的报告上。

对刘澜涛^[1]关于华北军区 捉虎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6日)

各同志：

刘澜涛同志这个报告^[2]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刘澜涛1952年1月25日关于华北军区最近几天打虎的成绩和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的打虎经验是：（一）重新组织队伍。由懂政策、会算账、突击力强的人，以及一部分卸掉包袱的人，组成打虎基干队，由专人负责，精心计划。（二）要有强而纯的指挥部。指挥部要心中有数，善于找重点，找弱点，先攻破最弱的堡垒作为本钱，宣扬战果，以振士气而慑敌人。（三）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查账）。捉到一个老虎后，应留下少数人去纠缠，主力则急速向纵深发展，继续追捕，不使别的老虎跑掉。

对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 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的 紧急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26日)

各同志：

华北局这一文件^[1]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26日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指示针对不少地方贪污分子揭发极少，三反就要收场，运动有轻轻滑过去的危险，决定：（一）各省委、地委、省属市委必须在群众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坚决地迅速地转入打大老虎的战斗，并确切估计情况，分析线索，作出打虎的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考虑追加数字。并且，即以此作为评定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主要标准。（二）地委、省属市委要结束三反斗争，必须经过省委批准；县级要结束，须经过地委批准。如结束后查出严重问题，批准机关及原请求结束机关要一并受到批评或处分。（三）各省委应将三反以来打虎战果和订出的新的打虎计划即报华北局。

转发中南军区关于从民主检查 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

中南军区一月二十五日的文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中南三反动手较迟，故对民主检查和反中小贪污两个阶段尚未做完的单位，必须做完，方能进入打老虎的第三阶段。各大军区和志愿军也须如此。但一切已做完第一第二阶段任务的，就应立即重组队伍，打老虎。但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5日关于三反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民主检查做得比较彻底的单位，应即转入反贪污；民主检查尚不彻底的单位，必须限期完成，随后转入反贪污。二、所有大小贪污分子必须捉净，尤其对大贪污分子更不可放松，他们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目标。三、寻找大贪污犯有以下7条嫌疑踪迹：(1)生活阔绰，行为腐化，钱的来历不明；(2)与商人有超过正常的商业往来，额外接受他们的馈赠或互相馈赠；(3)给商人开护照、发通行证、着军装、配手枪，使之往来于各个市场，任其招摇撞骗；(4)以高价买劣货，掺假，短秤，偷工减料，先期付款、延期交货，欠款不追，不合情理地报损失、报拐骗；(5)向私人商店投资、贷款，向私人银行存款生息；(6)账目不清，立假账，涂改账目，未经负责人许可，私自烧毁账簿、单据；(7)拿公家钱、公家车辆为其亲属做生意。

虎阶段。中南文件所举七条寻找大老虎的嫌疑事踪，军事系统和地方系统都适用。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 打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的决心和部署^[1]均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只至三千只。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凡未检举坦白者，仍进行检查坦白，发现大批中小贪污，但中心应转入打老虎。这种任务的转变，有的可以在二月一日转，有的可以在二月五日或二月十日或二月十五日转，但至迟不得迟于二月十五日，由你们掌握。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6日给毛泽东并华东局的报告中说，华东部队2月初转入正式打老虎，预计用10天到15天完成任务，争取打300只左右大老虎。

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 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刘、周、朱、陈、彭真^[1]阅。同意这样做，请安子文^[2]同志根据此项意见^[3]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3] 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1952年1月26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于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吊唁乔巴山逝世致布曼增迪电

(1952年1月27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增迪同志：

惊悉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元帅的逝世，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乔巴山元帅是蒙古人民伟大的领袖，蒙古人民革命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他的逝世不仅是蒙古人民极大的损失，也是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损失。乔巴山元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转发北京市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1月2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北京市的打虎经验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中央一级在一星期以前大家还只承认有几十只大老虎，一星期以来逐日增加，至昨天（一月二十七日）为止，已捉到和认为可以捉到的即共达四百只，计财经部门二百只，军事部门一百只，政法文教和党的部门一百只。这些都是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小老虎未计入。北京市委的办法是：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老虎数目，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领导上即派人复查”。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 打虎预算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一月二十九日规定打虎预算^[1]的精神很好，发给你们参考。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目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中央一级十二万人，清出贪污分子一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一百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一般须从轻处理），已经清出或准备清出的大老虎四百只，这是经过多次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达成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9日给各级党委和首长并报毛泽东、华东局的报告规定了华东各部队打虎的预算，预计华东部队在打虎阶段总共要打出大老虎266个，小老虎865个，中小贪污分子86850人。

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 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30日)

各同志：

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文件^[1]都很好。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个至一千三百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山西省委的几条打虎经验^[2]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1] 华北局的文件，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30日关于山西省应捉到1000个至1300个老虎，其中应有10%以上的大老虎的指示。山西省委的文件，指中共山西省委1952年1月28日关于山西省反贪污战果给华北局的报告。

[2] 中共山西省委1月28日给华北局的报告中总结的打大中老虎的经验是：1. 利用与控制罪恶不大、愿意改悔的私商，秘密帮助我们调查其他不法商人。2. 派女同志做大中贪污分子家属的工作。3. 集中力量，揭破贪污分子之间以及贪污分子与私商之间的“攻守同盟”，这是捉大中老虎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

转发东北局关于 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

(1952年1月3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和各军：

据高岗同志电称，东北方面的打虎经验，在人物线索方面，要注意以下各点：“（1）本人曾做商人或工厂老板，而现在混入我国家机关或企业任事者（尤其要注意那些现在仍兼营私人工商企业的分子）；（2）家庭为工商业家，而本人在我国家机关或企业部门工作者，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干部（尤其要注意在其到国家机关或企业工作后，其家庭所经营的企业发展极快者）；（3）本人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密切、生活腐化、为群众议论纷纷者；（4）掌管小家务、生活腐化、挥霍无度者；（5）采购人员经常向某商行或某几个商行采购者（可从查账、查发票中发现）；（6）从采购或推销发单中发现同时期同样物资而价格差异过大者（可用不同部门购买或推销同样器材的发票作比较）；（7）从内部检举及外部工商业者坦白检举的材料中发现线索；（8）研究现已整出的五十六个大贪污犯，从中吸取‘捉老虎’的经验教训”等语。此种意见甚好，请加注意，以利打虎。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 违法资本家致高岗^[1]电

(1952年1月31日)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一) 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收到。你们清出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二) 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但你们暂定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待运动深入可以按照情况逐步追加任务。

(三) 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例如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项，以示严肃。处理时应仿照镇反中清理积案的方法，由领导机关对一批人加以分析比较，定出处理方案，交给群众会议（本人参加）讨论，增减修正，然后由领导机关核定公布。北京有些机关这样做了，影响很好。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四) 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先组织若干强干的检查小组，向最顽抗而有确据的若干家实行检查。不查则已，查必破案（有些须坚持数天之久才能破案，不破案不许撤回）。第二批再检查若干家，又均破案。这样便取得了经验，训练了干部，教育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及一部分大资本家，促使他们坦白，同时动员工人店员实行检举。然后再组织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更多的检查破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例如逮捕、枪决（只是少数）、没收、徒刑、罚款等。北京有五万户工商业，百分之一是五百户，北京市党组织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斗争，经过几个检查步骤，还只逮捕近百名资本家。准备在二月份再经过几个检查步骤，陆续逮捕至三百名左右（不到百分之一），再看形势。这是一个逐渐了解，逐渐深入，逐渐分化，逐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过程，没有城市党组织的紧张艰苦工作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大中小之间矛盾很大，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以打击），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真正怨恨我们的只是极少数（百分之几）。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五) 为争取广大市民及近郊农民热烈拥护我们，北京市政府曾

组织二百多个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出动，代表市长到一切派出所和乡政府管辖区域，召集居民的大小会议和按家访问（派出所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回避），以三四天时间调查政府工作人员及警察的一切贪污违法行为，报告市政府处理，收效甚大。此项办法全国各城市都可仿行，并且每年应举行几次。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在中财委机关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 第二次报告上的批注^[1]

(1952年1月)

这种官僚主义^[2]，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毛注

[1]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加括号写在1952年1月9日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在中财委这样一个不直接掌管钱财，但掌握着审核财经开支大权的机关，反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虽不如贪污。”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原文紧接着有以下文字：“但它所造成的损失，则比贪污不知大多少倍。”

[2] 指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中谈到的计划局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作上陷于事务主义，把如何建立计划工作这一重大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不重视苏联专家的意见，不学习苏联和东北计划工作的经验，对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提出的开展计划工作的方案置之不理等。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处理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2年1月)

朱总司令阅，薄一波、粟裕^[1]同志阅。军队的生产已闹得不像样子，看此电^[2]可知。

毛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5日关于鲁中南军区党委建议分配部队生产盈利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山东军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军区不批准鲁中南军区分配部队生产盈利的建议是正确的。为了杜绝这类漏洞，华东军区决定：将部队生产基金及其盈利一律冻结，各部队首长、各级党委只有妥善保管经营的义务，不准私自动用；关于1952年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的处理原则，各部队可总结经验提出意见，以便重新决定公布新的处理办法。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1]

(1952年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把它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物价保持了稳定，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开展着。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这一切胜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我们总是在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

[1]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 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关于西北军区二月份应深入三反 着重打虎的电报

(1952年2月1日)

张宗逊^[1]同志，并告习仲勋^[2]同志：

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你们叫三军“准备推迟二月六日转业集训的时间”，没有明确指令二月全月进行三反。你们全区各部清出的贪污分子均很少，一亿元以上大老虎还未发动去捉，并且连计划都还没有。望速做出打虎预算电告，并下动员令打虎。

毛泽东

二月一日

[1]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对薄一波^[1]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2年2月1日)

一

有所修改^[2]，请周^[3]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

毛泽东

二月一日上午三时

二

王丕业^[4]和夏茂如^[5]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毛泽东对薄一波讲话稿所作的修改，加写的两段文字即本篇第二、第三部分，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

[3] 周，指周恩来。

[4] 王丕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

[5] 夏茂如，当时任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

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1]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2]，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

三

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1] 孙建国，曾任军委总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

[2] 杭效祖，当时任军委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

对空军第三师战况报告的批语^[1]

(1952年2月1日)

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2]

毛泽东
二月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2年1月31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等的报告说：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自1951年10月21日到1952年1月14日共86天在安乐空战，共击落击伤敌机63架，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大战果。

中央关于饶漱石^[1]病休 由陈毅^[2]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

(1952年2月2日)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3]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4]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3] 粟裕，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4] 谭震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

转发十军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日、6日)

—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十军这个经验^[1]很好。原以为没有多少搞头的，回炉再炼，就清出了大批老虎，管理排长，指导员，股长等人许多都是贪污犯。望各军都向十军看齐。

毛泽东

二月二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1月28日给华北军区党委、总政、各师党委的报告中总结的捉老虎的几条办法，即：(1)对三反不彻底的单位，重新发动群众，实行回炉补课。(2)详细分析群众检举材料，找出大贪污分子线索，然后调虎离山，由领导个别谈话，结合群众压力。(3)向群众反复表示对惩办大贪污分子的决心，各级领导分工包干，坐镇指挥。(4)找材料，对证据，经过斗争使其就范。(5)对不愿意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要猛打深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打破其幻想，使他们感到只有坦白交代才有出路。

二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在打虎阶段，又是十军的成绩最好，请各军和各军分区将十军的成绩和自己的成绩比较一下，立即作出结论来。十军截至二月二日止已捉一千万元以上老虎五十九只，预计还可捉三十只至四十只。十军“无生产无大建筑，过去被认为比较规矩”，尚且查出这么多老虎，那些有生产有大建筑，或过去不大守规矩的部队和机关，老虎当然要更多。十军的政策观点^[1]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二月六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2月5日关于打虎经验给华北军区党委、总政及各师党委的报告中谈到的政策观点，即：一、领导上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和最大的魄力，敢于大胆怀疑和顽强战斗，正确及时地了解敌我情况，保持头脑清醒（既不轻视敌人，又不急躁），适时纠正各种倾向（主要是右倾）。二、在突破老虎防线后，严防自满，要不疲倦地继续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三、党的三反政策要反复同群众见面，与贪污分子见面，只是讲还不能彻底解除贪污分子的顾虑和群众的怀疑，应用实际行动如通过公审大会把政策表现出来。四、反贪污斗争深入之后，容易产生冲动暴躁情绪和逼供信现象，必须在不损害领导积极性和群众热情的条件下，及时予以纠正。防止真老虎趁机逃走，尤应防止他们声东击西，转移目标。五、为了搞透，领导上必须确实心中有数。要分析贪污的来源和线索，弄清来龙去脉，这样既能保证贪污分子不致漏网，又可免于误伤好人。

转发李富春^[1]在中财委汇报会议上的 打虎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 李富春同志这个报告^[2]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二) 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三) 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3]都应算作大老虎。(四) 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

[1]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在中财委党组1月30日汇报会议上作的打虎总结报告。报告谈到了中财委及各财经部门1月份的打虎成绩和下一个战斗的目标、方法和步骤，并对大老虎的标准，查经济问题和查政治问题的关系，以及打老虎怎样才算搞得彻底和准确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3] 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的大老虎的6条标准是：(一) 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二) 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 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 贪污在五千万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 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六) 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

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但目前打虎尚未深入，应引导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清查经济内奸，只将政治性的问题记上一笔账，待到经济性的问题大体解决了，再将政治账上所记的问题提出来作一次清理，解决政治性的问题。（五）富春同志的报告可发给各打虎组织的领导人阅看。

毛泽东
二月二日

转发安子文关于在农村中 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同意这个报告^[1]的意见。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
省市区党委研究。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指安子文1952年1月29日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根据河北省通县地委在香河县进行农村整党结合三反的典型试验的材料指出，农村中贪污、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因此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对农村三反应明确规定：（一）农村整党和三反运动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进行对党员的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程度，使农村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二）为了能够领导这样一场大的斗争，凡参加领导农村整党的干部，必须是经过三反斗争的人。没有经过三反运动的，一律要调回来进行三反；手面不干净的，必须认真进行自我检讨，洗干净；思想界限不清楚的，要加以教育，明确思想界限，然后再派下去领导整党。（三）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必须有强的领导，否则，一下子全面轰开，领导力量不足，势必重复1948年“搬石头”的错误。因此，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分批地进行，并首先解决贪污、浪费问题最严重的村庄。

转发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 和河北打虎任务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各同志：

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1]及规定河北省打虎数目，请在你处党刊上发表。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虎二千三百只，大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自己的打虎计划。目前的特点，正像镇反初期同志们对于反革命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样，是对于大贪污分子的存在估计不足，就是说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必须不断地给以批判，才能克服此种错误思想。其严重者须由各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党委作出单独的决定，如同华北局对河北省委所作的决定那样，并且要迅速，不要迟疑不决。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3日关于停止当时河北省人民政府一位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反省，并限期一星期内作出彻底检查的决定，以及为加强河北省委领导，新任命一位省委副书记和两位省委常委的决定等。

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 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1952年2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 中南军区党委二月一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一百零六只，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中南军区的计划发给各地参考。(二)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三) 省级和地委级做此项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三级可能打出的大小老虎数字；但全国各地二月份实行三反和打虎一般应限于到地委一级为止，一般不要发展到县区乡三级去。应待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诸级的三反基本完毕，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配备骨干，组织大批三反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如同派遣土改工作队或整党工作队下乡土改和整党那样，派遣下去开展三反，才是适当的，否则可能发生大错误。此点务请同志们加以注意。有些省区已在县级及

区级展开三反的不必停止，但二月份重点仍应放在省地两级，兼及部分的县级。三月份应完成县级的三反，并准备好去区乡帮助县级领导区乡三反的干部，拟以四五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国区乡两级的三反工作。果能如此，就是一个大胜利。东北局规定“县区两级目前只以本身力量发动坦白检举，待省市搞完后再抽出力量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华北局的方针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凡已经完成土改的地方或正在整党的地方，应即将原来的土改工作队中的若干人和整党工作队调至省城加以训练，转变为三反工作队，凡有贪污嫌疑的人都不许参加，待命（待各中央局和省委之命）下乡进行三反。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和地委在目前即派出少数工作组选择少数区乡进行贪污浪费的调查和进行三反的典型试验，则是完全必要的。你们对于此项工作步骤有何意见盼告。（四）平原省武陟县县级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十八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少者占百分之十三，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1]同志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五百只，昨日（二月三日）据报，已增加至二千只。军委直属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一百只，昨天追加了一百五十只，共计二百五十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三百只，共计五百五十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1]。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百分之十以上。这些都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工作人员在内，但不包括私人工商界和私立学校。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经验，可供你们做打虎预算的参考。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指毛泽东1952年2月4日转发的华北局关于河北省某些领导人停职反省的决定和打虎计划，规定河北省打小虎2300只，大虎200只。

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致谭政^[1]电

(1952年2月4日)

谭政同志，并告各同志：

你们二月一日给所属的指示^[2]很好，证明你们已摸到了门路，打虎是有希望的。但你们一月三十一日给我的报告^[3]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少，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1日关于打老虎部署给华南军区、各省军区、各军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凡群众斗争已经发动，中小贪污分子被大批挤出，大贪污分子已经露头的部队，领导机关的注意力即应转到打大老虎。（二）组织专门的打虎队。（三）打虎队与各单位群众的检举斗争既实行分工又互相配合。（四）用一切必要的方法分化贪污分子，打破各种攻守同盟。（五）正式宣告凡有老贪污行为至今隐瞒不报的，必须限期坦白，否则一经查出，加重处罚。（六）打虎阶段务必聚精会神，调集足够的干部，组织得力的指挥机关去进行作战。

[3]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1日关于三反运动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中南局的第五次报告。报告汇报了民主检查阶段的概况，反贪污斗争的初步收获，以及下一步打虎的部署，并给华南军区和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5个省军区分配了打虎数目。

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毛泽东

二月四日上午十时

对华北区二月底以前 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4日)

薄一波、刘澜涛^[1]同志，并告各同志：

二月二日报告^[2]收到。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你们计划在二月底全区捉大中小虎一万一千多只，还只包括县以上的，不包括县以下的，只包括党政军民学内部的，不包括工商界的。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东北局二月二日来电说“东北地区的老虎估计会不少于两千”。这里未说明老虎的大中小。如包括大中小虎，则数字太低，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二万只以上。华北县以上即有大中小虎一万多，如包括区乡，亦当在二万只以上。如东北所称二千是指大老虎，则比华北的一千二百只大老虎高得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2年2月2日关于华北2月份内捉虎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薄刘电尾几点^[1]都是对的。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指薄一波、刘澜涛2月2日报告最后部分讲的几个策略性问题，即：（一）乡村一级暂时一律不进行三反，待县以上单位搞清楚，腾出手来以后再搞。（二）情节十分严重，贪污数目虽不及一亿元，但使国家损失超过一亿元者，一律以大虎论。（三）因三反或因惩处不法资本家而使工厂、商店生产陷于停顿者，应指定负责人开工营业，不要因三反而使生产长期停顿。（四）应在时机成熟和必要时，杀一批，判徒刑一批，赦一批（亦应有行政处分），以促进大贪污犯分化和坦白。

关于转发三个打虎文件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各同志：

这里三个文件都很好，值得看一下。一个是二月二日东北局的报告^[1]，其中所说打虎的十条经验都是好的。又一个二月二日华东军区党委给所属的指示^[2]，其中所说老虎类型之多，分布之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2月2日关于打虎计划的报告。报告中所说的10条打虎经验是：（一）要抓住重点。（二）迅速纠正某些部门领导人迟疑犹豫，缺乏打虎决心的错误倾向。（三）在群众中不宜提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免得引起大贪污分子将问题隐瞒在几千万元以下。贪污不足一亿元，但危害甚大者，亦应看作大老虎。（四）注意从坦白分子中追出材料，拉出一串。（五）坦白得好的老虎，可不予逮捕，并适当鼓励，从轻处理。（六）逮捕犯法的资本家应经省、市委批准，并报东北局。工厂主或商店主被捕，应指定代理人进行管理，继续生产或营业。（七）三反中遇有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应沉着应付，不要因此转移打虎目标，待打虎告一段落后再予打击。（八）打虎期间工厂生产、铁路运输、收税征粮、贸易购粮等不能停顿，应留出力量领导生产。（九）在打虎时，群众和积极分子的压挤与负责同志的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可以双管齐下，促其坦白。（十）不能仅仅在几个负责人的浪费与官僚主义上做文章，要引导群众去捉老虎。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日关于打虎问题给所属的指示。指示说：各机关各部门都是资产阶级进攻的对象，都会产生大小老虎，因而无例外地都要查、要打。最近，军区文化部、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都打出了各种类型的老虎。破大贪污案，要采取专案专人专办、包干清查的办法。专案专办又要与广大群众的检举相结合。

广，足以发人深省，引起打虎热情。第三个是二月一日中南军区党委给所属的指示^[1]，说的都是内行话，证明他们已经摸到了门路，取得了经验。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毛泽东
二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1日关于打老虎部署给所属的指示。

关于注意领导生产问题^[1]

(1952年2月4日)

(六) 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答谢胡志明祝贺中越 建交两周年的电报

(1952年2月4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同志：

感谢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二周年纪念时的友谊祝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北京

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及各同志：

一月三十日报告收到。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不包括社会工商界），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当然凡未经过坦白检举阶段者，须先经过这个阶段，方能进行打虎。县以下暂时不应发动。内部的三反应和社会工商界的五反有适当的配合。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月五日

中央关于派彭真、罗瑞卿^[1] 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

(1952年2月5日)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

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中央
二月五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浙江省委，并告华东局及各同志：

你们二月二日二十一时报告^[1]收到，你们的认识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包括省、地、县、区、乡五级，党、政、军、民、学五面，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只至三千只，或者还要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在内。

毛泽东

二月五日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2年2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综合报告。报告说，根据浙江省三反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已明确规定三反斗争是当前各级党委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除春季农业生产必须在不误农时原则下予以照顾外，领导精力必须毫无借口地集中于掌握三反运动。同时，省委为及时掌握各地情况，加强领导，决定省委各委员每人掌握一个地、市委，实行分类指导，以保证运动稳步健康发展。县以下的三反运动，在地委、专署机关的运动结束前，地委领导精力照顾不过来的情况下，必须稳步展开，不可到处点火。为此提出，每一个县三反运动的开展和结束，都要得到地委批准，地委结束三反要得到省委批准。对工商界中的五反运动，因斗争更加复杂，我们缺乏经验，加之三反正处紧张阶段，决定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对六十六军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

六十六军是入朝参战部队，回国也不很久。过去捉虎无成绩，经严督后重整旗鼓，两天即捉到中小虎二十三只。请你们严督各部各军限期大批捉虎，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五日

在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 复电稿上加写的话^[1]

(1952年2月5日)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
惩办，不得姑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的复电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对劳动部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 行政部门进攻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6日)

刘、周、陈、薄、富春^[1]阅，退李立三^[2]办。

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3]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富春，即李富春，当时均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

[3] 指劳动部党组1952年2月6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给中财委党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对付资产阶级侵蚀的几条建议，即：（1）在三反运动中要切实检查劳动行政部门中被资产阶级腐蚀和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分子，对那些接受资本家贿赂，在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2）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应选择上述典型，召集大小会议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并号召所有工作人员坦白检举这种行为，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3）在运动过程中或运动结束后，要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把那些受资产阶级侵蚀很深或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开除或调出劳动行政部门。（4）在打虎阶段结束后，中央和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均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工作检查，批判在政策上、业务工作方针和做法上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并在此基础上制订新的工作方针和1952年工作计划。

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
二月六日

转发中财委关于财经工作 几点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6日)

此报^[1]应转发各中央局照办。

毛泽东

二月六日

[1] 指中财委党组1952年2月4日关于同意中南财委党组的财经工作报告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三点意见：（一）今后财经工作的三个中心环节是计划（了解情况，确定政策）、基本建设（方针、设计、施工）和经营管理。在三反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清除这三个环节中资产阶级的侵蚀与影响。在财经工作中严格划清无产阶级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界限。（二）在基本建设中，必须反对以小农经济、手工业的观点来处理近代化的工矿交通建设。要按科学办事，从早准备，才能快。地方工业的投资很大，必须提高计划性，克服盲目性。地方工业计划必须交中财委从全国着眼审核批准。（三）县以下的统计工作是否还是有重点地搞好，请加研究。计划统计干部要慎重选择，有计划地培养。要警惕资产阶级钻入计划统计部门。

对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薄一波同志，并告各同志：

(一) 同意这个报告^[1]，并请各同志仿办。(二) 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于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毛泽东

二月七日

[1] 指薄一波1952年2月6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2月1日公审大会对大贪污分子采取大压大放政策，为以后打虎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更大更多的贪污犯将在今后10天内大批就网。报告提出了几个策略问题：第一，对难于攻下的贪污犯，特别是带政治性的、经济内奸性的大贪污犯和老干部中的贪污犯，不应采取简单的猛、狠、压的办法，而应以斗智攻心为主，群众压力为辅。第二，必须从算大账到算细账，做到心中有数，没有做的必须补做。第三，领导干部必须一层一层地作自我检查，打扫干净再下楼。第四，充分利用一切直接、间接的后备力量。第五，实行专案专组、限期破案、包打老虎的办法。第六，集中使用力量，以部为单位，统筹调配。

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中南军区党委：

二月六日报告收到。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这个数目可以包括大军区直属部门在内。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2月4日关于在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从半个月来上海市部分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的民主改革和三反试点工作看，工厂中的贪污浪费情况十分严重，是老虎集中的地方，开展三反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也是当前工厂中进行一切工作的关键。因此决定所有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的工厂，只要领导条件具备的，都要无例外地开展一次深入彻底的三反运动。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不仅不与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相冲突，而且可以完全结合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基本动力。鉴于工厂既是一个紧张的生产机构而又是大老虎集中的地方，在工厂中进行三反，不仅要彻底肃清贪污浪费，消灭大老虎，而且要不妨碍生产并有利于生产，因此要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点：1. 正确处理工人的偷窃与“揩油”行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应当是正面教育，建立制度，不究既往，杜绝今后。2. 慎重而严肃地处理工会经费、福利事业与合作社中的贪污浪费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彻底弄清是非，认真向群众交代，又不要打击干部的积极性，伤害许多可以改造与挽救的干部。3. 对有贪污行为的职员与技术人员，要采取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原则，并根据其技术高低和作用大小加以区别对待。4. 工厂中的贪污现象极为普遍，必须有重点、有意识地检查贪污和搜捕大老虎，防止盲目地泛泛地进行。5. 在工厂中进行三反，其内容较机关更为复杂，而干部条件又相对较差，因此要特别强调有准备有步骤地展开，不能机械地照搬机关的一套做法，不能简单从事、限期完成。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大城市党委：

中央认为上海二月四日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的文件是正确的，特给你们参照办理。

中央
二月七日

关于推迟公审违法资本家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8日)

—

彭真^[1]同志：

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二

周：

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对刘澜涛^[1]关于六十六军 捉虎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陈毅、谭政、贺龙、宗逊、高岗、德怀^[2]诸同志，并告刘澜涛同志及各同志：

根据六十六军的打虎预算及已得成绩^[3]，你们的打虎预算均须重做。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六十六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澜涛在1952年2月7日关于六十六军打虎成绩和经验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该军打虎预算为220只，内大老虎22只。截至2月6日，已打虎141只，内大老虎4只。

转发天津十一区打大虎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各中央局，请转所属各大城市的党委同志们：

这是新华社天津分社二月六日的内部电讯^[1]，报道天津第十一区的同志们向奸商进攻获胜的一件好消息。这是天津同志的有益创造，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新华社天津分社发的这篇内部电讯说，天津市第十一区节约检查分会采用突破一点控制全盘的方法向资产阶级展开猛烈的进攻，获得了很大成绩。他们选择问题最多的五金、橡胶、木行、汽车轮胎等7个行业，研究他们偷窃行贿的规律，在各行业中突破一点，从一点中得出材料去突破全行业。他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使用积极分子，即一方面发动工人、店员检举，并把资本家的亲信职员特别是会计争取过来，另一方面是争取一部分资本家起义。这是击破资产阶级的有效方法之一。

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刘、朱、周、林、聂、罗荣桓、肖华^[1]及军委各部门。请肖华同志以电话告刘伯承^[2]同志：

(一) 二月三日二月四日两个报告^[3]看到了，很好。(二) 军事学院包括各附属单位在内，可能有大老虎几十只至百余只，中小老虎几百只，请他注意搜捕。(三) 像朱由芹^[4]一类的人要严惩。

毛泽东

二月八日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委1952年2月3日报送军委主席、副主席、总政治部的三反情况简报第三号，和刘伯承1952年2月4日关于朱由芹贪污腐化及对其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4] 朱由芹，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在三反运动中受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1980年2月，军事学院党委对朱由芹在三反运动中的错误和所受处分进行复查，认为他在分管机关生产的工作中有一定的错误，但原处分的主要事实依据有很大出入。经总政治部批准，于1980年4月撤销了对朱由芹的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恢复准军级待遇。

关于纠正连队干部军阀主义作风问题^[1]

(1952年2月8日)

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者，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连队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

(1952年2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 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 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中央
二月九日



1952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



1952年，毛泽东和江青等在北京郊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访问农民。

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稿和毛泽东对此稿的说明

(1952年2月9日)

—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

鉴于贪污一千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于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于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的。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

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元以下而免于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于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

中共中央
二月九日

二

刘、朱、周、陈、彭真、林彪、聂荣臻^[1]各同志：

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毛泽东
二月九日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对高岗^[1]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9日)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二月六日电^[2]收到。(一) 沈阳公审计划很好，请将各类处刑免刑犯人姓名、罪行和量刑轻重事先摘要电告中央，得复再行公审。公审应由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主持，可以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应由最高检察署东北分署为起诉人，北京二月一日公审由各机关为起诉人，有些人认为不妥。(二) 上述各点请各大行政区注意。(三) 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四) 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军事机关应归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领导，统一制定和修改打虎预算，统一指挥打虎行动和研究打虎战术，但各级军事机关同时又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二者分工而又统一，利于配合打虎。(五) 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迫(逼)供信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指高岗1952年2月6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东北全区计划打大老虎4000只，中小老虎2.5万只，并准备于2月15日左右在沈阳开一个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各类案犯作出不同的判决，以推动运动的前进。

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毛泽东
二月九日

对华北军区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9日)

安子文^[1]同志：

此件^[2]请你和肖华^[3]等同志商酌拟处。我意这个提议是好的，应根据这个提议发一指示。

毛泽东

二月九日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2]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7日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华北局的报告。报告提议对在三反运动中已被撤职或撤职查办的干部，应即停止其因职务而享受的一切生活和政治待遇，并提出了几条具体处理意见。

[3]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转发华东军区捉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军区及志愿军党委，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二月七日报告，该军区计划捉大虎一千只，小虎三千只，并定五天一小关，十天一大关，要各部交账，督促甚严。该军区二月五日小关收账，计捉到大虎一百零八只，小虎六百四十九只，挤出中小贪污分子九万七千多人。望各军区向华东军区学习，严格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

二月十日

对刘澜涛^[1]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 捉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同志：

单是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人员中就能捉到二百只或者还要多的大老虎，八百只以上的中小老虎，这对于那些对大贪污犯存在的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对打虎预算定得很低的方面或部门，特别是有些军区的方面或部门，是一个大的教训。务请同志们以这类实例教育所属干部，增加打虎勇气。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毛泽东

二月十日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对张宗逊^[1]等关于西北军区 整编问题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张宗逊、潘自力^[2]同志，并告习仲勋^[3]同志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

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4]，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西北军区系统是三反斗争中最不起劲和成绩最小的。西北以至全国各军区，不但二月要以整月进行三反，恐怕三月还要以一个月才能彻底完成三反。不完成三反不整编，这点早就通知了你们，为什么你们这样不热心于三反而在三

[1]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潘自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3] 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4] 张宗逊、潘自力1952年2月6日给所属并报军委的关于整编中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说，2月份集中全力进行三反。为使3月份整编部队工作进行，在不影响三反工作的条件下，各部应于2月20日后抽出一定干部，根据编制名额，进行整编中干部配备的研究工作，经党委讨论后于3月5日前将科团级以上各类干部的配备名单报军区初审。

反尚未进入高潮时期却这样热心于整编呢？

毛泽东
二月十日

转发济南市委 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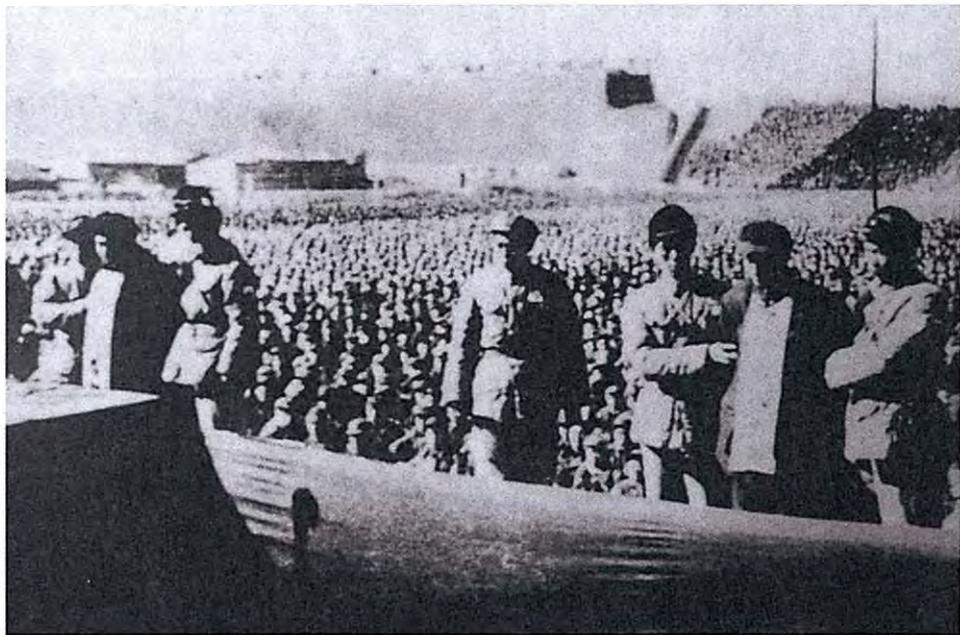
[1] 指中共济南市委1952年2月5日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报告说，济南市工商业界的五反已进入全面检查阶段。根据一个多月的经验，搞好这一工作的基本环节，在于搞好基层工会工作，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在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这两个回合搞得好，可以使资方完全低头缴械，如政府的行政压力和分化瓦解工作再配合得及时得力，就可以完全打垮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并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生动有力的教育和发动。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主要做法是：（一）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特别是要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工人阶级对五反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激发他们参加这一斗争的积极性。（二）必须特别注意对高级职员的工作，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积极投入五反斗争。这一着关系斗争的全局，十分重要。（三）劳资见面一般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1）基层工会组织比较健全；（2）大多数职工已经发动起来；（3）对干部和职工进行了充分的政策教育和策略教育；（4）已经掌握了较全面的、充分的材料。（四）劳资见面前，应要资方先交出坦白书，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要严密地组织火力，并进行适当的宣传鼓动工作。要有统一指挥。第一次见面要在火力充分展开后适可而止，指出问题，令其准备再做坦白。会后要总结经验，重新组织火力，准备第二次见面。（五）检查队下去时，也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好基层厂店劳资见面会议，使检查取得成功。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大中城市党委同志们：

兹将济南市委二月五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

毛泽东

二月十日



1951年12月，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图为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89/120

各中快信 但望不... 附注

1952.2.12

附注

内容 主席批转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

各快信，并转所属各大城市中共城市工作组同志们，请将济南市委二月份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以便你们进行，并在党报上登载。济南市委的领导基础是巩固有成效的，各城市在开始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

二月十日

毛泽东起草的《转发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对王鹤寿^[1]等关于东北工业部 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同志：

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2]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十日

[1] 王鹤寿，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

[2] 指王鹤寿、吕东、安志文（后面二人均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2月4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给东北局、高岗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所总结的经验。报告说，现有的打虎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就会有老虎。从已查出的77个大贪污犯来分析：第一，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互相勾结，里应外合。第二，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其破坏性最严重。第三，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第四，大贪污案件较多的时期是：1948年末与1949年初南满解放、四野进关的接收时期；1950年末抗美援朝后的迁厂时期；1949年基本建设大批向外包工时期；1951年下半年处理呆滞材料时期（这一时期发现的老虎，往往与处理水泥、木材、钢铁、五金材料、电气材料、废料等物资相关联）。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地、县、区 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 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1日)

中南局，并各中央局：

中央同意中南局二月八日给分局各省委并告中央电中所说的各项意见^[1]，并请西南局西北局考虑采行。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2月8日关于地、县、区进行三反要和土改工作相配合的指示说，要想将土改和三反两件事都做好，就非一先一后不可。如果同时并进，只有两相牵制，两相耽误。因此建议各省：一、集中力量做好省市级及部分地级的三反，做好大中城市的五反。二、一律主动地将县、区、乡三级三反推迟到土改和复查运动结束后进行。三、县级力量一般较弱，地委主要精力也须集中在土改指导上。四、农忙季节必须不误生产，三反运动如将乡一级包括在内，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三反和土改这两件大事，做不好都不许收兵。五、如有人借口新区，认为县、区问题不大，三五天即可搞完三反，绝不可信，必须据理反驳。

行认真的三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则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中央
二月十一日

祝贺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2年2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表示深切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

我们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依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各协定的精神，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热诚的、慷慨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

我们祝贺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日臻亲密。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好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北京

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

(1952年2月11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各级军区：

华东局二月八日给所属党委的指示，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五千只，中小虎二万只，不包括区乡，不包括军队，不包括工商界，只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经企业的。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至今天为止，没有哪一个大行政区的预算比得上华东，华东局认为他们的计划“仅系大体估计和初步要求”，准备根据情况随时增加预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华东局文件中所说二月份打虎未净者推迟至三月完成以及区乡三反不违农时诸点，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关于中南打虎应大致 和华东看齐的电报

(1952年2月11日)

邓子恢、谭政、叶剑英^[1]三同志，并告小平、贺龙二同志：

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华东局八日电告，不包括区乡、军队和工商界，单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政企业打大虎五千，中小虎二万。另外华东军区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由此看来，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万，还是低了。军队方面，必须和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地方应增多少，请考虑再告。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的批语^[1]

(1952年2月11日、12日)

—

各同志：

六十六军的打虎经验^[2]应成为全军各单位，特别是各军师和各军分区打虎斗争的模范。十军因发生逼供信错误已不是模范了。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1] 本篇这三个批语，其一是1952年2月11日对华北军区党委2月9日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通报的批语；其二是1952年2月12日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其三是1952年2月12日对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2月11日关于派人考察六十六军打虎情况与经验给毛泽东的报告的批语。

[2]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9日通报中所说的六十六军打虎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领导层层带头作自我检查，走下“楼”来指挥部队向贪污开火；（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上迅速克服对情况估计不足的右倾情绪；（三）在战斗中不断提高领导和群众的战术水平，攻破他们的道道防线。方法是：精密研究敌情，确定打虎对象；大会、小会、个别谈话相结合，阐明政策，反复攻击；组织打虎基干队；对订立攻守同盟的贪污集团实行分割包围，等等。

二

各同志：

六十六军的打虎决心和打虎方法^[1]都是很好的，请你们收到后转发所属各单位，并印成小册子发给一切打虎小组当作课本去阅读。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方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六军党委1952年2月7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中所说的打虎决心和打虎方法，主要是：一、在打虎深入过程中，不断克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官僚主义。在领导思想上掌握“大胆怀疑，追加预算”八个字；战斗意志上掌握不搞尽贪污决不收兵，提出以战胜帝国主义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打老虎的响亮口号。二、找好老虎，“大会点名，公开宣战”。战斗准备要充分，要动员群众，宣布政策，组织首长挂帅的打虎队，特别是要调查研究敌情，找好目标。三、战术上，对大、中、小老虎所采取的“坚守工事防御”，有针对性地采取“攻坚战”。战术是：1. 反复讲政策，动摇敌心；2. 大会压、小会挤，结合干部谈话，内外夹攻，八方围歼；3. 调虎离山，放虎归山，打破共同防线；4. “勇敢加技术”，打要害，打弱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胜深追猛追，直至夺取核心工事。

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因此，六十六军的经验，不但军事系统的同志应该研究，党政民学各系统的同志都应该研究。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三

各同志：

请你们注意寻找这样的典型经验^[1]。每一大区找着一个，就可以教育全党，推动整个打虎斗争。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下午四时

[1] 指刘澜涛1952年2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的六十六军打虎经验。主要是：一、领导上能具体仔细地分析情况，因而决心很大，信心很足，并能根据情况发展，大胆怀疑，追加预算，务求搞透搞净，不貽后患。二、不断地深入发动群众，及时召开大会，报告战绩，解释政策，介绍典型，以活的事实教育群众。三、普遍搞，重点“挤”，与首长挂帅的打虎队的突击相结合。四、心中有数，精打细算，抓住材料，穷追到底。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直属机关 打虎经验的通报的批语

(1952年2月12日)

各同志：

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1]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9日向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和中央、毛泽东通报的华东直属机关九条打虎经验是：（一）严厉批判与坚决克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是开展打虎运动的首要环节。必须首先打倒“思想老虎”，才能使干部清醒头脑，擦亮眼睛，积极投入捉虎战斗。（二）打虎必须整顿队伍，加强阵容。对于领导弱、骨干少、老虎多的部门，上级领导必须亲临前线，深入虎穴，果断改组其领导机构，并派出督战官和组织打虎队去助战。（三）寻找虎窝和老虎线索，根据敌情，制订初战计划，分工包打。（四）从重点中发现弱点，然后集中火力猛攻最弱的老虎，力求初战大胜，为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五）善于经过查账等，并结合群众检举，找出老虎的弱点。（六）对已被抓住把柄的老虎，必须立即隔离，采取大会压、小会挤、内外追、个别谈话、领导开导、家属劝说、反复对证等方法，使其俯首投降。（七）必须充分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以虎攻虎”，打破他们的攻守同盟，迫使老虎就范。（八）对于成群成窝的老虎，必须注意从老虎身上追老虎，突破一只，追出其他老虎线索，迅速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九）不要因集中全力打虎而放过中、小贪污分子。

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对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 几项决议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12日)

同意这个报告。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52年2月11日关于2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的几项决议给毛泽东的报告。几项决议是：一、关于大老虎的标准和算法问题。规定：1. 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和贪污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者，均须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批准，才能定为大老虎。2. 在全国解放时隐瞒侵吞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在一亿元以上者，系指入城前后确定为应交人民政府而未交者；至于解放前隐瞒侵吞国民党或日伪财产者则一律不算；至于应没收之汉奸财产，作另案处理，也不能算大老虎。3. 在入城后历年来贪污之物、款折合人民币问题：物资，应按现在价格折合为人民币；现款（包括金银、股票、各种钞票在内），以当时折实单位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二、为加强中央各部门大贪污犯的审判工作，在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下设审判委员会，以吴溉之为主任，龚子荣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审判工作。三、统一北京市的

调查工作问题。1. 根据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规定对营造、五金、木材与木器、电料、汽车材料与修理、文具纸张、西药等行业着重检查的原则，采取以行业为单位全面的统一检查和有重点的统一检查相结合的办法。首先统一检查营造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派人参加，与中央各部门密切联系，互通情报，避免各自为政的现象。2. 其他行业一般均采用动员的方式，召开大小座谈会，动员工商户坦白与检举，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组织，中央各有关部门可派人参加收集所需要的材料。3. 不许任何机关私自派人检查工商户，严禁私自传讯与打骂行为，与中央各机关贪污犯同案犯罪的工商户的逮捕与封闭、没收财产、追偿赔款等，均应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后，经北京市统一处理。

关于转载王芸生^[1]文章给邓拓^[2]的信

(1952年2月12日)

邓拓同志：

请将王芸生这篇文章^[3]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4]。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1] 王芸生，当时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2]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3] 指王芸生在1952年2月9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人民日报》于同年2月13日予以转载。

[4] 毛泽东删去了王芸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央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

(1952年2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

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用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1]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二月十三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10日关于贪污分子死刑案件批准手续的规定给内蒙古分局、各省委、京津两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规定：（一）各省市召开公审大会，审理死刑案件，均须经省委或市委反复讨论，各方考虑周到，一切判词、讲话准备齐全而成熟，然后由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签字送华北局审批。（二）所有拟判死刑案件，除党内送审外，均须由省政府主席或市政府市长呈请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执行。（三）拟处决的贪污犯，当地党委和政府必须和该犯所属机关的主管负责人事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决定。（四）大贪污分子涉及政治问题者，暂时均不处理，放在三反后期或以后再办。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 增加打虎预算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3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由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增为大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中注意维持 经济工作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 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3日)

各中央局：

东北局此电^[1]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中央
二月十三日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2月11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生产、贸易、税收、运输等计划和警惕、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电报。

关于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 全力对敌的电报

(1952年2月13日)

彭、邓、陈、甘^[1]，并告高、贺^[2]：

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3]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3]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2年2月9日关于第一线军之第一线营连部队应加强战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党委并报毛泽东的电报，和彭德怀、邓华、甘泗淇1952年2月12日关于美伪军企图向我进攻望各部提高警惕给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军委、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

朝鲜停战谈判能否成功 系于美国政府有无诚意^[1]

(1952年2月14日)

—

周总理：

略有修改，请酌定。以你去讲为好。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二

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

[1] 这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 处理意见的指示

(1952年2月15日)

天津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告中央财委：

(一) 中央同意天津市委二月十四日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二) 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1] 指中共天津市委1952年2月14日关于在三反、五反期间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给毛泽东、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市委研究以上情况后，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对于五反中已逮捕的奸商的财产问题，过去只注意查账未注意掌握钱财，奸商在被捕前财产隐匿不少。一查封，资本家的代理人就躺倒不干，工人要求复工开业，但是没有原料，没有资金，机器破烂，困难很多，只好由财政局垫发工资。市委认为，一律查封不是好办法，必须防止资本家把钱抽空，影响五反的经济果实。

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在北京有一万户，在天津有一万几千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在北京约占全体五万工商户的三万七千多户。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线，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于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第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北京天津两市必须于本月内做完。做迟了，很不利。（三）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做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四）剩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

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北京天津拟共只杀十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五）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我们将他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六）关于拨给加工定货任务问题及其他和恢复或维持正常经济生活有关问题，请中财委速予处理。

中央

二月十五日

关于中央一级不准备审判中小贪污犯 复习仲勋^[1]电

(1952年2月15日)

仲勋同志：

二月十三日电^[2]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2月13日关于建议中央推迟召开原拟于2月16日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包括若干情节严重的中小贪污犯)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给毛岳乔^[1]的信

(1952年2月15日)

岳乔兄：

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此复，顺颂清吉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1] 毛岳乔（1892—1957），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毛泽东的房兄。曾在湘潭城内经营粮行。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同他交往较多。

对周恩来关于解决三反中 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周总理：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1]，请速予调整。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1] 指周恩来1952年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反中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信中说，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薄一波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信中还说，要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天津市委电报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另一面，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在全国至迟3月1日也可以这样做。

转发中南军区后勤部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各同志：

这个经验^[1]很好，各处都可参考。特别是后勤系统要采用这个经验。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后勤部1952年2月11日关于打虎经验给谭政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必须明确认识后勤系统内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管钱多物多的出大老虎，管钱少物少的出小老虎，这已经成为规律。（二）打虎队一进虎穴就是反贪污，领导暴露有贪污的要立即撤换，由工作组长兼代。（三）要有决心，有气魄，不要姑息和怜悯，凡领导反贪污不力者要坚决换下来；有重大老虎嫌疑的领导者，要坚决撤换下来；对贪污有据拒不坦白者，不论其身居何要职，要坚决管起来（软禁在本单位或送军法处）。（四）要多组织力量，多开辟战场，展开兵力，消灭一切死角。每个突击队要按具体对象分配力量，订出战斗计划与捉虎任务，采用包干制，一包到底。（五）细心算账，周密调查是擒虎的有效办法之一。要认真地查账目、查合同、查订货、查工程、查人事、查生活、查历史。（六）对贪污分子周围的家属、工作人员和经常来往的亲朋好友，要周到地做工作，区别对待，或促其坦白，或动员写信，或当面劝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七）打虎队伍要两路作战，既要对付机关的贪污分子，又要对付与机关贪污分子有关系的外部奸商。经过内外夹攻，两路会师，他们的攻守同盟就会解体。在捉住内部老虎的同时，必然捉到一批外部老虎。（八）召开对贪污分子有押有放的大会，兑现政策，各单位趁热打铁，对贪污分子展开攻势，收效显著。

对一九二师炮兵团部分同志关于 三反斗争的建议信^[1]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安子文^[2]同志：

请你拟出一个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办法，并在总党委讨论一次，斟酌妥当，然后提交中央。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

此件请抄发总党委各委员阅看。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一九二师炮兵团政治处的12位同志，于1952年2月11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两条建议：（一）捕捉大小老虎千万不要放弃捉公开的老虎。信中说，部队中的大贪污分子，一部分是从后勤财经工作的；还有的是团以上的军政首长，他们用不着像一般贪污分子所用的方法贪污，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力任意支取公款或其他物资，明目张胆地贪污，建立私人家务，有少数人发了财。建议对此进行清查，有可能从中捉住一些大小老虎。（二）贪污浪费应该分清。将公开动用公款供个人享受算作“迹近贪污的浪费”，无疑是纵虎伤人。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1952年2月17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

(一) 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收到。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二) 中南局率性将三反时间拉长些，分为四期，时间半年以上，配合各项工作来做，就整个大行政区来说，就包括县区乡三级的三反来说，尤其是就尚未完成土改任务的区域来说，是可以的，恐怕也只有如此做才能做到彻底。这样规定在各区是否适宜，请各中央局加以考虑。但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军委同意志愿军三十九军主力 停止打虎转入战斗的电报

(1952年2月17日)

志愿军党委：

转来卅九军二月十六日电^[1]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

军委

二月十七日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转报的三十九军党委1952年2月16日给志愿军党委、兵团党委的电报。电报说，今日5时30分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40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关于同意西南区打虎新计划的复电

(1952年2月17日)

邓小平、贺龙^[1]二同志：

二月十三日电^[2]收到，同意你们的新计划。待过一时期再行酌量增加。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2] 指邓小平、贺龙1952年2月13日关于西南区打虎战果及第二步打虎追加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截至2月11日，西南区地方和军队系统已捕捉老虎10028只，第二步计划打虎必成数为1.7万只，期成数为2万只，内大老虎至少占1/10。

转发习仲勋^[1]关于西北区打虎 新预算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7日)

习仲勋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

(一) 二月十四日报告^[2]收到，很好，转发各同志参考。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千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酌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二) 各级军区的打虎预算和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三) “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四) 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2月14日关于西北全区打虎新预算和应采取措施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全区计划打虎13000只，其中大虎1300只。为实现这个计划，务必做到：第一，和右倾思想不断作严肃斗争。第二，党委统一领导，各系统各部门分工负责，两者结合，不可偏废。第三，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撤职、逮捕、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无期徒刑、死刑批准权，概归军政委员会。第四，捉虎要注意某些偏僻角落。最后，大区机关拟举行一次审判大会，公开处理几个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体现政策，以进一步推动打虎运动。

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关于派陈伯达^[1]去东北 了解五反情况给高岗^[2]的信

(1952年2月17日)

高岗同志：

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关于中南军区应增加打虎预算 致谭政^[1]等电

(1952年2月18日)

谭政同志，并告剑英^[2]：

二月十三日电^[3]收到。你们军区打虎预算据中南局最近电告增至打大虎八百，这比你们过去的数字是增大了，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但可稍迟一会再增加，并须启发下面同志自动增加，始不觉得太勉强。特别是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最近看了四十八军打虎渐多，应即以之教育全军。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3] 指谭政1952年2月13日关于目前华南军区打虎预算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华南军区第二次预算，加上驻两广各军及广西数字，计划共捉大虎183只，中小虎2164只。

对罗瑞卿^[1]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 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2年2月18日)

—

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2]诸同志：

兹将罗瑞卿同志从汉口来报^[3]一件发给你们阅看，请对你们那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

[3] 指罗瑞卿1952年2月16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中南军区认为，在打虎中必须派遣有决心、有办法的指挥官去后勤部门坐镇和领导；组织打虎队，订出计划，实行包干；采用查经济、账目、合同、单据、订货、加工、工程、生活、历史、关系等“十查”的办法查找老虎，再经群众大会猛攻、小会细算细查和个别开导，大体就能攻破。报告还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二

罗瑞卿同志：

（一）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后勤系统的报告收到，很好，已发各区仿办。（二）你的任务是考察和帮助党政军民学整个三反打虎工作，不是专为公安系统，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宣教系统 打虎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转发文教系统仿行。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1] 指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1952年2月17日关于宣教系统打虎情况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打虎以来，文教系统是“清水衙门”“小贪污难免大贪污没有”等麻痹思想已一扫而空。文教系统已落网大虎6只，中小虎67只，现正在继续搜捕中。报告提出文教宣传系统打虎中应着重掌握的几个问题：（一）严格掌握政策，纠正单纯依靠群众压力解决战斗的错误思想，强调要深入动员群众，艰苦细致地调查研究材料，严格控制召开斗争大会，防止逼供信。（二）对高级知识分子既要洗澡，又要坚决帮助其过关。拟在他们对自已问题交代得差不多时转入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批判。（三）分类指导，抓好重点，照顾一般，根本没有骨干的单位，暂时搁置，腾出手来再搞。报告还说，拟在打虎结束时，与大专学校文艺部门开展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的同时，在宣传部内部开展一个彻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对劳动部关于劳动行政机关 在三反中应注意的几点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陈、薄、李^[1]，及彭真^[2]同志：

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做法^[3]，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

[1]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彭真，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3]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1952年2月5日关于三反运动打虎情况及经验的报告，总结了他们重新组织打虎队伍，再一次发动群众，对反贪污斗争尚不彻底的重点单位，由领导亲自指挥，集中火力，迅速打开局面，拿下5个大贪污犯的经验。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1952年2月13日给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劳动部并各省市劳动局的指示，对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示说，本部与各地劳动局在三反运动中初步暴露出来的事实，证明当前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的进攻，也是非常猖狂的。各地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运动中除尽量揭发一般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穷追老虎外，还要特别注意那些在处理劳资争议时接受资方贿赂、出卖工人利益的贪污分子。中央劳动部在清查工作结束后，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工作检查，并在此基础上来制订新的工作方针和1952年的工作计划。各地劳动行政机关也应如此。

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关于转发贸易部打虎情况 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将这个报告^[1]发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党组。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1] 指贸易部党组、机关党委1952年2月18日关于打虎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截至2月15日，贸易部已打大虎38个，其中由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半数以上。这说明贸易部和各总公司是资产阶级在经济情报上实行猖狂进攻的一个重点对象。由于这些单位掌握全国各种商品的商情、物价、贸易计划，又不直接经营业务，因此着重打击坐探，在这些单位就有着特殊重要性。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大批坐探。除坐探外，在收购与出售、基本建设方面也存在大批老虎。经分析，贸易部已打出的大老虎的最大来源是向社会招收的人员，其次是留用人员，此外还有一部分老干部。在老干部中，旧商人出身和过去长期经营机关生产的又占很大数量。据了解，全国各地国营贸易企业的人员成分，也大体是这样。要求中央通知各地，在这些方面严加注意。

中央转发南汉宸等关于三反以来 金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9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 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1]，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 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

[1] 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云1952年2月14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给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的报告。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是：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益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下列措施：一、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二、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20%，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1.2%左右。三、根据目前物价稳定、货币不断回笼的情况，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以活跃市场，扩大国营贸易阵地，用以扶持生产。四、在保持一定外汇库存情况下，应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五、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下一阶段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修改章则制度，拟主要建立预算监理和集中信贷制度。六、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

中央
二月十九日

对聂荣臻^[1]关于朝鲜前线敌大面积 空投带菌昆虫等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9日)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2]，并予处理。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指聂荣臻1952年2月18日给军委主席、副主席的报告中所述的朝鲜前方敌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等一事。报告说，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了解外，已将苍蝇等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确定带有何种病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的可能性为大，如化验证实，即须火速大力进行防疫灭疫工作。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 两个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20日)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17日关于分别处置贪污犯的计划的报告和关于五反斗争的经验及下一步工作部署的报告。前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更应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3‰，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10‰。后一报告说，工商界的五反斗争已进入最高潮，取得很大胜利，但有些大的严重违法的工商户，仍顽抗不交代。检查组经过总结经验，已开始采用以下四种方式进行检查：（一）调来检查。节约检查委员会把违法资本家叫来谈话，坦白了的即从宽处理。（二）兵临城下，劝其坦白。检查组到达后，给以充分考虑时间，只要讲了仍从宽处理。（三）经过上述方法仍拒不交代者，即进行全面检查，不查清不止。查出违法行为后，即从严惩处。（四）停战谈判，即在检查过程中，如发现被检查者已有动摇，即由较主要的负责人与之谈话，给以坦白和立功的机会。市委准备在2月底以前把90%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做法是：对既未坦白又未被检举的约1万户，召集他们开会，号召当场交代，签名具结，然后宣布免于追究，既不补税也不退财。在已坦白与被检举的4万工商户中，迅速处理3.5万户，分别予以补税、退财，但不罚款。这样可以使90%以上的工商户安心经营，突出地孤立嫌疑重大或问题严重、拒不坦白的工商户。在已逮捕的资本家中，交保释放一部分，使他们现身说法，检举别人，立功赎罪。

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北京市委二月十七日的两个报告。（二）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转发华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1952年2月20日)

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

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1]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17日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给分局、各省委、市委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北全区捉虎已超过原计划数目，运动的发展要求立即追加任务，订出新的打虎计划。为保证新计划的顺利实施，报告规定了下列5条：(1)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组织力量，学习战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捉虎战役。(2)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挤净材料，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迅速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3)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使生产尽可能少受影响。(4)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5)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5天至7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捉人封店问题 致华东局电

(1952年2月20日)

华东局：

你们二月十九日答复南京市委二月十五日报告的意见^[1]是正确的。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中央
二月二十日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19日在批复南京市委2月15日五反报告的电报中指出：南京五反运动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绩，主要由于在事前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宣传，坚持依靠工人、店员，团结中小户，分化和孤立违法资本家的原则，在执行政策上做到宽严分明，并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争取多数对我同情，这些都很好。但南京市委提出在运动中要摧毁的店户可能达到2%左右，逮捕的人数可能超过5‰，是不妥当的。南京应特别注意对违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工作，借以团结争取绝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关于华南分局打虎部署复叶剑英^[1]电

(1952年2月21日)

剑英同志，并告子恢^[2]同志：

二月十九日报告^[3]收到。打虎有进展，甚慰。你们的部署是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尤其财委和军区太小，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日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3] 指叶剑英1952年2月19日关于广州市打虎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邓子恢、中南局的报告。报告说，广州市五个单位共捉老虎1254只，其中大老虎219只。华南财委直属单位捉虎57只，华南军区直属单位捉虎196只。华南分局拟定的下一阶段的打虎部署是：（一）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二）仿北京2月1日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争取2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一次公审大会。（三）批判有些同志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账到算细账，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四）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办法来对付攻守同盟。（五）迅速成批地按中央指示解放中小贪污分子。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 不法工商户的报告批语

(1952年2月22日)

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一) 同意北京市委二月二十日报告^[1]。将这个报告发各同志参考。(二) 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如同对五十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除若干情节严重者外，算作占小便宜不算贪污一样，对整个三反五反斗争是有利的。(三) 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20日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给毛泽东、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对不法工商户采取发调查表，自填并具结，然后加以审查和处理的办法。对全市约有1万户的守法资本家，决定不补税，不退财，作出无事的结论；对全市约有3.5万户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工商户，宣布只退、只补、不罚。准备月底前将上述两类工商户的问题基本处理完，以便彻底孤立问题较大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和完全违法的4000多工商户，并从容地加以处理。

讨论通过。对有些有小问题的算作守法户，对半违法的采取只退不罚政策，一定要向工人店员先说清楚，使他们懂得这样处理的必要性。（四）在一个城市中公开向资本家和工人店员说明本市守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一万四千户），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三万多户），其他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二千多户），必须在五反斗争正式开展约一个月左右，在工人店员群众斗争已经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已经明确划清，工会组织已经整理，资本家在工会中的走狗已经驱逐出去的时候，必须在这种时候才能开始公开宣布几类资本家的大概数目字，并实行分批处理，使资本家摸到我们的底。到了这种时候，也必须这样宣布，使资本家摸底，并迅速处理，否则不利。目前，北京、天津、济南、南京、重庆已经可以和应当这样做了，并须在本月底及三月上旬对这两类资本家基本上处理完毕。沈阳和武汉大概可在三月上旬做，中旬处理完毕。不可再迟。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五）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因此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转发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批语

(1952年2月22日)

谭政^[1]同志，并告各大军区：

二月二十日报告^[2]收到。(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谭政1952年2月20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南军区拟将打虎延至3月15日。争取在3月5日至10日前，地方军完成分区一级、野战军完成师团两级打虎计划。华南、各省军区、各军一级，则争取在3月15日前完成，如不可能则酌量延长。3月5日或10日后，地方军转入整县大队及独立团，依次转入连队。野战军则在完成军师团三级机关打虎任务后，转入营连两级。

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1]去上海 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

(1952年2月22日)

华东局：

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2]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彭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5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华东局，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 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2日)

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一) 同意华东军区党委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的报告^[1]。(二) 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仿照办理。(三) 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1日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报告说，华东部队打虎运动从1952年2月1日开始，经过发动打虎和限期坦白两个战役，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尚未最后完成任务，因此拟发动第三个战役，普遍搜山搜洞，以打大老虎为重点，捉尽所有老虎。为此要求：(一) 已完成或超过原定任务的单位，应防止与克服收兵思想，继续打虎。一是把已打出的老虎来一次清查，将打伤了的和围住了的打死，将真假莫辨的审核清楚；二是根据“打尽老虎，肃清贪污”及在三反结束时向上级具结保证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追加预算，注意消灭空白与死角。(二) 未完成原定任务的单位，应争取迅速完成任务，然后再按上条所述执行。(三) 打虎战术一般应以专案专办为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发动检举立功，运用坦白彻底的大贪污分子现身说法等。(四) 总结限期坦白阶段的经验，教育打虎队员和群众，调整力量，制订新的作战计划，做好新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五) 除少数空白和死角单位外，一般应停止再挤，个别漏网者，可在普遍搜山中顺带解决。

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 的批语

(1952年2月23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

(一) 同意二月十九日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1]。(二) 将这个报告发各中央局参考。(三) 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四) 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五) 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2月19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南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决定恢复国营企业的工作能力，在不误三反和五反的前提下，中南区和省两级目前抽出1/5力量，3月初逐渐增加到1/4的力量办理业务。县区三反坚决推迟，下层经济网保持继续活动。收购土产要大胆投放，加工订货应尽力恢复。对资本家要加紧五反并注意打击他们消极怠工和对店员的进攻。同时为了保持经济生活的正常状态，减少失业，保证城乡交流，五反斗争应完全按照中央指示的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的方针进行。为了准确地执行五反政策，要妥善解决三反、五反的配合作战问题，避免发生各机关自行派检查组到商店查账、把资本家拉到机关来斗等混乱现象。

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目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上海市应抓紧完成三反打虎任务 开展五反斗争的电报

(1952年2月23日)

陈毅、谭震林二同志，上海市委各同志：

市委二月二十一日报告^[1]收到。你们二月二十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九时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2月21日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给毛泽东并报华东局的检讨报告。报告说，上海打虎仅完成预定任务的26%，较各地落后，已严重影响到全国的五反运动。这主要是由于市委对这次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思想老虎未能及时肃清，以致贯彻不力，陷入战线太长、分兵把口的被动状态。2月20日全市召开了2000多人的打虎干部会议，由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上海打虎现状，指出努力方向，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处理，逮捕法办了数人，教育意义很大。为了加强上海的工作，华东局还决定调一批省市领导干部到上海市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

关于同意罗瑞卿^[1]对三反中暴露的 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意见的电报

(1952年2月23日)

罗瑞卿同志：

二月十九日电收到。同意你对付反革命分子的意见^[2]。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2] 罗瑞卿1952年2月19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对付三反中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的意见是：为了集中搞经济老虎，一般应采取先经济后政治的办法。对于破坏三反的反革命分子，则必须坚决采取措施，以扫除打虎障碍。

中央关于县区乡三级 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

(1952年2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 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作，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二) 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三) 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营口、石家庄、新乡、苏州、宁波、宜昌、衡州、江门、梧州、宝鸡、汉中、自流井、遵义等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1]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中央
二月二十四日

[1] 指195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

关于检查和报告西安市五反斗争 实际情况致习仲勋^[1]电

(1952年2月24日)

习仲勋同志：

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2]给西北局宣传部，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3]电告为盼。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23日关于西安《群众日报》发生右倾错误给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对《群众日报》2月5日刊载的西安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道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五反运动宣传提纲，2月7日刊载的西安市工商联五反运动扩大会议的报道和社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上述报道和言论违背了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主张

五反运动不是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主张这场斗争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张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主张进行这一斗争的方针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

[3] 按照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的要求，习仲勋于1952年2月28日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习仲勋说：中央宣传部2月23日“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这种批评很必要”；“群众日报2月5日和7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他们把某些策略片面地了解，拿去宣传，也就把五反斗争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方针说走了样。其看法、说法，实质都是带有右的倾向，必须指正”。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奸商 借公私合营损公肥私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5日)

请各地注意处理同类情况^[1]。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24日通报中所说的上海市公私合营工厂中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情况。通报说，在三反中发现上海的10个公私合营厂实际上已变成“合公营私”厂。它们完全丧失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成了资本家损公肥私的基地。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同时打垮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方面的进攻，将工厂中的领导权巩固地掌握过来。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向志愿军出售伪劣医药用品，被判处死刑。

对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示

(1952年2月25日)

周总理：

(一) 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 请将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转发中直党委关于 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6日)

此件^[1]很好，发各同志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六日

[1] 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1952年2月25日关于打虎工作给总党委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前一段打虎的情况和做法，对今后的打虎方法，特别强调算细账和调查材料。指出前一时期不肯投降的老虎，一般都比较难打，需有更多的材料和证据，才能迫他缴械；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与中小贪污分子要分出力量来甄别材料，并进行追赃工作。

关于加强对陈嘉庚^[1]保卫工作的批语^[2]

(1952年2月26日)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

[1] 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

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 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2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地委：

(一) 兹将罗瑞卿^[1]同志关于长沙市五反经验的报告^[2]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长沙市在五反中的策略是正确的，其经验可在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仿行。(二) 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罗瑞卿1952年2月24日关于长沙市五反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长沙市五反总的打击面大体上在3%到4%，不超过4%。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在五反斗争的策略上，其打击面稍低于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似乎是适当的。

局、省市区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应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例如河北省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仿照上述步骤规定一个对于大城市和所有中等城市（普通县城算作小城市，不在此内）开展五反的明确计划，给以具体指导，以免混乱。（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复高岗电

(1952年2月27日)

高岗同志：

二月廿六日的电报^[1]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2]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3]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三月中旬或下旬中央可能召开一次会议，那时你再来京，目前不要来。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1] 指高岗1952年2月26日关于凯丰向毛泽东反映对三反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的意见的经过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转述了凯丰对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要求向毛泽东反映，并说他有意见向主席提出，这是应该的。

[2] 凯丰，即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

[3]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19日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

对宣传第一批女飞行员问题的 报告的批语^[1]

(1952年2月27日)

请周^[2]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肖华办理。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2年2月27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肖华在报告中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的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3月8日以3至6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3月8日，在首都某机场举行了庆祝第一批女飞行员“三八”起飞典礼，12时15分飞机从机场起飞，13时10分飞临天安门上空，与首都人民见面。

[2] 周，指周恩来。



1952年2月，毛泽东等接见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2年2月，毛泽东等和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合影。



1952年2月，毛泽东等和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合影。

对新乡地委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7日)

此件^[1]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26日关于新乡地委捉大老虎的重要经验的通报。通报说，新乡地委捉大老虎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使‘大老虎’作全面交代并实行对证。在交代贪污数目之外，应把何事、何时、何法与何人，以及贪污后之出路与用途（这是‘大老虎’最怕的）交代清楚，并随时予以对证，这样才能甄别真伪，打击翻案，进一步逼其就范；同时也才能进一步发现线索，找出漏洞，扩大战果；并为处理作好准备。”

中央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 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批语

(1952年2月28日)

西南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

西南军区党委二月二十六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和部署^[1]是正确的，发给各大军区仿行。志愿军可依自己情况酌量采行。

中央

二月二十八日

[1] 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6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报告中说，2月底3月初打虎高潮势必下降，但少数老虎特别是死角与重点单位的老虎，还不可能完全打出来，因此必须贯彻把一切实有老虎都捉干净的方针，争取在3月10日前基本完成打虎任务，25日前完成处理与教育工作。各军区部队对所辖组织应该摸清底细，切实掌握转入处理阶段的时机。对若干重点单位与重点对象尤应组织专门力量包干到底，不受时间限制。处理阶段的工作要求是：（一）根据中央有关指示迅速处理一千元以下的一般中小贪污分子，并从中继续发现大贪污分子，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做好对大贪污分子的核实、追赃及登记档案材料等定案工作，待中央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后，即行判处。（二）处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教育应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内容。（三）普遍自下而上地订立个人与单位的1952年节约计划与必要可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民主制度。（四）适时地酌量抽出一些力量，主持某些主要的业务部门的急切工作，尤其是整编工作。

对薄一波^[1]关于上海三反五反 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29日)

薄一波同志：

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一时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对陈毅^[1]关于华东军区打虎 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29日)

陈毅同志：

二月廿五日的电报^[2]收到。(一)因为你们打虎进展较速，你们的打虎突击可以在三月十日基本结束，转入打虎的正常轨道上去。但正式宣布须按具体情况，有些（可能是多数）转入正常，有些仍须突击。(二)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2年2月25日关于华东部队打虎情况及下阶段工作部署给毛泽东并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除少数单位未搞外，全军打虎工作已普遍发动起来，但发展极不平衡，决定再组织一次扫荡追搜，并在少数未搞的部门开展三反打虎，把运动进行到3月5日至10日作基本结束。这一阶段的工作部署是：第一，继续打一批老虎，不去追求数字，但要打可能漏网的老虎。第二，清理已有老虎，辨别真伪轻重。第三，划分和清理中小贪污犯，对挪用公款五十万元以下的一律列入教育范围，不作贪污犯办；贪污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之间的，应酌予行政处分；贪污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之间的，应考虑较重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第四，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的“左”的倾向，对被处分人员开始进行研究和清理。第五，连队三反着重教育，互相批评，只对最坏的采用“搬石头”的办法。第六，中央关于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后，即进行一次大的三反教育，此后即部署配合地方五反。

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三）军队不要举行公审。（四）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五）最近西南军区党委有一个方针和部署的计划^[1]，今日已发你处，请加参考然后确定你们的部署。（六）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6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报告。

对李富春^[1]关于起草追赃问题文件的来信的批语

(1952年2月29日)

周总理：

此件^[2]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3]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九日

[1]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起草的关于追赃问题的文件初稿。他在1952年2月27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个文件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3]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对东北贸易部围剿大贪污分子 大会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9日)

此项经验^[1]很好，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

[1] 指东北贸易部1952年2月21日召开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的经验。其主要之点是：第一，要根据材料掌握的情况与打虎队训练、组织的情况（每个打虎队都要配备坚强的能掌握政策的领导骨干），组织打虎高潮。第二，要掌握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强压力。掌握材料是围剿大会最实际的准备工作，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内外夹攻是掌握材料的好办法。如果事先没有搜集一定的材料，贸然召开这样的围剿大会，就很容易发生逼供情形。第三，发动与组织群众斗智斗威，压力与开导兼施，以促进其内心矛盾。充分发扬群众威力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二。第四，要事先在积极分子中规定纪律，说明打人与变相打人都错误的，要严格禁止。这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三。第五，对材料确凿的进攻对象要穷追务获，但一经突开，就应适时做巩固工作，立据对证、追赃，这样可以防止翻供，从巩固中再扩大战果。

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各同志：

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1]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捣〈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

三月一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2月29日对川西区党委关于五反中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的批示。批示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好计算，掌握不紧就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乱，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事实上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所以，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 三反报道中发生错误的检讨上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各中央局：

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1]，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1952年1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华东局宣传部指出，《福建日报》对三反斗争的宣传一般已引起重视，但集中火力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地组织材料揭露其罪恶行为则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没有转载过《解放日报》的三反社论。二、外地消息多，本地消息少，空话多，事实少，报纸不揭露重大典型事实。三、对资产阶级的罪恶揭露不够，在对贪污分子的报道中，没有同时揭发资产阶级如何行贿、勾引和腐蚀他们的事实。对上述情况，必须迅即予以检查纠正。福建省委宣传部的检讨报告说，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在三反宣传上所犯错误的批评完全正确。《福建日报》发生这种错误，是因为省委宣传部和报社对三反的报道工作在一开始采取了很不认真、很不严肃的态度，我们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存在着麻痹思想和右倾思想。经过检讨，对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三反的报道宣传，作出部署：省委宣传部加强对三反报道工作的领导，报社对前一段的三反报道进行检查，调整和加强报道力量，最近一个时期集中力量报道省和福州市级机关的反贪污斗争和福州市的五反运动。

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毛泽东
三月一日

对李富春^[1]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规定 和追赃规定的报告^[2]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请周^[3]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毛泽东
三月一日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1952年3月1日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给毛泽东的报告。

[3] 周，指周恩来。

转发薄一波^[1]关于华东三反五反 情况及部署的报告 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华东部署^[2]很好，各区均可仿行。

毛泽东

三月一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华东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2月28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中所述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即：（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3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4、5、6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加写了以下文字：“请各区照此办理。——毛注”）（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1/3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日)

—

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1]同志：

兹将上海市委三月一日报告^[2]发给你们参考。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华东局的报告。报告针对3个打虎战役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今后打虎的几条办法：(1)在战术上强调攻心斗智为主，群众压力为辅。(2)加强使用俘虏工作，进一步发挥“以虎攻虎”的作用，加强对大贪污嫌疑犯的家属工作，特别要使用外部检举材料，以收内外夹攻之效。(3)暂不要作攻坚战，对某些大案采取专案专办，主力则应抛开他们前进，以迅速扩大战果。(4)组织打虎典型经验的报告。(5)做好追赃、退赃工作。(6)许多与五反关系不大而我们主观力量很弱的部门，暂停三反，待以后力量顾得上并做好若干思想准备时再搞。报告还提出，一面贯彻三反，一面必须维持经济。

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

毛泽东
三月二日

二

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毛注^[1]

[1] 毛泽东的这个批注写在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华东局的报告中一段话的后面，这段话是：“组成市和区两级的五反准备委员会，整理和分析现有材料，并对全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

中央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 公审办法的指示

(1952年3月2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

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1]，各大区可以仿行。

中央
三月二日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日给中央并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拟于3月10日以前召开一次包括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南军区4个系统公审大贪污分子大会，打算对7至9名大贪污分子分别给以死刑、死刑缓刑、徒刑、徒刑缓刑、释放等处理，借以推动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打虎运动。

转发刘澜涛^[1]关于华北破获两起大案的 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

刘澜涛同志报告两件^[2]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注意同类性质的巨大案件。这类巨案，可能各省都有，大城市尤多。

毛泽东

三月二日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刘澜涛1952年3月2日关于华北三反、五反情况给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前一个报告说到河北省合作总社最近破获了一起集体贪污约达200亿元的巨案。该案以经营处长为首，串通会计科长、总会计师并勾结各地货栈和供销小组，以出货不上账的办法，将整车皮白布、粮食运出卖掉后进行集体贪污。后一个报告说到察哈尔省花纱布分公司突破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内奸网及操纵这一内奸网的核心组织——“昌记号”的巨案。“昌记号”是为掩护敌产和做投机买卖于1950年组成的黑字号，先后将23名旧人员派进国营企业当坐探，建立情报小组，控制了六大公司的物价股长，通过盗窃经济情报，骗取银行贷款，买空卖空，贩卖毒品、金银等，至1951年底获暴利达78亿元。

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3日)

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兵团军师党委，并告各中央局：

兹将华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报告^[1]一件发给你你〈们〉参考，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中央军委

三月三日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2日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华北军区捉虎正处在高潮，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极不平衡。开展较迟和老虎多的单位，尚须全力捉虎，已分别追加任务；已基本搞透或接近搞透的单位，领导的主要力量应即转入或逐步转入善后处理和建设阶段。报告对后一阶段中贪污分子的甄别处理、追退赃款、民主补课、厘定制度公约、清交家务、总结巩固政治思想成果等，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意见。提出在民主补课中，排以上干部除做好书面反省报告外，并要交代清楚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关系。

中央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 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

(1952年3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 兹将罗瑞卿^[1]同志关于长沙市公安局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发给你们及所属公安司法机关。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有期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

(二) 王丕敏^[2]应予枪决，公开宣布罪状，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三) 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

(四) 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王丕敏，原长沙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4月，作为长沙市公安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主要责任者被处决。

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中央
三月四日

关于中央各部在三反中应指导下级的 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内务部的文件^[1]，可为各部参考。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1952年3月4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部长，内蒙民政部部长，各省市、行署民政厅、局长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内务部和所属机关打虎的形势，对各级民政部门的打虎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规定了打虎报告制度。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内务部这个文件上。

关于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 复高岗^[1]电

(1952年3月4日)

高岗同志：

二月二十八日电^[2]悉。拟俟陈云^[3]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指高岗1952年2月28日关于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致电感谢斯大林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

[3]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新疆党政军机关三反斗争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刘、周^[1]阅后，转王震^[2]阅。

此报告中(二)条^[3](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3] 王震1952年3月1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的报告说，在新疆省级机关和军队中，三反已接近基本上解决问题的阶段。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二、六两军，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报告第二条是对二十二兵团三反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关于谭震林、陈丕显^[1]任职问题的 批语^[2]和电报

(1952年3月4日、9日)

—

刘、朱、周阅，交粟裕^[3]办。

同意陈毅^[4]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5]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谭震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粟裕1952年3月4日下午给毛泽东转报陈毅当日上午长途电话内容的报告上。

[3]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4]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5]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二

陈毅同志，并华东局，上海市委：

三月六日电报^[1]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2]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中央
三月九日

[1] 指陈毅1952年3月6日关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电报。电报说：“经华东局各同志商谈和薄一波同志参加意见，共同建议在饶漱石同志离职休养期间，以谭震林同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以陈丕显同志代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我仍留上海参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工作并兼管华东军区工作。以上请批准。”

[2] 刘晓，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对林业部关于一九五一年 全国森林火灾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应给吉林（松江）、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指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1952年2月22日关于1951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给陈云并转周恩来的报告。报告中说，1951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4270次，森林被害面积达3450万亩，损失木材677万立方米。森林被害面积相当于同期内造林面积的12倍。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99%以上。森林火灾绝大部分是由于群众烧荒引起，最主要的根源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孤立地强调春耕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怕布置防火工作妨碍了春耕，怕不准群众烧荒完不成丰产任务，因而忽视了护林防火工作。

在肖华^[1]关于军委直属部队 开展打虎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各同志：

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2]很好，各部可以仿行。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肖华1952年3月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的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的经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并防止偏差，以保证运动的正常发展，军委直属总党委于3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以下事项：一、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3月15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彻底肃清残虎，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二、向所有打虎队详细交代打虎政策，尤其对老干部中的贪污分子，必须靠党的政策去征服他们。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我们还规定了两条打虎纪律：1. 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2. 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三、对已经打出来的老虎，要进行复查定案、追缴赃物。

转发华东军区对营连及县区武装 三反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此件^[1]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指华东军区1952年3月2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对全体人员应反复讲清道理，交代政策。在具体政策上，揭发应该彻底，处理应该从宽，应掌握“战士宽于干部”“连队宽于机关”的原则，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以利教育。指示还对3种不同情况的部队规定了3种不同的做法。提出了运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三反应服从当前海防、作战任务，不应影响部队的纪律，严防自杀、自伤、逃亡以及反革命分子的乘机破坏活动，切实执行政策，防止逼供信等。

关于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等的批语^[1]

(1952年3月4日)

周总理：

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沈阳3日讯资料（十五）《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上。这份资料说：3月2日下午5时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70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驰赴现场采集标本。据调查该地有大批苍蝇、蜘蛛、跳蚤，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黑色小虫，分布成集团状。据该部防疫处负责人称：美军在朝鲜撒布细菌用炸弹和纸袋两种方法，在抚顺发现的苍蝇、蜘蛛等可能是使用后一种方法撒布的。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30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市五反 准备工作报告^[2]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

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3月3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市的三反估计可以如期完成，五反准备工作近两天与市委同志作了初步研究，作出如下部署：（一）上海共有工商业16.3万户。守法户占总户数的35%，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户数的60%，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占总户数的5%。（二）上海上层资本家包括同业公会的主委、区工商联主任以上的人员在内，共有500余人，根据具体情况，已分成应予保护的、一般保护的和坚决打击的三大类，正在征求各方意见。（三）五反内容必须明确规定。一些人对五反概念还比较混乱，有的是单纯地反暴利，有的是反逃汇套汇、反隐瞒敌产，而且反的年代很远，有的则是一切都反。（四）关于材料准备。已组织专人整理群众检举和资本家坦白的材料。（五）组织五反工作队或战斗小组，对他们加以训练，作为五反开始时的骨干。（六）五反运动的领导拟定以区为单位，加强区委的领导作用。市委集中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掌握政策，统一步调等。（七）在五反开始前准备出几个大案件的成熟材料，待五反中拿出来，为这场斗争全胜铺好道路。（八）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

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作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

毛泽东
三月五日

二

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毛注^[1]

三

不应当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毛注^[2]

[1] 薄一波在上述报告中说，上海按与国家经济部门来往的多少和金额的大小，对国计民生利害关系的大小，及在资产阶级中间影响的好坏，对全市资本家加以排队，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4类。在这后面毛泽东写了这条批注。

[2]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说的一些人对五反的概念还相当混乱，“有的是单纯地反暴利”之后。

四

此两项应当反，可以归入反盗窃国家资财一类。——毛注^[1]

五

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不同，必须以区为五反的单位，市则统一领导各区。——毛注^[2]

六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毛注^[3]

[1]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谈到一些人对五反概念的理解时说的“有的是反逃汇套汇、反隐瞒敌产”之后。

[2]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谈到五反运动领导问题时的以下一段话之后：“上海地区太大，人口六百万，有二十一个区委，完全集中到市委，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3]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说的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这句话之后。

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1]

(1952年3月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加直发山东、青岛、南京、华南、云南、新疆：

(一) 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中除第七第八两条由党内掌握不得发表外，其余各条将由政务院通过发表。各地党委所订处理标准和办法与此有出入者，照此修改之。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须作若干改变者，应报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

[1] 这个指示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删去了其中的第五部分，其余部分也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

[2] 指中共北京市委《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个文件共有9条，中央批转时，毛泽东在第九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于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了以下一段话：“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 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 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北京有摊贩四万户，将来要给以处理，但在此次五反中还来不及处理。各大城市也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北京天津两市正在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给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北京约占五万工商户中的百分之三十八，计一万九千户左右。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有的竟达一两个亿。有些家庭商店人手多，不雇店员，比雇上二三个店员的小资本家贸易额大得多，因此偷漏税也多些。北京的资产阶级有三万一千户，其中雇佣工人、店员三人以下的有一万七千五百户，占百分之三十五。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

以的。

(四) 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即约五千户。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即约三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约一万二千五百户。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即约二千户。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即约五百户。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一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二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一百万元的数目，补其一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 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一万三千多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即超过四分之一。其中，行贿一亿元以上者一百六十九户，五千万元至一亿元者一百七十二户，三千万元至五千万元者一百九十五户，一千万元至三千万元者六百四十二户，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三千一百六十一户，一百万元以下者八千七百四十八户。中央原定补退罚者限于百分之四左右，补退罚捉者限于百分之点五左右，补退罚关者（包括杀几个在内）亦限于百分之点五左右，三项共计约百分之五（中等城市则小于这个比例，有的只占百分之三，有的还少些）。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北京拟于实行处理时

将行贿一百万元以下的八千七百多户免于罚款，而于通知书上载明行贿错误，给以警告处分。此点亦请你们注意。

（六）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七）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一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中央
三月五日

对二十二兵团清算贪污的 时间界限的批语^[1]

(1952年3月5日)

周^[2]：

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3]，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

毛泽东

三月五日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2日关于对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给张邦英、张希钦并报中央军委、西北局的电报上。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

[2] 周，指周恩来。

[3]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王震，在1952年3月1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说，对二十二兵团清查贪污的时间界限，在三反运动开始时，他曾提出“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转发新华社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 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1]，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五日

[1] 新华社驻南京记者1952年2月25日写的这篇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内部通讯，刊登在1952年第44号《内部参考》上。通讯说，最近南京市将粮油、营造、五金、水电等行业的账房、监工、工程师等高级职员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学习，效果很好。不少高级职员在经过集中学习之后，解除了思想顾虑，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检举了盗骗国家财产的案情巨大的事件。他们组织学习的经验主要是：领导思想上应当贯彻以团结教育为主的方针，着重消除他们因曾被奸商拖下水而害怕处分的思想顾虑，不能采取施加压力的方针和粗暴的做法。学习成员中要配备1/3在五反运动中表现较好、群众中有威信的高级职员和部分普通工人，对他们认真进行政策教育，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转发中央政法干校三反斗争 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毛泽东
三月五日

[1] 指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1952年3月3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给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并报总党委的报告。报告说，中央政法干校的三反运动是当作一个重要政治学习来进行的。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县级政法部门的负责干部。从现有的不太完整的材料看，县级政法干部的贪污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其中有盗窃国家财物的各种贪污问题，而突出的则是贪赃卖法，敲诈勒索，盗卖枪支，卖放反革命罪犯，贩卖烟土、白面、金银等。在运动开始时，我们强调思想自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划分敌我界限，但对敌情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春节后着重克服右倾观点，并从组织上整顿，同时加强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三阶段的战役。

对聂荣臻、粟裕^[1]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 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毛泽东
三月五日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1]

(1952年3月5日)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1] 这是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提出的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5条基本原则。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 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 所写的批语和通知

(1952年3月6日)

—

刘、朱、陈、周、彭真^[1]阅。

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

二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兵团及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一件发给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你们，地方可发至县委，军队可发至师委，望一体遵办。

中央
三月六日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 纪凯夫案件^[1]精神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1952年3月6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

(一)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二月二十七日给中南局的报告^[2]和中南局三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答复^[3]，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
(二) 应将这两个文件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三月六日

[1] 1951年4月12日，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款案。当时任医务科兼院长室文书的纪凯夫被诬为盗款人，先后两次被公安局逮捕。同年11月经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行调查，弄清盗案真相，否定了纪凯夫的诬陷。根据查清的事实，中南军政委员会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和借端报复、阴谋陷害纪凯夫等的几名干部作了严肃的处理。

[2] 中共湖北省委1952年2月27日给中南局的报告说，在报纸公布处理纪凯夫问题一案后，群情极为振奋，党内党外民主空气大为发扬，正气得到伸张。但在反贪污斗争和镇反斗争中，发现某些贪污分子和特务嫌疑分子

趁机反攻，而某些领导干部由于怕犯错误，束手束脚，不敢大胆进行工作。为了进一步正确地贯彻中南局处理纪凯夫案件的精神，必须向广大干部进行教育，明确地把持宗派成见、蓄意陷害的错误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 error 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 error 区别开来，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戒不改的与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均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教育提高。对群众的反映和控告，各级领导机关均应认真重视，深入检查了解，根据实际情况按上述原则认真处理，决不可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态度和宗派成见从事，违者均应视其情节轻重受到应得的处分。对其中确是别有用心，乘机反攻，破坏抵抗运动者，应查明实情，公开揭发批判，教育群众，以利运动的开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不敢违法乱纪，同时又敢于大胆负责，坚持原则，不致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3]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3日在答复中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及其所提处理原则，指出报告中所说的一些干部不敢大胆工作的现象，是对处理纪凯夫一案了解不正确的表现。各省如发生类似湖北省委所述的现象，望即按湖北省委报告所提原则及时处理，尤其在目前打虎斗争中，必须坚决克服借口此案讹诈打虎队的现象，坚决克服右倾分子淆乱是非的企图。当然，逼供信是需同样予以坚决克服的。

对华东局第八号打虎战报的批语

(1952年3月6日)

希望各中央局亦发这样一个带部署性的指示^[1]。

毛泽东
三月六日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5日关于华东全区的第八号打虎战报。战报指出：一、估计到3月15日或20日前后，地委以上机关均可基本结束打虎阶段，转入三反的第四阶段，即普遍交代个人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结合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检查官僚主义，某些领导干部回炉补课；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打乱了的组织，重新审查和制订各项制度，及时恢复和建立经常工作。为此，各地党委应立即指定专人进行组织整理的准备工作。二、各地打出的大老虎，除安徽外，均已在老虎总数1/10以上。安徽是否由于许多老虎尚未打透，请省委注意检查。其他地区也必须注意把一切打出的老虎打死、打透。三、最近各地反映老虎翻供的很多，请各地参照毛主席2月27日批转的新乡地委捉虎经验，对现有打虎战果的准确性加以严格检查，实事求是地甄别真假，以巩固战果，扩大胜利，并为处理做好准备。

在中央给邓小平^[1]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7日)

(二) 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告』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2]。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邓小平1952年2月22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电报中提出，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借此兴风作浪。这些情况如不迅速设法解决，将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五反的深入。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过去，许多事情都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以后他们中将有一大批不能继续再用，而暂时又无人接替工作；同时五反结果，有些被没收或被赔罚的私人工商业必须派人接管。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 致叶剑英^[1]电

(1952年3月7日)

剑英同志，并告子恢^[2]同志：

三月三日报告^[3]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毛泽东

三月七日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3] 指叶剑英1952年3月3日关于广州市委系统、广东省政府直属机关、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直属单位和华南分局直属机关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邓子恢并中南局的报告。

在中央关于三反中处理 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7日)

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1]

[1]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如何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方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括号写了这句话。

对武陟等县关于追赃的 几项政策规定的批语

(1952年3月9日)

此件^[1]很好，请各级党委一律照办。

毛泽东
三月九日

[1] 指中共平原省委1952年3月4日关于武陟等县正确贯彻政策追交赃物赃款给各地委、市委、县委并报华北局的通报。通报介绍的武陟等县关于追退赃物赃款的几项政策规定是：“现存赃款、赃物，立即交出；不便于立即交出者（如投资尚未结账等），可先交证件；原物已消耗者可登记，开清单，确实挥霍掉者，本人申请，群众评议，听候领导处理。追赃中不准损伤他人（如亲属）财产，更不准封门，停业，不准逼供等。”

在聂荣臻关于国内防疫 工作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3月9日)

退聂办。

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

毛泽东
三月九日

[1] 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3月7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最近敌人扩大细菌战的情况，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了国内的防疫工作，认为以下四件事需早作决定：一、东北变成防疫区后，华北特别是京津已成监视区，加以现在的季节正是惊蛰之后，防疫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因此，中央防疫委员会急需成立，以便适时地决定问题。此事最好请周恩来总理主持。二、京津应迅速进行防疫注射，并厉行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三、铁路交通的防疫工作最为重要，应在总的防疫委员会之下成立铁路防疫委员会。四、积极筹备疫苗药品。

对钟赤兵^[1]关于民航机构设置 和领导关系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3月11日)

周总理：

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2]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1] 钟赤兵，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局长。

[2] 指钟赤兵1952年3月10日关于民航局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是：（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不适合的转业建设，多余飞机交空军，工厂设备交重工业部，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中央对西北局关于开展五反的步骤和策略报告的复电

(1952年3月11日)

西北局：

三月六日电^[1]悉。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中央

三月十一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2年3月6日关于西北各城市开展五反步骤和西安五反策略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西北各城市分三步开展五反，第一步先搞西安、兰州、银川等8个城市；第二步为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各地委所在城市；第三步为各县县城。西安市的五反，已重新部署。确定3月10日前先集中在几个问题大的行业，每个行业又先集中突破几户，攻下一批再攻一批，逐渐扩展。同时分批处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预定10日前作完结论。到15日前，把约占工商户55%的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2/3，并弄清一部分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15日以后集中力量总攻后两部分。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西北局的这份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参考。



1952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

给程潜^[1]的信

(1952年3月11日)

颂云先生：

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2]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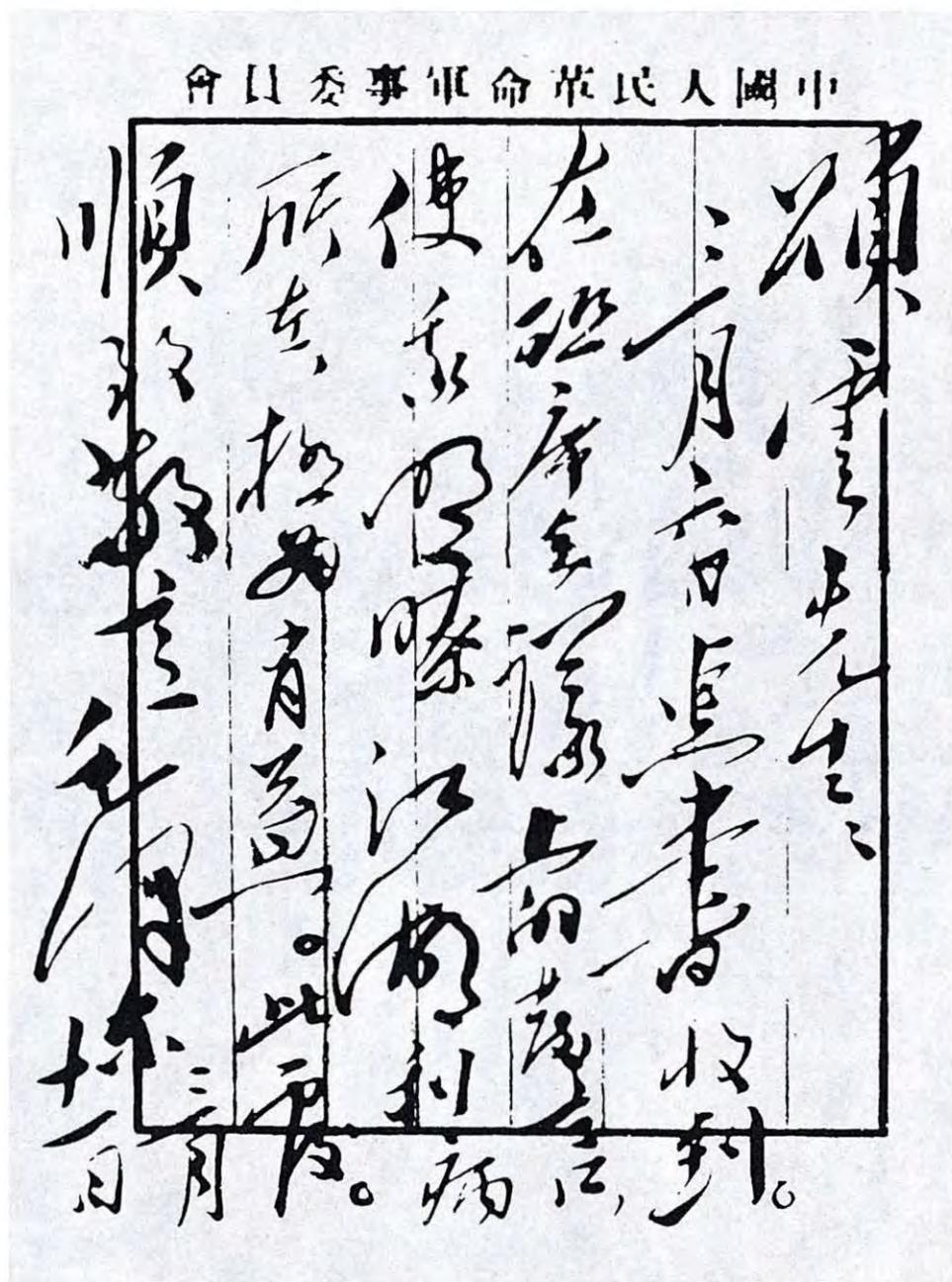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1] 程潜，字颂云，原国民党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中南军政委员会1952年3月召集的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



毛泽东致程潜信的手稿。



1952年，毛泽东和程潜在中南海。

给周世钊^[1]的信

(1952年3月11日)

悼元兄：

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2]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1] 周世钊，字悼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 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

(1952年3月11日)

菲利波夫同志：

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侵入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敌机每次侵入都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我国空军喷气式驱逐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在复杂气候条件下以及在夜晚作战斗飞行，而罗波夫将军所指挥的两个苏联空军师，则担负着在北朝鲜上空与敌空战，掩护北朝鲜交通和协助中国空军部队作战之任务，因而不能兼顾到防卫敌机侵入。

对于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散布细菌之敌机，如果不给予应有的打击，则可能更加猖狂起来。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个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可否，请予考虑示复^[1]。

并致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1] 斯大林 1952年3月12日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师进驻中国沈阳地区。

对薄一波^[1]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 和五反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13日)

请周^[2]研究。

此件^[3]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4]。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周，指周恩来。

[3] 指薄一波1952年3月10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16.3万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工商户总数的15.3%；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36.8%，每户行贿、偷税漏税等在1000万元以下者均划入；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¹，占总数的44.2%，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每户偷税或盗窃等平均在1500万元左右；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2.8%；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0.9%。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队材料和具体

对象，做到心中有数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为迅速地逐步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报告对五反的内容、界线、清算的时间等作了规定，并提出为了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拟抓的几件事情。中央在1952年3月16日转发了薄一波的这一报告。

[4] 周恩来1952年3月15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转发五台县委关于 发动退赃运动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13日)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1] 指中共山西五台县委1952年3月3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给中央、华北局、省委、地委的报告。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的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有的甚至公开抵抗退赃。这说明贪污分子的退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以更加果断的态度对待他们。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经验，报告概括了以下几点：1. 必须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解决贪污分子不肯退赃的思想。2. 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家属工作，团结中小贪污分子，向顽抗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3. 反复交代政策，并通过典型示范体现政策。4. 利用贪污分子去揭露贪污分子的秘密（不肯退出的赃款赃物）的方法。

中央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 致上海市委电

(1952年3月16日)

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1]同志：

三月十四日报告^[2]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3]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4]移一部分到第二类^[5]，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中央

三月十六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4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与五反部署给毛泽东、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打虎任务已基本上完成，决定基本结束突击打虎工作，把主要力量转入五反。待五反结束后，利用五反中间所得来的材料，内外结合地再来一次彻底肃清老虎的工作。目前正集中一切力量为五反第一战役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3] 指薄一波1952年3月10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4] 指半守法半违法户。

[5] 指基本守法户。

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上报的 防疫工作资料的批语

(1952年3月16日)

周总理阅后，送聂、粟^[1]：

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2]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1952年3月15日报送新华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中说，志愿军各部已普遍成立防疫组织，军、师、团为防疫委员会，营、连为防疫小组。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和卫生建设周，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等。各部皆组织捕虫队，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

关于要新华社向各地通报五反的好经验给杨尚昆^[1]的信

(1952年3月16日)

尚昆同志：

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17日)

周总理：

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1]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1952年3月15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1952年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以河北、平原两省最为严重，主要是流行性感
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各级人民政府及时掌握疫情，组织力量防治，经过努力，大部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各地疫病仍未彻底根除，因此，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应继续组织力量，完全消灭现有疫病；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动，进行全面预防工作，以保证人民健康和春耕抗旱工作的顺利开展。

军委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3月17日)

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兹将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仿行。

中央军委
三月十七日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15日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给所属各部队党委的指示。指示说：华东部队的三反运动，除少数单位外，一般的将在3月末基本上结束，4月初即须转入以整编、转业为中心任务。为了便利党委对全盘工作的掌握，并加强对三反运动善后处理工作的领导，巩固与发扬三反运动的成果，必须健全各团（及相当于团）以上党委领导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已建立的，必须加以调整；未建立的，必须立即建立。

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3月18日)

大使先生：

我异常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两年多来贵我两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经常关心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并衷心为这些成就感到喜悦。我深信：贵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但将有利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和友谊的增强，且将有助于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

我热烈欢迎阁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阁下在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工作中，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权五稷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3月18日)

大使先生：

我异常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代表朝鲜人民，向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好意。

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我热烈欢迎阁下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阁下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工作中，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 土改、经济等问题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20日)

西南局，并各中央局及山东、华南、新疆分局：

(一) 中央同意邓小平同志三月十五日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

[1] 指邓小平1952年3月15日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四个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3月10日至12日有各省区负责人参加的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研究这四个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一) 关于三反。到3月底和4月上旬，全区县以上三反运动即可先后基本结束。区乡三反一律在县以上三反全部结束或在秋收以后再行进行。学校三反必须进行，但可推迟一点进行。打虎较多的地区和部门，即应将运动转入核实战果阶段。除少数正在打虎高潮的单位外，应立即抽出1/3的力量搞业务，4月上旬将大部力量转到搞业务，力求在4月份内使各方面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状态。根据前一段三反运动中的缺点，应坚决纠正逼供和肉刑。(二) 关于五反。前一段因领导力量集中在三反，认真进行五反的城市不多，较普遍的是以三反为中心附带搞了一下五反。会议关于五反的部署是：先集中力量进行25个城市的五反，然后再推及其他城镇。工商户不多的城镇，一律不搞五反，在民主改革中去解决问题。(三) 关于土改。3800万人口地区的第三期土改，基本上可于春耕前如期完成，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剩下的10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今冬明春可以搞完。现在土改中的分山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复查工作已决定推迟到今冬和明年去进行。(四) 关于经济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各种经济机构如何迅速恢复工作的问题，主要又是干部问题，经济机关老虎最多，干部最缺。会议拟定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三月二十日

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 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2日)

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1]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

中央
三月二十二日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党委1952年3月17日关于指导所属部队做好甄别工作给志愿军党委报告中所述的甄别老虎的办法。这些办法是：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由团营干部率领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重点放在甄别连队和战士中的老虎。目前已经发现不少假老虎或不够标准的老虎。报告说，甄别工作的实践证明，由团营组织工作组加以训练，结合连队进行甄别的方法是正确的。但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打通连队干部的思想，解决干部中因怕弄出岔子、怕负责任、怕前功尽弃等思想造成的甄别工作的阻力；二是工作组应随时总结经验，加以整理提高，防止简单化。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五反的 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2日)

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五反的报告^[1]很好。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3月9日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十条经验：（一）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二）五反发动的时机以在机关打虎运动基本结束后为有利。（三）五反的第一项准备工作是开展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动员。宣传策略上必须掌握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投机商人和完全违法的大盗骗犯、大行贿犯，不要向所有的资本家同时开火。（四）五反的第二项准备工作是搜集材料，侦察敌情，分类排队，找出重点。（五）五反的第三项准备工作是建立坚强的指挥部，训练骨干，以市为领导中心，以区为作战单位，建立坚强的五反指挥部。（六）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以普通工人、店员为骨干，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这是取得斗争全胜的关键。（七）召开全市性的五反坦白检举大会，显示威力，体现政策。（八）利用坦白检举大会以后的有利形势，趁热打铁，召开各行业或几个行业的坦白检举大会，促使更多工商业户坦白和工人店员进行检举。（九）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掀起坦白检举热潮，使所有资本家无例外地在工人面前过一次关。（十）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作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

中央
三月廿二日

彭德怀回国治病陈赓去朝代理指挥^[1]

(1952年3月22日)

同意^[2]，请即派陈赓^[3]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4]阅，退
聂办。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3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鉴于彭德怀有病，需回京治疗，建议派陈赓代理指挥志愿军。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

[3]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正在国内治病。

[4]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 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

(1952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 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二)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 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乙) 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1日关于加强私营厂店的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五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发动与锻炼私营厂店职工的良好机会。各城市市委和工会领导机关，必须通过五反运动，在充分发动店员工人的基础上，逐步整顿工会组织，纯洁与提高阶级队伍。

(丙) 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1]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 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2]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 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己) 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 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八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

[1] 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2]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请你们于五反进行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以自己意见随时电告。

中央

三月二十三日

中央转发徐子荣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4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

关于在政法系统中特别是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中彻底开展三反斗争，坚决惩治违法乱纪分子，中央已迭有指示。现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同志三月二十三日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徐子荣的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三月二十四日

[1] 指徐子荣1952年3月23日关于公安部门的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惩治和大批洗刷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卖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对于那些为数不少的中毒极深、贪污成性、罪恶甚多、民愤甚大的坏分子必须坚决实行组织整顿和依法惩治的方针，才能挽回在群众中留下的恶劣影响和纯洁人民警察队伍，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在中央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 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

(二) 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1]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2]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1] 指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

[2] 指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同意建立军事工程学院^[1]

(1952年3月26日)

同意。^[2]

毛泽东

三月二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1952年3月18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粟裕的报告说：两年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唯在技术上还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够满足部队的要求，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宜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借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所拟方案报告如下：（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二）院部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及若干处，另辖炮兵工程系、装甲工程系、普通工程（工兵及通讯）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等五个系。（三）开始一期可定三年毕业，以应急需。至第三期时为求得深造，则可延长为五年毕业。（四）为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院址拟设在哈尔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 条例草案的批语和意见

(1952年3月27日)

一

同意。略有修改¹¹。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

二

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

三

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可将第十五条并入第十四条。

[1] 主要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对条例草案第二条的修改，原文为：“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9个字。本篇第二段文字是对这一删改的说明。条例正式通过时，考虑到毛泽东的意见，将毛泽东删去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改为“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另一处是对条例草案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修改。第十四条的原文为：“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并将条例草案第十五条的文字“凡对检举人施行打击、报复者，应依其情节轻重，予以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并入第十四条。本篇第三段文字是对这一删改的说明。条例正式通过时，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于1952年4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全文刊载在195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上。

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 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 指示稿的修改^[1]

(1952年3月27日)

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1] 本篇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给李达的信^[1]

(1952年3月27日)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你！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请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不满足广大工人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希望，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回原。

[1] 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关心和赞赏。1952年3月，李达将第二部分打印稿寄呈毛泽东审正。这是毛泽东给他的回信。

中央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

(1952年3月28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委：

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1]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中央

三月二十八日

[1] 指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刘慎之1952年3月20日给中南局并铁道部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三反中清查走私武器、黄金、白银、毒品等的情况，指出：衡阳铁路南邻香港、澳门、海防3个大港口，中连云贵烟土产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各大埠，解放前走私极为猖獗，解放后并未显著敛迹。走私为害之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亦是政治破坏、军事破坏，更严重的是毒害人民的生命。报告建议中央早下决心，乘三反五反之威，内部外部一网打尽，订出有关走私案犯具体处理办法，以便遵行。

对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两文件的批示^[1]

(1952年3月29日)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

[1] 1952年3月29日，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的报告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

中央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9日)

薄一波同志，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

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2]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中央

三月二十九日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3月25日关于上海五反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所述的第一战役的经验和第二战役的部署。上海五反第一战役的经验是：（一）五反要与生产相结合，五反必须维持生产。（二）把五反政策向工人、店员、高级职员及老板彻底摊牌，让他们都摸到政府的底。（三）五反斗争必须从诉苦运动入手，通过诉苦发动群众，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四）五反斗争过程也即是争取高级职员的过程，高级职员争取过来了，问题就接近解决了。（五）要学会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六）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发挥资本家亲戚朋友中的党团员和其他积极分子的作用。关于五反第二战役的部署是：第二战役可如期在4月1日开始。拟选择2000个重点户进行检查，非重点户则以区街或行业为单位，对资本家和工人店员分别进行发动。党的领导力量主要仍应放在重点户和大户身上，只分出一部分力量来进行一般的动员。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 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批语

(1952年3月29日)

上海市委，各中央局、分局：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1]，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

[1] 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25日关于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关于三反中退赃、追赃问题，华东局已有指示，其中所示退赃、追赃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但上海目前正处在五反时期，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追赃，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凡须在本市追赃时，必须携带材料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联系与接洽，由其斟酌情形，分别先后，予以查明核实，再将结果复告有关单位，至于被追出之赃款、赃物，则由该处统一交存人民银行，对收赃、存赃等有关三反人员之调查讯问，亦应即日停止。本市五反全面展开后，追赃问题即能解决，各机关团体负责追赃之人员，并可参加本市五反检查组织，配合进行。（四）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批语

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

中央
三月二十九日

关于要新华社选送五反材料的批语

(1952年3月30日)

尚昆^[1]同志：

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消息^[2]就都是可以发的。

毛泽东
三月卅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第70号（1952年3月29日）刊载的3条消息，即：《上海五反第一战役即将结束》《天津几个大工业资本家已被保护过关》《天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安定资本家的心》。

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修改^[1]

(1952年3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

二、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三、“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1]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的三点修改。本文第一部分是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本文第二部分是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本文第三部分是对《解说》说“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一句的修改。

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 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1]

(1952年4月1日)

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1]

(1952年4月1日)

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1] 毛泽东的这段话加括号写在中央批语稿的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

为转发一封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 来信的批语

(1952年4月3日)

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1]。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

毛泽东

四月三日

[1] 指上海市劳动局干部蒋立1952年3月25日送请毛泽东审阅的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将两方面的监督密切结合才能奏效。（二）现已发布的几个有关法令文件，对工人监督生产经营的权力，均无明确规定，因而工人群众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这是资产阶级得以盗窃国家资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三）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今天私营企业中工会和工人的政治觉悟已有一定的基础，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已有一定的熟悉，只要赋予明确的权力，建立较完善的制度，加上健全的领导，工会和工人是能够胜任的。（四）关于建立私营企业工人监督生产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了9条意见，包括工人监督生产的性质、职权范围、组织系统、纪律和奖惩等内容。

中央转发上海市五反 第一期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4日)

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

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1]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四月四日

[1] 上海市五反第一战役从3月21日开始，至3月31日结束，对74家重点户进行了检查。所取得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务求详尽确实，务求说清违法事实来龙去脉，数字务求详尽准确。（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 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 和对检讨的修改^[1]

(1952年4月4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一) 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2]，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 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

[1] 本篇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编辑的刊物)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加写的话。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2年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1952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

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四月四日

二

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1]，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1952年第四期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中央关于广州市五反工作的指示

(1952年4月5日)

罗瑞卿^[1]同志，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

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2]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罗瑞卿1952年4月3日关于广州五反概况和预定部署给毛泽东、中央并报中南局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4%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脚在港澳，一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关于五反的部署，报告说，五反重点试点工作，有4个行业已近于结束，下一步准备召开一次4万人的斗争大会，一方面动员大规模地展开五反，另一方面宣布4个行业的五反结果。大会以后，即着手铺开80个行业的五反，4月底基本解决问题（主要是前三类工商户的问题，后两类户只求解决一部分），5月间将剩下的100多个行业的五反全部铺开。预定从现在起以两个月时间结束广州五反。报告还谈到，对于群众发动以后更加注意争取高级职员和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的工作，以及不因五反耽误生产等问题，正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研究和布置。

反必须注意给港澳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

中央
四月五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